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四期 1993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4, March, 1993.

賴皮的國族神話(學)：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黃毓秀

A Myth(ology) Mythologizing Its Own Closure:
A Brighter Summer Day

by
Yu-hsiou Huang

關鍵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德昌
佛洛伊德、伊底帕斯情結、基哈爾、李維斯陀、拼裝
*Keywords: Sigmund Freud, René Girard,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Oedipus complex, bricolage*

收稿日期：1992年9月10日；通過日期：1992年11月16日
Received: September 10, 1992; in revised form: November 16, 1992

摘 要

楊德昌的影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 講述殺淫婦的故事。本論文第一部份嘗試分析影片故事的主題，即父權體制下權力與慾望的難題。第二部份探討此片自我檢視的有趣現象，結果發現，此片並未達到任何有效的自我批評，卻沈浸於對其自身結構的無止盡賞析中。此片的結構之結構性，成為此片唯一且最重要的主題。如此，藉著將殺淫婦之舉貶為“不若其大結構重要”，奠基於殺淫婦的整套體系再度得以自圓。

Abstract

De-Chang Yang's film, *A Brighter Summer Day* (1991), tells the story of the murder of an unfaithful woma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theme of the story told by the film, that is, the theme of the problems of power and desire under patriarch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film's effort at self-scrutiny. It is found that, instead of arriving at any valid self-criticism, the film plunges itself in an unlimited indulgement in, or an unending study of, its own structure. The structurality of the film's structure becomes *the* theme of the film. Thus, the whole system based on the murder of the unfaithful woman is consolidated once more, this time by way of dismissing her murder as "something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film's structure."

這篇論文產生於兩個不同的時刻，這兩個時刻的思考，分別形成本文的第1和第2部份。

第一個時刻是看到殺淫婦的戲上演的時刻。在我們的文化裏，殺淫婦的戲有著豐富的戲目，簡直自成一個“類型”(genre)。在這個“類型”裏，《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底下簡稱《牯嶺街》)有著承和轉的意義。我們看到，它一方面承繼先前的傳統，另一方面則呈現明顯的佛洛伊德與後佛洛伊德面貌，顯然是受了西方文化深刻影響之故。這種“中西合流”的文化現象，自有深入分析與了解的價值；而這分析與了解，對某些人而言，譬如對深深自覺身為女人並且意識到文化壓迫女人的筆者而言，則成了一種迫切的需要。在這一部份，我嘗試引用佛洛伊德有關慾望的理論，以及基哈爾(René Girard)闡述男人相互認同、爭奪之現象的理論，以便解釋《牯嶺街》裏(廣義的)父子、兄弟互爭權力和女人的故事。

第二個時刻比較複雜。它是我們的文化裏一個全新的時刻。它的實情是這樣：殺淫婦的戲照樣在上演，但是作者不見了，演出單位不見了，沒有人應該為這齣戲負責。如果你看了覺得它不好，甚至不對，因而生氣，那是你活該。反正哪，你就是找不到任何人講理，或出氣。

這樣的一個讀者面臨著很奇特的處境。無論她發出任何批評，人家都可以告訴她：第一，這部影片講的是“過去的事”，而不是“現在的情境”或“(有些人)假想出來的情境”；第二，它是對民國50年代父權與男性沙文主義的自我批判，也就是說，它所呈現的父權與男性沙文主義面貌，正是它進行自我批判的表現；第三，如果你不滿意小明被殺的下場，你應該看到其餘女人的不同結局，譬如四母，以及明擺著楊花水性的小翠，她們可都好端端的活著；第四，這部作品最大的成就是在藝術層面，它呈現細緻、豐富、嚴密、靈動的結構——這才是此片的真正“內容”，讀者不應捨本求末，不應在故事題材的層面斤斤計較，等等，等等。

而(不)重要的是，在戲院內外，男性法西斯體制依舊安然無恙

地運作著。

這種情形正是今日地球村文化的新近發展。在女性觀點的逼視之下，男性沙文體系改用機器人的非人語音喃喃地唸著：呃，這是不得已的…有其必然性…反正這是不重要的，讓我們學習任它去，不必去看它…。

這真是無比賴皮的策略。不去理它嘛，那就正中它下懷。而理它的話，妳又會發現，妳處於一種過於複雜、滑溜的處境，像在無垠的爛泥巴堆中試圖抓一尾泥鰍，又像在巨碩如星球的毛線團上尋找它那被刻意隱藏了的線頭。

寫作本文第2部份的筆者，正是處於這種情況。其實情形並不如想像的糟，甚至還蠻好玩的。在這一部份，我引用的是（後）結構主義的李維斯陀、德希達等人的論述。由於《牯嶺街》明顯受到當代西方文化深刻影響，本論文拿當代西方重要思潮作分析的參考，一併加以分析與批評，這種作法應是有充份的適切性與必要性的。

至於泥鰍是不是抓到了，線頭是不是找到了，則有待本文的讀者自下評斷。

1. 權力與慾望的故事

在《牯嶺街》片首，一片黑暗的銀幕上亮起一盞燈。這盞燈是一則告示，告訴觀眾，其後展開的故事是被回顧、批判的視線所照亮了的。本文第1部份擬循著這盞燈，審視被照亮、看得見的故事世界，以及這個世界所播放的“真理的呼求”（truth-claim, Gadamer 語）。至於光環外面鏡頭所不及呈現或刻意避開的廣大空間，則留待第2部份討論。

1.1 父子愛恨悲情劇

《牯嶺街》講述的是權力與慾望的故事。在此擬先討論其權力面。

《牯嶺街》所呈現的故事立意高遠，令觀眾／批評家深有所感。

譬如，劉大任指出，片中的幫派少年是在建立新世界、新倫理觀；張大春在此片中看到“國族寓意”；黃建業則說楊德昌“將個人經驗擴張為國族寓言”（台北市金馬國際影展執行委員會編（以下簡稱金馬展執委會），1991：45，55，57）。

《牯嶺街》這則“國族寓言”所要闡發的，是什麼闊大的創構呢？簡而言之，便是改革父權，去除父的殘暴跋扈，以建立人人互信共治的兄弟之國。

《牯嶺街》以數種安排來呈現（廣義的）父子關係。首先，是國家官僚機構與個人的關係。這些官僚機構包括警備總部、小四的父親任職的機構、警察局少年組、看守所、建中訓導處、教務處、醫護室等等跟片中人物有過關聯的國家或社會機構。這些機構一概以高高在上、冷漠不信任的態度對待它所接觸的個人。至於片中接觸這些機構的個人，要不是虛與委蛇，如滑頭、葉子，便是擺出被輕忽的兒子的反叛或冷疑，如小四、小四的父親（底下簡稱四父）、Honey 等人。

對於這第一種父，影片發出強烈的批評：這僵固、變形為官僚體制的父處處表現得粗暴、沒有感情、不公正，對個人所造成的傷害將發展出極為負面的嚴重後果，包括把小四一步步推上自毀毀人的歧途。

第二種父子關係是眷村幫老大山東和他的手下的關係。山東身旁簇擁著的嘍囉們對他唯唯諾諾，彼此之言語動作粗暴，對外人則是極盡欺壓之能事。這種上下關係，可以說是前述第一種關係在民間、私人層面的對等物。

前面兩種（廣義的）父子關係是負面的、惡質的，它們在影片裏被用以對比底下兩種正面的模式，及其所標指的理想社會。

第三種父子關係是四父和小四的關係。這對血緣上的父子是一種理想化的父子，正如劉大任指出的，完全沒有代溝（金馬展執委會，1991：50）。黃建業則注意到，“在所謂新電影中很少見到《牯》片中如此和諧、親密的父子關係，大部份的新電影中父子往往無法溝通，

《牯》片出現少見的對父親正面的描寫”（金馬展執委會，1991：50）。黃建業在此強調了兩次的“少見”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它標示著導演個人構思創造的焦點。我們應該進一步問，《牯嶺街》把小四父子描寫得這麼平等親近，為什麼呢？張大春說：“楊德昌有意在《牯嶺街》中讓小四這個家庭裏的父親和孩子同樣變成一個孩子，因此他們具備了浪漫化的基礎”（金馬展執委會，1991：50）。這個說明一語道破個中奧妙：導演的用意就是要把貨真價實的血緣上的父親變成兒子，讓他跟他的兒子成爲兄弟，如此，眾兄弟平等共治的浪漫之夢便有編織的可能。

第四種模式是小公園幫老大 Honey 跟幫眾、幫友的關係。Honey 做人風格大大不同於山東，山東陰鬱跋扈。Honey 則浪漫跳宕；兩人所領導的團體也因而有不同的風格，眷村幫著重下對上的服從，小公園幫則靠一種比較親密、自然的兄弟之情維繫。

Honey 跟小四的關係是影片的一個重點。Honey 逃亡在外，小四迷戀上他的女友小明。Honey 對此表現出一種超邁寬大，不僅不以爲意，更且對小四誠懇相待，有將小明託給小四之意。Honey 被殺之後，小四理所當然地自視爲繼承 Honey 成爲小明的保護者。

影片試圖把 Honey 和小四的關係塑造成開明、寬容、平等、互信的關係，這是小四與四父的關係在家庭外面，在大社會裏的翻版。影片顯然是要拿這兩層關係作爲人間倫理的新中樞、新典範。——這無疑就是劉大任所說片中幫派少年想要建立的“新倫理觀”。

前述的“新倫理觀”極爲理想化，要將它不肉麻而又有信服力地呈現出來，並不容易。《牯嶺街》採取的是典型悲劇的作法，即透過個例的失敗以揭發普同的理想。小明不堅貞導致小四與好友小馬交惡，哥兒（兄弟）反目成仇；而且小四因此自暴自棄，偷偷典當母親的手錶換錢花用，四父誤以爲手錶是二兒子拿的，盛怒之下毒打二兒子，“兄弟一般的父親”搖身一變，回復爲殘暴的父親。如此，《牯嶺街》令悲劇感和對崇高理想的嚮往在觀眾胸中互相撞擊激盪，將兄弟之國

的幻景推到天邊高高的浪頭上。

“兄弟之國”的浪漫之夢是《牯嶺街》高高地投射在天際的蜃影，影片中的世界却是一個出了毛病的父權世界，在其間活動的是一些被棄逐、苦無出路的兒子們：軍人和中下層公務員的子弟，他們大都是幫派少年。四父基本上也是兒子，他面對著他不得不面對的諸多冷漠、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變成了一個時而惶惑、時而反抗的兒子。

這個子的世界也是一個非常態、有病的世界。坦克車轟隆隆地跟公車擦身而過；人們壓低聲音猜測什麼時候“回去”，或者到底還回不回得去？“回去”指涉的，是一個井然有序、光明和樂的常態世界；而“還沒回去”或“回不去”的現時狀態，則是一個流落邊陲、有志難伸、黑暗混亂的非常態世界。（《牯嶺街》以嚴密、經濟的藝術手法，將片中外省人在國民黨政府帶領下逃難來台的史實，以及主角小四及其友伴因讀夜校而總是在黑夜裏活動的故事安排，鋪展為有力的普遍性象喻。）

這個非常態的世界出現一些病兆，包括：警備總部以不可知的理由拘訊人民；訓導處總是有沒收來的球棒（這顯示訓導人員老是疑心學生會鬧事，以及學生可能確實有拿球棒作為暴力用途的情形）；學生競爭壓力大，易得（身體上和精神上的）近視；明白指涉性器官的粗話流行，譬如“好屌”、“操你媽的屌”；女人，如小翠、小明，遊走於眾多男人之間，而且男人也為了爭奪女人而相鬥，等等。這些病兆是來自同一病源嗎？那是什麼？它的發病史又是如何呢？底下擬借佛洛伊德與基哈爾的理論加以分析。

底下讓我們回顧一下佛洛伊德有關伊底帕斯情結 (the Oedipus complex) 和閹割情結 (the castration complex) 的著名理論。

佛洛伊德堪稱父權的信仰者，他認為父權是人類文明唯一且必然的模式；至於母權，則是短暫的過渡階段 (Freud, 1974, Vol. 23: 81—4)。而父權這人類文明唯一且必然的模式，面臨著一個結構性、內因性的毛病，那便是伊底帕斯情結；父權體系是否能夠屹立且正常

運作，端看它是否能夠順利解除它本身所引發的伊底帕斯情結。什麼是伊底帕斯情結呢？佛氏於《自我與原我》（*The Ego and the Id*）一書中如此定義：

小男孩從很小的時候就把情感投注到母親身上…。小男孩對待父親的方式則是將自己認同於他。有一段時間這兩層關係分別進展，直到有一天小男孩對母親的性的願望變得更強烈，並且發現他父親阻撓著這些願望的實現，他於是發展出伊底帕斯情結。此後他跟父親的認同便蒙上一層敵意的色彩，而轉變為想要擺脫他以取代他在母親身旁的位置的願望。（Freud, 1974, Vol. 19 : 31—2）

在《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書中，佛氏則指出：我們都像古悲劇中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一樣，“可能都是命中註定會把母親當作性慾衝動的第一個對象，而把最早的恨和最早的謀殺願望投向我們的父親”（1974, Vol. 4 : 262）。也就是說，兒子“命中註定”會戀母，而由於戀母，他會恨父，甚至會想要弑父以便奪得父／夫的位置。

伊底帕斯情結直接威脅著父的安危，也就是父權的存亡。以父為尊的父權體系要能成立且持續運作，自然必須有萬無一失的措施，以解除伊底帕斯情結所造成的威脅。解除此情結的機制佛洛伊德稱為“閹割情結”：文化以種種微妙的方式告訴小男孩，如果你不乖，你的雞雞就會被割掉，而“如此自傲於擁有陽具”的小男孩面對著這麼嚴重的威脅，“他的自我（ego）就會脫離伊底帕斯情結…父親或父母的權威就會被納入自我，而形成超我（superego）的核心，這超我接收父親的嚴厲，並永久設定他的亂倫禁制令，如此使得自我不敢再將母親當作性慾對象，屬於伊底帕斯情結的性慾一部份被昇華了…另一部份則受阻並轉變為親情”（1974, Vol. 4 : 176—7）。

佛洛伊德把戀母放在問題的核心位置；兒子因為戀母，所以恨父。基哈爾試圖修改上述的理論。基哈爾指出，父權體系，或任何繫

於類似父子關係（譬如某些母系社會的舅甥關係）的體系，莫不承受著一懂普同的威脅，那便是上與下之間微妙的模倣、競爭與敵對。子（門徒）很自然地認同父（典範）；前者認同後者的一切，包括他的慾望，兩者於是爲了同一目標而相爭。父權文明的體制深處，早已對這個現象安排好對策：它使得父先發制人，以僭奪或亂倫的罪名（或罪惡感）懲戒子，譬如，在伊底帕斯的神話中，神諭早在伊底帕斯出生之前就聲稱他會弑父娶母，也就是說，早在子有弑父娶母的能力或意圖之前，文化已經先定了他的罪。這個罪，基哈爾指出，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變形爲超我；超我其實是子對父的認同的再續，也就是在因認同而衍生的伊底帕斯情結（這其實也是認同的一種變貌）階段之後，子再度接納父（或社會）的律法。（Girard, 1977：169—92）

基氏理論和佛氏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佛洛伊德意圖把伊底帕斯式的慾望投注，即子對母的慾望投注，置於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位置，而基哈爾則認爲，子戀母乃是子模倣父的慾望所致，因此，子對父的認同與模倣才是最關鍵的現象，而不是所謂的伊底帕斯情結。

以上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與私叔弟子基哈爾之間的這一段你來我往，讀來像煞一齣愛恨交織的父子悲情劇。佛氏理論顯然把佛氏本人置於父的位子，他彷彿在說：你這個小子對我心懷怨恨，都是因爲你圖謀不軌…你戀母！而基哈爾則站在子的位子，委屈地反擊：我是無辜的，我只不過是遵從“孝者肖也”的命令¹，你就定我罪。

《牯嶺街》所演出的，正是一齣類似的父子悲情劇。不管認同和慾望的投注何者爲先，何者爲後，兩者都是影片的重頭戲。子認同父，他想要父所有的一切，包括：光／知識（小四捻亮的燈、他從片場“幹來”的尺寸超大的強力手電筒）；力／武器（日本將軍留下的長武士刀、小馬父親的手槍）；頭／權位（小四擅自戴上校醫的氈帽擺出瞄準

1. 基哈爾推論：“子受到父所渴慾之物吸引，在這一點上他是全然無辜的；子之所以甚至也想要取代父‘在母親身旁的位子’，無非是他坦誠回應文化與父所發出的命令所致”（Girard, 1977：174）。

射擊的姿勢，Honey 擅自穿海軍服、戴海軍帽；父的陽具（超大號手電筒、長武士刀、手槍、紳士帽、海軍帽都是父的成熟陽具的象徵）；以及女人（小明，被殺的眷村幫老大和逃亡的小公園幫老大的女人）。

面對著子由於認同父而做出的（疑似）僭越之舉，父（先發制人地）施予懲罰：訓導主任斷定小四拿球棒是爲了暴力用途，便將球棒沒收，此後他始終認定小四有不軌意圖，並進一步誤認小四蓄意作弊，對師長不恭，而記小四大過；校醫（他顯然認爲小四泡小明的行爲侵犯了他對小明的保護權）拿出尊長的態度訓誡小四，護士（校醫權威的延伸）也幫腔教訓小四；警備總部以完全不可知的理由拘禁、提訊四父；四父誤認二兒子偷拿手錶，因而以毒打怒罵的方式訓子，等等。

父的嚴厲，或防範未然的懲罰，引發子的罪惡感，譬如，四父面對警備總部時流露徹底的拘謹與惶恐；這罪惡感將使他更加徹底地收納父的律法與價值，使他一方面緊緊抱住“公家機構”（這也是父的代表）的大腿，對妻子建議他另尋出路的忠言深表懷疑，而另一方面則執行起父的嚴厲律法，酷懲他誤認爲有罪的二兒子。小四也一樣，由於自覺越矩而向 Honey 輸誠，在得到 Honey 的諒解以後，便以 Honey 的繼承人自居；如此，他成爲父的律法的護衛者，爲 Honey，也爲他自己，而企圖懲戒不義的小馬和不貞的小明。

四父和小四接收父的律法，這符合於佛洛伊德有關超我的生發的理論。但基哈爾對此有進一步的闡說。他指出，不當的懲罰，或不潔的暴力，會導致模倣性的敵對，接著，以暴力對付暴力的惡性循環便會展開，使得長幼有序的倫理崩解，長不長，幼不幼，人人都成了“暴力的孿生子”（Girard, 1977：67—88）。類似的亂象也發生在《牯嶺街》裏。面對校醫與護士的無聊干涉，而且也是出於對警總拘禁四父之舉的不滿，小四一改平日的溫文儒雅而破口大罵：“操你媽的屁！你是什麼玩意？你是警備總部啊？”；面對嚴峻不公的訓導主任，小四掄揮（先前被沒收的？）球棒，打破電燈，熄滅父的（假）光／真理；同時，幫派之間、幫派內部進行著彼落此起的爭鬥與廝殺。

總而言之，強調“父嚴子孝”的佛洛伊德版父子劇，和著重描寫傳統父子之倫如何被暴力滲透的基哈爾版父子劇，一併登上《牯嶺街》的舞台，如此所展現的，是一個父權失序後的混亂世界。

1.2 禍水論與禍水現象

前面討論了父子、兄弟的權力糾葛問題，也就是男性之間的認同、模倣與敵對的錯綜關聯。底下將集中討論伊底帕斯情結的另一面議題，那便是慾望的難題，以及其所衍生的諸多問題或現象。

只要稍加留心，我們就會注意到，《牯嶺街》這部影片裏，在男性志業的壯觀表面故事底下，有一股隱匿的暗流匍匐推移著。而又如果我們進一步留意，我們便會認出：原來這股隱匿的暗流才是影片的真正骨幹，它自始至終支撐著影片的情節與意義架構。

這“隱匿的主流”便是小明的不貞所引發的亂象。其過程大要如下。讀建中夜校的小四，某晚看到同班同學滑頭泡女友；消息傳出去以後，女友的身份成了一個謎，有人說是小翠，有人說是小明。滑頭因此記恨小四，處處找他碴子，弄得自己退學、小四被記大過。小明不只跟滑頭有瓜葛，小四的另一個同學小虎也迷戀她；接下來，小四在不知不覺間也陷入同樣的迷戀。這迷戀其實是無所不在的，使得幫派之間、幫派內部流竄著一股破壞穩定的力量。小公園幫老大 Honey 就是為了小明而和眷村幫老大紅毛決鬥，殺死紅毛之後才逃亡在外的；眷村幫新老大山東拿“知道滑頭泡小明”和“要為滑頭撐腰”作為威脅和利誘，迫使滑頭出賣小公園幫、靠向眷村幫；Honey 回來欲處理此事，却被山東殺掉；小公園幫得到萬華幫的援助，殺掉山東為 Honey 復仇；Honey 死前默許小四和小明在一起，小四因此自視為小明的保護者；小明挑逗年輕校醫，令他插手管束小四，激惹小四反彈，演變為對師長不敬、破壞公物，招致退學的處分；小明將母親介紹到小馬家幫傭，小馬視她為女友，招致好友小四不滿；小四持刀至建中門外牯嶺街的街角，想要對付小馬，不意被小明撞見，便在一時

衝動之下殺死小明，也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紅毛因小明而死，Honey 因她而逃亡，終至喪命，小四因她而犯罪，其他還有許多男人也因她而心神不寧。小明是禍水，而且，禍水的主題隨著她貫穿全片，此點殆無疑問。但是，什麼是禍水呢？禍水是如何造成的？

讓我們回到“閹割情結”。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閹割情節在小男孩和小女孩身上都會發生，其關鍵時刻是在小孩看到異性兄妹或玩伴的性器官的一刻。小男孩領會到，閹割的恐嚇不是假的，原來確有其事；這會導致小男孩“對那受殘害的生物感到恐怖，或對她懷有勝利的輕蔑，…永久地決定了小男孩一輩子跟女人的關係”（Freud, 1974, Vol. 19 : 252）。至於小女孩，在看到異性的性器官時，“立刻就會認為它優於自己的渺小、不顯著的器官，此後便淪入對陽具的歆羨”，而且，在她“意識到自愛（narcissism）所受的傷之後，她就會像結疤似地發展出自卑感，並跟男人一樣認為，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不如人的女人是可鄙的”（1974, Vol. 19 : 252—3）。

女人的可鄙有著強大的功用性（就是這強大的功用性令我們懷疑，女人的可鄙很可能是爲了它的社會功能而被捏製出來的）。當個別的女人跟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一樣，領悟到身爲女人的她，正和別的女人一樣，是可鄙的、劣等的，而男人則是優等性別之時，她便會放棄生命初期跟小男孩一樣強盛的主動性，甚至侵略性，此後終其一生甘於被動。這樣一個被動的女人所展現的是“正常的女性特質”（normal femininity）；而女人若非如此，則可能是“陽剛情結”（the masculinity complex）長期或暫時作祟所致。（1974, Vol. 22 : 112—35）

以上的理論很可能是倒果爲因的產物，但是，我們發現，它很能用來“解釋”父權體系裏的女人，譬如《牯嶺街》裏的女性角色；這種“適用性”進一步揭示，佛氏理論和類如《牯嶺街》的作品，顯然都是父權體系的“正宗產品”，跟父權體系之間都有著互相佐證的妙

用。底下援用佛氏理論而作的分析，用意正是在揭露其間的錯綜關聯。

被動、缺乏自主力正是小明的基本特徵。對她而言，這是外在的情勢和內在的心性兩者互為因果的結果，一般女人莫不如此，但這種情況在小明身上有著極致的發展；女性處境所造就的女性心性和女性心性所導致的女性處境，兩者作極致的惡性循環的結果，成就了小明和她那極端倚賴男人的性格。

片中透露的零散資料顯示，小明的父親是個軍人，在大陸陣亡（或滯留？），小明和母親跟著表舅來台灣。明母為人幫傭，但每當她氣喘病發病失業期間，母女倆就只得回眷村依靠表舅。片中回眷村依親的一景中，小明縮著身子不敢伸手去接表舅媽端過來的一碗飯的一幕，道盡了她成長過程的辛酸。在這樣不安定、不可靠的環境中長大的小明，發展出女性心性的一種極端典型：在她身上，慾望跟對安全感的迫切追求糾雜難分。對她而言，正如對所有傳統女人而言，男人代表安全感，可是她從來不曾有過充份的安全感，而且不曾像傳統女人一般學會將安全感維繫於那唯一且固定的男人（先是父親，後是丈夫、兒子），因此她永遠迫切地追求更多的（也就是不固定的）男人、更大的安全感，如此造成男人的敵對與爭奪。譬如，在懇切地要求小四信守“保護她”的諾言之後，她又跑去校醫那裏，做出介乎挑逗與求助的言行，使得校醫出面教訓小四。小馬也提過她有安全感方面的問題，他問小四：“以前她跟你混在一起的時候，是不是也常跟你談 Honey 的事，說，你不給她安全感？”此處“你不給她安全感”的“你”，就行文看來，似乎指的不是某個特定的人，而是小明交往的任一個男友。

雖然男人並不見得足以讓小明倚賴，而且，心理因素也使得她無法安心倚賴一個男人，然而，她却一味本能地追求倚賴男人，即使有自立的機會也不去把握。譬如，試鏡之後她並不主動跟片場聯絡，憑白失去獲取金錢與賞識的機會；她母親的醫藥費她彷彿寧可仰賴校醫施予，彷彿她有意無意間要藉此來接近、挑逗校醫，一方面追求慾望的滿足，一方面跟校醫建立依賴他、受他保護的關係。

安全感的全然缺乏和慾望的飄移無依，使小明成為純粹陰性特質的具形：她是絕對的菟絲蔦蘿，極陰、極柔、極弱，完全沒有自主的力量或意志。正由於如此——由於她就是絕對的沒有自我，或者說，她的沒有自我由於是這麼絕對，以致於“沒有自我”變成了她的自我——她成為男性“陽剛”準則的反面，如此，在男人眼中她成了不可捉摸的謎、不可抗拒的神祕。她的輕緩飄游的聲音、眼神、動作、身影，是“陰”的極致，令人覺得她是個女鬼，而且是最悽慘的女鬼，所擁有的唯一法力端在她的純然欠缺所造成的神祕和不可捉摸——這是完全不能藉以自保或獲取需求的滿足，却只會無限地吞噬、自毀毀人的一種“法力”！因此，對男權體系而言，她成了不折不扣的禍水、致命的女人。

小明代表淫蕩的女人，四母則代表賢妻良母，而這兩種女人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甘於被動、從屬。四母雖然膽識高丈夫一等，却死心塌地的依戀著丈夫，全心全意為丈夫謀劃，不求有自己的事業或發展（她有了小孩之後更辭去教職，後來為了補貼家計才又重拾教鞭）。

連二姊也不例外，她滿口仁義道德，却在在令人感受她是女人，原因端在她缺乏自主力；她的信念與勇氣絕非來自她個人，而是來自一個男性牧師所主持的教會、所信仰的男性神祇，而且，她也是受女兒、姊妹身份約束的好女人，念念無不是為父母兄弟著想。

小明並非天真地相信男人（她說：“許多人都說他們愛我，可是一碰到麻煩，就都躲得遠遠的”），四母也知道丈夫不識時務，而且對丈夫的不溫柔、脾氣鬱躁時感氣苦，但是她們都近乎本能地依賴著男人，不作他想，這顯示除了外在的環境或習俗之外，她們本身的慾望形式也是使得她們依戀男人、甘於做第二性的基本原因，正如佛洛伊德所描述的。而外在、內在因素使致她們無法獨立之後，她們的慾望跟依賴性也就變得屬混難分了。慾望跟被動性結合為一，這可以說是傳統女人的一項基本特質或處境。

此外，影片中的細節處處流露陽具的優勝與女人的劣敗，完全符

合於佛洛伊德的說法。幫派少年表示誇獎的用語是“好屌！”，咒罵則說“操你媽的屌！”；四父在勸小四的一幕末了，突然改用廣東話語重心長的說：“沒春袋（沒陽具，沒男子氣概）總是很麻煩的啊！”；因失戀而想自殺的冰店老板娘向萬華流氓一骨碌跪下，求他們把武士刀（陽具）借她用，等等。小明射搶的一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她信手射擊，幸好無人受傷，而小馬則氣急敗壞地奔過來重重摑了她一巴掌。這一幕經濟地點出女人對槍械（陽具、權力）的無知，和無心的僭越；小明於其後攜母投靠小馬家，則顯示女人自甘接受懲罰並臣服於懲罰者，也就是手槍（陽具）的擁有者、父的律法的執行者。總之，《牯嶺街》赤裸地流露“陽具優勝”的意識，而且，女人對男人的崇拜含有明顯的崇拜陽具——既是男人生理的陽具（penis），也是代表男權的陽具（phallus）——的意味，十分吻合於佛洛伊德的描述。

佛洛伊德從男權的角度，對女人有更進一步的分析。女人不僅因欠缺陽具而甘於被動，而且她在道德上也是有缺點的。男孩爲了害怕失去陽具，因而接收父的嚴厲與律法，發展出成熟的超我（1974, Vol. 19: 176—7）；他有了自制力，能夠克制慾望，改以超我所代表的種族和我爲念，如此他得以進入大的文化社團（1974, Vol. 19: 257, 229）。女孩的情形不一樣。她既已發現自己沒有陽具，閹割的恐嚇便發揮不了作用；少了閹割恐懼此一強烈的動力，她就不能像男孩一樣發展出嚴厲的超我，於是，女人“顯得比男人缺乏正義感，比較不肯赴湯蹈火，而且其判斷比較容易受一己的好惡左右”（1974, Vol. 21: 257—8）。

女人是道德上的次等人，她是異類，並不聽從君子所遵奉的超我；如此，她在身後投拖著長長的暗影，那是陽性理知所到達不了的地方。無論佛洛伊德或《牯嶺街》都是這樣，在它們對女人的貶抑性評價背後，分別坦承他們不了解女人。佛洛伊德終其一生一再明言他不夠了解女人，甚至以“黑暗大陸”形容女人（Freud, 1974, Vol. 19: 243—4）；《牯嶺街》則乾脆把女人視爲一個象徵，將她用來代表男人

不了解、控制不了的黑暗世界（在影片中，這黑暗世界以情節和畫面的形式重複、連續地展現，效果極為強烈）。

小明是男人們所無法了解的。他們在黑夜的世界裏摸索、掙扎、鬥爭，但誰也無法真正了解或控制。小明提起 Honey，說她常勸他：“這個世界是不會被你改變的”，Honey 便會怪她澆他冷水，兩人因此屢屢爭吵。同樣地，她叫小四不要想要改變她，她說：“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是不會被你改變的。”女人和惡勢力、惡世界之間存在著男人所無法了解的疑似勾結狀態，男人因而疑懼、厭恨女人。

小明的用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她用的是十分概括性、概念化的語言，彷彿她是在陳述文化裏普遍存在的某項概念；彷彿她是援引文化裏既有的某項觀念來描述她自己：“我，一個女人，就像這個世界，是男人的努力所無法改變的。”這種陳述點明了文化把女人看成一個象徵：女人象徵處處與男人作對的客觀世界。或者，我們不妨說，文化根本就把女人等同於男人所無法了解或操控的無明世界，並且認為她應該為它負責——片中小四就是在聽了小明的前述話語之後，突然抽刀殺她的。（小明叫做“小明”，實在是一個諷刺，諷刺男人自以為明白她。）

1.3 慾望的難題與性別倫理

就慾望而言，若說女人的難題是安全感和慾望的混淆，則男人的難題是慾望被權力滲透，甚至取代。

從前面有關基哈爾和佛洛伊德理論的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推論：父權使父（典範、權威）處於尊位，讓他擁有的所有的權力和好東西；子（門徒、屬下）對父孺慕、認同、倣效的結果，會連帶地模倣父的慾望，想要父所擁有的一切；而文化既存的機制則會令父將子在這方面的倣同詮釋為僭越，因而施加先發制人的懲罰，如此使得暴力和緊張滲入父權體系的基礎人倫。子可能有兩種反應，一是順服，將父的律法內化為超我，成為“正常”的兒子、繼承人。另一種反應

則是以暴力對抗暴力，成爲（意圖）弑父的逆子，如此則父權體系將陷入失序狀態，直至父重新鞏固他的權位，或子奪得權位成爲新父爲止。

在前述的父權機制中，女人被定義爲爲父所有，是客體、他者、物，她隱沒於父的眾多所有物堆中，不再具有獨立存在的身份，不再是足以與男性抗衡的另一性。在女人如此被降格、物化，加之男性之間恒常進行著爭鬥的情況下，女人變成了眾多被爭的物事之中的一項；慾望不見了，被權力的流動、撞擊所取代了。基哈爾即充份顯現此種症狀；他的論述急於廓清有關慾望的糾葛，偏執地單單抓住父子之間的權力問題。相較之下，居於父的地位的佛洛伊德，反而有餘裕去思考性與慾的問題。基氏與佛氏的這點差異饒富意義。我們可以說，要想解開父權體系中父子關係與男女關係的雙重謎題，結合佛氏與基氏兩者的觀點無疑是一條捷徑。

爭女人被化約爲男人爭權的一環，這是貫穿整部《牯嶺街》的一項重要主題。眷村幫和小公園幫的眾少年爲小明而明爭暗鬥，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另有一個例子也很值得討論，那便是小四回罵護士（權威人物的代表人）的一段話：“操你媽的屌！你是什麼玩意？是警備總部啊！”《牯嶺街》的觀眾大抵會有片中充滿髒話的印象，而且，他們會覺得那些赤裸裸地指涉性器官的髒話（如“屌”、“屌”）傳達著暴戾的氣氛。觀眾的這兩項互相關聯的印象，正確地點出了性和權力鬥爭之間的相關性。“好屌”、“操××的屌”之類的話充斥，展現的是（眾）子的性慾受到刺激、被挑動的狀態，類似佛洛伊德所描述的伊底帕斯情結狀態。而“操你媽的屌”，則標明：(1)爭權的狀態，即一方對另一方面表明“我是你老子”、我的權位高於你。(2)慾望想要發洩的狀態，而且，洩慾的假想對象是別人的女人，尤其是輩份高於自己的女人（相爭的雙方由於“相”爭，其輩份、地位是被假想爲平等的，因此，“操你媽的屌”意謂慾望的對象爲輩份比自己高的女人）；我們甚至可以懷疑，這句“髒話”根本就是戀母慾望、亂倫慾望的變形

(distortion)。至於把“警備總部”也拿來當辱罵的用詞，則進一步明白地顯示咒罵者（子）所要挑戰的是威權機構（父）。小四一骨腦兒把“操你媽的屌”和“警備總部”串在一起，無比深刻地同時展露了佛洛伊德和基哈爾兩人之所見，即互爭女人和互爭權力兩種現象的重疊。

在“慾望的模倣”定律的運作下，小四正和片中其他許多少年一樣，越是明知不應該對小明動念（因為她是〔在逃的〕老大的女人），就越是自主地把慾念傾注在她身上。這種愛，由於從一開始就是由“模倣性的相爭”（mimetic rivalry）所啟動的，註定已被權力、暴力滲透，所追求的便不是單純的兩情相悅，或雙方慾望的滿足，而是控制權、佔有權的爭奪。小四一再對小明說他要“保護”她。他所說的“保護”，其實是“霸佔”之意；當後來他得知好友小馬和小明在一起時，立刻義憤填膺，到了要殺小馬的地步，此事充份顯示“獨佔的慾望”才是小四對小明的愛的本質。

男人之所以會愛上一個女人，是因為她是父——以及眾兄弟——所愛的（那一類型）女人；而愛她即意謂要跟別的男人相爭，以便獨佔她。——這大抵便是典型男性愛與慾的真相。在這真相裏，我們僅僅找到獨霸者與被獨霸者的共生，以及射精和孩子，却找不到那純然的歡愉（jouissance），也就是愛慾的單純滿足。

如此，文化將主控權交給男人，却要求他付出昂貴的代價——即，愛情，慾望的滿足。殺小明的一幕對這點有淋漓盡致的闡發，小四把刀子（？）往小明身上刺過去以後，小明在痛楚（？）之中閉上眼睛，身體失重，緩滑地、親密地抱住小四，而小四則一邊承抱小明，一邊以穩定而又猛烈的韻律，反覆對她戳刺；銀幕上看不到刀子，僅僅展現的是每一次戳刺所引發的親暱的震撞，終於於有一方發出動物一般的低吼，小明支持不住了，滑落地下。明眼的觀眾一看便知，以上的一幕所呈現的，根本就是愛的極致、性高潮的表現！此處，影片所顯示的道德可議性跟它的藝術成就一樣令人驚歎。

小四以“懲罰她”(這是控制、獨佔女人的一種必要手段)代替“愛她”或“寵她”，以“拿刀子殺她”代替“跟她作愛”；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小四以證明有陽具(敢拿刀子殺人、有男子氣概)取代愛，並藉殺掉慾望證明他有權力。如此，他長成一個“有春袋”的男子漢，得以進入陽具所象徵的體系。殺小明(殺女人)因而是小四的成年禮。

(敢)殺女人(有懲罰女人的能力)，而後才能進入大的文化體系。這是值得深思的陳述，因為此一陳述以種種變貌，一再地出現在各大父權文化裏。譬如，小四便是武松、石秀的複本。由於楊德昌藝術手法的經濟嚴密，小四的例子向我們展現了上述文化現象背後的玄奧：武大和武松、楊雄和石秀其實是同一人，也就是說，深愛、縱容女人的男人和怒斬女人的男人其實是同一人。或者說，從愛女人到殺女人，其實是同一文化機制一以貫之的運作過程的必然發展；此一文化機制使得男人對女人的愛，最終會以至為可怖的面目現形。男人如果真愛女人，任她擁有自由和權力——“她”，一個女人，與君子作對的無明世界的象徵、具形——則最後會落得必須以殺她來了結她所引起的恥辱和不義。父權文化一再地發出這種訓誡，藉著重覆講述類如武大、楊雄和小四的故事。

影片對扮演禍水角色的小明的塑造頗為費人思量。小明其實是最無辜、最令人同情的，影片顯然對她的身世作了這種安排。如此一來《牯嶺街》也可以被讀作對弱女子命運的揭發，譬如有位評論者就覺得此片“點出沙文主義下女性的委屈”(張婷媛，1992：48)，但這並不意味影片建議作徹底的文化變革。小明是值得同情的，而且，像她這樣的女人的生命是一團謎，自成邏輯、自有義理，以致於她，以及小翠，可以不但不自責，反而振振有辭地斥責小四自私、自以為是，以上這些都是影片明白告訴我們的。但是，在这一切之上，影片要進一步告訴我們：無論多麼可憐，多麼無辜，禍水還是禍水，一日不治，天下便一日不得平靖；殺小明乃是不得已的天下之策，這其實是可以預防的。而預防之道無疑是《牯嶺街》所要傳達的一項中心旨意。小

馬在警察局裏痛哭，萬分悔恨地說：“我就只有他（小四）這麼一個朋友”，校醫則聞訊緊緊抱住清純的未婚妻。這些安排有著明顯的道德寓意，教男人要：第一，“朋友妻不可戲”，以所有男人的努力來保住每一個男人所專屬的女人的貞潔，以及男人之間的友情——於此，男人的（也就是社會的）團結和女人的貞潔成爲一體的兩面；第二，選擇女人要以貞潔爲第一優先考慮，其他都是次要的。

小四殺小明因而是一項爲義受難的淑世之行，他以一己的罪行與苦難，來重新奠立整個文化體系的基石，那便是，懲罰女人的戒刀與監管女人的戒律。如此，《牯嶺街》重新描摹古老的父權藍圖，即男主角從，男人要負起監管女人（及小孩）的責任。以四父爲家長的家庭，基本上便是這樣一個家庭。在這個家裏面，父嚴母慈，兄弟姊妹互相照料。尤其是，其女性成員（小四的母親和兩個姊妹）都是一心護著家、護著兒子或兄弟的正常好女人。

影片裏用了一個簡潔的段落描寫傳統家庭世代相傳的靜肅景象：在校醫生居宅邸的佑大庭園裏，老醫生（校醫的父親）指著一樹白茶花告訴準媳婦，那是自古中國人喜愛的花，它“很貴氣，又很高雅”，總是令他想起已過世的“妳阿公”。白茶花的意象結合了種族、祖先和貞潔的媳婦。這簡短的一幕具體而微地展現了父權宗法、家庭與社會的全貌：父權家庭要靠娶進來的貞潔女人執行傳宗接代的神聖任務，而這種父權家庭便是整個民族的構成單元。

這樣的貞潔女人其實是男人不得不然的選擇。她是一個崇高的象徵，她肩負著不容置疑的意義，但在現實生活裏，她却是索然無味的，就像校醫的未婚妻。在影片裏不曾開口說話的未婚妻始終是那麼拘謹、呆板，既無慾又無趣，使得小明有理由警告校醫：“你們之間沒有感情，她不適合你。”

爲了不讓女人經由慾望而影響甚至控制男人，男權文化設置層層關卡，一邊將權力交給男人，一邊也堵住他們的慾望通往女人和滿足的道路。可想而知，被迫（？）掌權的男人們對這種處境會產生多大

的不滿，不管自覺或不自覺的。他們因而藉著想像來構築“魚與熊掌兩者兼得”的幻夢——那是一個既貞潔又烈性的女子，既能熱烈地盈填男人的慾望，又能忠貞於他。《牯嶺街》裏就折射了這麼一個男人所夢寐以求的女人。小貓王在日式住家天花板上找到一個包袱，裏面有一把小武士刀和一幀日本女孩的照片。小貓王想像：“我看那把刀八成是她的，說不定是用來殉情自殺的！”小四把照片帶回家，夾在日記本裏，獨自一人的時候常常拿出來端詳。——就是在這種對“貞烈女子”的渴欲與夢幻的對比之下，影片得以蓄積足夠的動機和動力，讓小四對小明刺下懲罰的一刀，而且，用的正是“哥兒們”的想像中貞烈女子用以殉情自殺的那把刀！如此，小四用來殺小明的刀便成了具體化的父權意識型態，涵蓋著貞女節婦／淫婦禍水、正修治平／危邦亂邦的正負對比所指涉的龐大體系。

2. 密封的國族神話(學)

本文前一部份的討論顯示，《牯嶺街》所講述的是(廣義的)父子、兄弟爭權力和女人的故事。但是，這個故事並不是電影的全部；這個故事的外緣鑲著兩道醒目的框架，那就是片首銀幕上點亮的燈，以及整部影片中一再出現的片場。這盞燈是小四家那盞(那種)昏黃的燈，也是片中眾多不足以幫助小四辨識事物的照明用具；至於片場，從故事一開始到末尾小四決定殺小馬(小明)的整個過程，它都進行著一齣驚腳、虛假的電影的拍攝，由一位無能的驚腳導演執導。以上的安排暗示著《牯嶺街》對片中故事和電影本身(也就是片中故事的生產)的自我檢視與批判。底下擬就這個層面加以探討。

2.1 片場裏的拼裝

稍後的分析將會顯示，《牯嶺街》正是一件李維斯陀(Claude Lévi-Strauss)所定義的神話或“拼裝品”(bricolage)，而執導的楊德昌則是一個“神話拼裝師”(bricoleur-mythmaker)。“bricoleur”

這個法文字指的是萬事通的工藝匠或拼裝師，李維斯陀 (Lévi-Strauss) 拿這種萬能拼裝師的拼裝品來類比神話思考 (mythical thought)：

萬能拼裝師不同於業有專精的技工，他勞動雙手並且湊合著使用種種工具。神話思考的特點就在於它假借一套雖然寬廣卻有限度的異質性招數 (a heterogeneous repertoire) 來傳達。不管要傳達的是什麼，它都必須使用這套招數，因為它沒有別的東西可用。因此，神話思考是一種心智的拼裝品。(1966：16—7)

李氏進一步說明：

萬能拼裝師的工具箱是密封性的 (closed)，他的遊戲法則則是只能使用“手邊的東西”，也就是說，只能使用一套有限的工具和材料。這套工具和材料也是異質性的，它們跟眼前的工作計劃 (或任何一項工作計劃) 無關，而是前此所有構築或銷毀活動的存留，以及翻新或充實倉儲的結果。因此之故，我們不能拿工作計劃來定義萬能拼裝師的工具…；我們只能以其潛在的功用定義之，因為這些元素代表著實在且可能的關係 (relation)，它們是“操作工” (“operators”)，但它們可以用在任何同類的作業。(1966：17—8)

神話，這“心智的拼裝品”，使用的元素則是不透明的、夾帶著文化成份的符號 (signs)，這是“過去事件的遺骸和瓦礫”、“個人或社會歷史的化石證據” (1966：20—2)。

利用上述的工具或材料，“神話拼裝師”經由“疊置、替換、平移、旋轉、逆轉”等等手法，最後弄出一套新的成品。這套新的成品跟原先那一套都各呈密封性的體系，兩者“差別只在其各部位的配置不同”。(1988：202；1966：10)

《牯嶺街》及其導演楊德昌，正是李維斯陀所描述的“拼裝品”和“拼裝師”。李維斯陀拿“拼裝品”的製作來比喻神話的形成；前者是實用層面的，後者則是人類心智的活動。《牯嶺街》的產生結合了

這兩個層面；電影的拍製一方面是藝術性的心靈活動，另一方面也牽涉著真實物質材料的配置。底下擬從《牯嶺街》的編、導、製、剪的方式與過程來說明此片的“拼裝品”特性

首先讓我們來看此片的材料蒐集和使用方式。

在一篇專訪中，楊德昌說，《牯嶺街》跟他以往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它“講過去的事，所以從製作的角度來講，沒有現成的東西，一切都必須“營造””（楊順清，1991b：130）。這段話必須跟另外一段話一起讀。參與《牯》片編劇、陳設和演員工作的楊順清引述楊德昌的說法：“只要在畫面上看到的，就要令人信服。所以拍三十年前的電影就是難在這裏，年長的觀眾就是見證人，然而三十年前的民生用品、穿著打扮樣樣都要費心去搜尋”（楊順清，1991：124）。《牯嶺街》跟楊德昌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並不在於它講述過去或未來的事，而在於在拍製這部電影時，導演和工作人員被迫變成實務層面的“拼裝師”，必須費心“搜尋”、“營造”所需的材料，就像真實的“拼裝師”一樣，他們被限定只能使用“過去事件的遺骸或瓦礫”、“個人或社會歷史的化石證據”，正如李維斯陀所描述的。在楊順清的札記裏，我們看見製片和陳設小組拿出最高度的嚴肅與認真，依據李維斯陀所指出的“可能有用”的法則，盡可能去蒐集大量的“化石證據”。而導演楊德昌則“善用現實環境所提供的條件，加以處理運用，跟魔術師變戲法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楊順清，1991：127）——於此，楊德昌變成了不折不扣的“拼裝師”。

楊德昌這位“拼裝師”所拼裝出來的，是過去某個歷史橫斷面的再現嗎？讓我們讀一段楊順清的記述：

〔小四家陳設所需的〕東西都極其難尋和瑣碎，楊導特令全體工作人員支援陳設，非得萬事齊備，否則開工也沒有意義。最後彷彿時光流轉，許多老古董紛紛出籠，煤球爐、熱水瓶、老皮包、老手錶、老眼鏡、三十年前的桌曆、漫畫和中小學教科書。還有父母親的結婚照、日本女孩照片和鈔票、獎卷、月曆、海報，

這些小道具的處理，我們是依靠照相合成及彩色影印手法才完成。(1991：125)

在這段話中，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楊德昌對材料近乎偏執的注重，他要求“萬事齊備”。我們千萬不可將此解釋為單純出於希望百分之百再現過去——也就是使“時光流轉”——的動機。不然，我們應該明察，導演的真正著眼點是擺入電影畫面和情節的一切人、事、物的嚴密配置與結構。楊順清特別提到日本女孩照片。就讓我們來看這幅照片被如何利用和配置。本文前面已討論過照片上的日本女孩在片中的功能：她被用以寄託對貞烈女子的懷想，並被用以對比小明的不貞，而且，她（在男人的想像中）用來殉情的小武士刀，最後被小四拿去用來殺小明。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分鏡劇本》（底下簡稱《分鏡劇本》）中，我們得知，小武士刀是編劇的重點，它將發揮殺小明的功能。但是，《分鏡劇本》並未擺入“日本女孩照片”；這幀照片顯然是《牯》片在進一步進行自圓、自成體系的活動過程中的產物。小四拿著小武士刀要去找小馬算帳，結果殺了的却是小明，這項安排展現出一種不可解釋的必然性；能夠造成這麼巧妙的效果，關鍵端在這把小武刀（被假想）為一個貞烈女子所有，她用它殉情自殺——這麼一把刀，由於其過去歷史所賦予的特殊屬性，當然不適合用來殺風流男子，却適合用來殺淫蕩女人。日本女孩“說不定是用那把刀殉情自殺”的說法，並無任何實據，而且，與其說是取自日本文化印象，毋寧說是取決於《牯嶺街》本身架構所分派的意義或功用。也就是說，《牯嶺街》挪用日本女孩，將她和小武士刀配在一起，以便建立它本身的骨架，那便是貞女殉情／淫婦受罰的二分對比。

類似的例子很多。茲擬再舉一例。楊順清提到，拍攝過程中，導演和製片“陸續發現了不少適合的場景，原先的〔作為夜間幽會場所的〕廢工廠改在網球場，神祕幽靜取代了雜亂隱閉；靶場也從關渡山區移到屏東內埔的萬金營區，廣漠粗曠〔曠〕的平原取代了山區”（楊順清，1991：126）。此處場景的改變是值得討論的。劇本裏將幽會場

所放在一處廢棄工廠，這項安排應是較為忠於民國50年代台灣的物質與精神面貌，却受到捨棄，為什麼呢？難道不是因為不同的景觀會傳達不同的精神屬性？當忠於史實的景觀之屬性有害作品的結構時，楊德昌的作法是捨史實性而取結構。捨棄雜亂、隱閉、阻隔等屬性，而代之以神祕、廣漠、悠遠，這種選擇清楚地顯示《牯嶺街》力求擺脫“困於一隅”的阻塞感，轉而尋求超越 (transcendentality) 所賴以成立的諸種屬性，以便製造類如精通結構之妙的詩聖杜甫所說的“篇終接渾茫”的效果，藉著作品本身所佈置的神秘浩瀚背景，而造成自成體系 (制) 而却又上 (遠) 達神靈或天庭的幻覺。

配置的努力不僅在物的層面可以看到，在人和事的層面亦然。在此擬討論兩個重要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四父的角色塑造和對警備總部的描述。《分鏡劇本》中的四父和警總跟影片中不太一樣。在劇本中，四父是一個比較權威型的父親與丈夫，他跟小孩較不親近，無論他自己或妻子 (四母) 都時而在兒女面前抬出他的父親權威；此外，他也以傳統丈夫“不聽婦人言”的態度對待妻子，甚至對妻子“大怒喝斥”，以致小四在日記上發出“如果他們更慈祥一點，我會更愛他們”的感嘆 (楊德昌等，1991：154)。至於劇本中的警總，則是一個比影片中殘酷、恐怖得多的所在；四父看見刑求用的大塊冰塊，他從門縫裏窺見有人坐在冰塊上寫自白書，而且，他在半夜聽到慘叫聲。前述所有有關酷刑的情景，都未出現在影片中；影片裏只留下一個溫文儒雅的鄧尉官，以及空曠寂靜的偵訊室和偵訊室窗外空曠寂靜的院落。如此一來，警總成爲一個靜肅中帶著神祕的所在。而影片中四父對子女擺父親權威的所有段落 (除了末尾教訓二兒子的一段之外)，以及對妻子發脾氣的部份段落，也被刪除；他變成一個以親近、平等的態度對待子女的理想父親。

第二個重要的例子是四母的角色塑造。四母恐怕是整部影片中最讓人沒得挑剔的人物，她徹底的慈愛、善良、明智；在家庭裏面，她無私無我，一切爲了丈夫和子女著想，在家庭外面，她則是個盡責的

好老師，又能對外省人、台灣人的關係有比較開放且合乎現實的看法與態度，因而是個通情達理，公德無缺的人。《分鏡劇本》裏的四母並非如此；她洞察世故，老早就看出官吏們在官僚體系裏如何集體勾結以謀求私利，但是，她却建議丈夫加入勾結，以便不受排擠。四母罔顧社會公義的看法，令正直的丈夫既憤怒且鄙夷。《分鏡劇本》的此種安排將四母寫成具有“禍水”的成份，會把危險帶給男人和大社團，因而在某個程度上也是屬於小明一類的女人；不僅於此，四母的此種人格缺憾使得男人對她有懷有疑慮與輕視，因此和諧親密的夫妻之情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影片中把《分鏡劇本》裏的前述情節刪除，使得四母成爲沒有缺點的妻子、母親、公民。

將《分鏡劇本》跟影片拿來比較，我們會發現，影片裏的四父和四母分別變成了父夫、妻母的理想典範。

不僅於此，不只個別的角色或組成元素，更是連同元素之間的關聯 (relations)，都變得更加理想、合乎規律。譬如，《分鏡劇本》收錄了警總走廊上四父看見搬運冰塊的鏡頭，此類鏡頭有助於傳達“父權機構殘暴不仁”的旨意，而且也已經耗時費力去拍攝，却在剪接影片時被隱匿，顯見其隱匿必有迫切的理由。這理由乃在於，警總以莫須有的罰名鞫訊人民的做法，和稍後四父誤認二兒子有罪而兇狠地打他的做法，兩者由於性質類似，會被歸爲同一類，如此一來，四父就會經由人類心靈的分類活動而變成殘虐的父。四父酷打二兒子的作法，確實是他受到警總影響的表現，而且，影片無疑也意圖藉四父此舉慨歎熱情的受阻撓、被誤導，但是，正因爲如此，也就是正因爲影片擺脫不了四父與警總之間的辯証關係，爲了顧全四父這個靈魂人物的基本形像，影片不得不相對地減低對警總殘暴面目的暴露。如此，四父這個角色得以明確地代表“反抗父權、試圖建立平等互信的新倫理”的努力。

四母的情況亦是如此。在她的“禍水”成份被隱匿之後，她和小明變成了相反、完全不同的兩種女人。小明是損人害群的壞女人，

而四母則是純然明智、善良的好女人。

在四父、四母這兩個基本組成單元的性質與位置確定之後，整個體系之所以成其為體系所需的其他元素及其配置，也都得以確定。如此，四父、小四、Honey²、山東、其餘幫派成員、官僚體系等等陽性組成單元，構成了一個互相對比而又互相支撐的完整結構，正如1.1節所分析的。

眾女性角色也一樣，以四母為頂點，校醫未婚妻、大姊、二姊、神經、冰店老板娘、紅豆冰、小翠等角色依序各就各位，形成與前述陽性體系相反相扣的陰性體系。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個陰性體系在常態狀況下並無小明的位置。小明不同於小翠。後者的“元素性質”本身即已標明，這是一個游走於眾人之間的陰性元素；由於性質明確，所有的組成單元，以及整個的體系，都知道如何因應這個元素的作為，因而能夠相安無爭。小明不同，她的性質曖昧不定。她一方面總是“(某某)老大的女人”，另一方面却又由於複雜的外在、內在因素，而總是挑動著其他人的慾望，造成整個體系的不穩定(見1.2-1.3節的分析)。如此，我們可以說，小明被殺，乃是《牯嶺街》的故事世界趨向內在和諧與統合的過程中，必然發生的事件。為了擺脫一個不穩定、有害全體的元素，《牯嶺街》的體系忍痛犧牲小明。這種解釋，跟劉大任所

2. 透過這個“陽性組成單元所構成的完整結構”，我們可以試圖解釋為什麼 Honey 叫做“Honey”。在《從蜜到灰》(*From Honey to Ashes*)一書的第一章〈邁向和諧〉中，李維斯陀舉證歷歷地說明，“蜜”在許多文化中都象徵美好的事物(1973:15-48)。這是很好的提示，可供我們藉以思考 Honey 的名字。對《牯嶺街》的角色與觀眾而言，“honey”這個字有三重意義：①它是“蜜”，一種來自大自然的甜美、營養食品；②它被用以指涉“甜美”的特質；③它被用來稱呼所愛之人；④它是外來字。把 Honey 這個角色稱為“Honey”，因而有著底下的意義或功能：①它傳達著對和諧、美好境界的嚮往；②前述境界是超乎人為文化的範疇的，是超越性的；③前述理想(平等共治的兄弟之國的理想)在近代歷史中是受到外來影響而產生的。“Honey”這個有著強大普同感染力的名字，使得 Honey 這個角色成為《牯嶺街》的三位一體(Honey—四父—小四)中的“聖靈”，為影片的倫理體系提供了超越的依據。此間有些批評家把 Honey 稱為“哈尼”，這是不恰當的。Honey 之所以能成為有力的符號(sign)，乃因為這個保持英文音、形的字，是“歷史的化石證據”；若刻意將它本土化，稱、寫為“哈尼”，則會使它喪失符號的功能。

說此舉“是爲了建立新世界與新倫理”的說法，基本上是同一回事，但是前一種說法顯然較能排除《牯嶺街》本身價值體系的“拖累”。

《分鏡劇本》一再明白描述小明喜好招東惹西，影片把這些部份大量且大幅度地減少。這是很高明的作法，因爲太過明白暴露小明放蕩，會將她等同於小翠，使她失去曖昧性，則“必須除掉小明這個多餘且有害的元素”之結論勢必無法達成。

如此，在《牯嶺街》這則“拼裝品”式的“國族寓言”中，我們看到，正如李維斯陀指出的，文化裏遺留的意旨 (the signified) 成了賴以進一步重新組構的意符 (the signifying) (1966: 21)。這進一步的組構，在《牯嶺街》這個案例中，靠的是以導演楊德昌爲首的編劇與拍製團隊。編劇之一的閻鴻亞說明，楊德昌所執導的《想起了你》和《牯嶺街》編劇方法大致是這樣：由楊德昌找來數位編劇（《牯》片爲閻鴻亞、楊順清、賴銘棠），他向他們敘述劇情梗概，然後合作經營，在整部劇本發展成熟後，“仍然反覆琢磨研討了好幾回，甚至爲了貫徹每一細節的恰當，不惜回過頭來更動原設定的精彩主幹。在他的作品中，會越來越看不到自外於結構的炫目獨立段落”（閻鴻亞，1991：116）。以上的組構活動會持續到剪接的階段，“一直要到完成後才停止”（楊德昌，1991b：130）。我們可以揣測，有關警總酷刑嫌疑的總總，便是在這過程中被去掉的一支“原設定的精彩主幹”，以便不會留有“自外於結構”的燕枝。

拍製的團隊也在有意無意間加入了“創作神話” (mythopoetic) ——也就是“使體系自圓”——的活動。在此讓我們來看一個很小却有趣的例子。這是關於片中車輛的使用。閻鴻亞特別提到，“〔在劇本中〕壓死 Honey 的本來是公車，到片中成了軍用卡車”（1991：119）。這個改動簡潔有力，運用軍車一箭雙雕地批判了山東（父權人物）和軍方（父權機構或體制）的剛暴。關於車輛，楊順清另有一段有趣的記述，提到製片組找到充裕的舊式車輛來源，於是“〔萬華幫經營的〕賭場的日據木造大屋也弄進兩輛骨董消防車”（1991：128）。這兩輛消

防車想來唐突，但却發揮了很微妙的效果，使得見 Honey 和出發為 Honey 報仇的先後兩幕，以及居間促成這兩項行動的本省流氓幫派萬華幫，令人產生龐巨、寬厚、既會噴火（水？）却又義勇的聯想。如此，消防車和前面提到的軍車，Honey 和山東，萬華幫、小公園幫和眷村幫，形成了二元對立的結構。

上述軍車與消防車的二元對比，觀眾不可能用理解去明辨，但却能夠感知。影片最後幾幕的情形也一樣：小貓王送給小四的錄音帶被看守所（或監獄？）管理員丟入垃圾桶；二姊廁身教堂唱詩隊的隊伍中，在悠揚肅穆的聖歌聲中無聲慟哭；小四家有接觸不良毛病的老收音機突然發出聲響，播報出大專聯考的上榜名單，小四家人愕然靜默聆聽，等等。這幾幕都不容易理解，却令人產生強烈的感觸，也就是令人發動某種近乎神秘的心靈活動。這心靈活動會令觀眾了解：有一個雖非完美但却大而完整的體系在運作著，而且這個大體系的運作和小四的罪行或受難，兩者之間存在著相反（輔？）相成的關聯。如此，影片成功地“讓觀眾感覺、而非僅靠理解辨明”小四殺小明是“一種自我犧牲的宗教淑世情操”（閻鴻亞，1991：117）。

人類心靈不靠理知 (reason) 也能思考；它能夠經由運用和理解象喻的本能活動來思考。李維斯陀指出，“象喻的過程是野蠻心靈 (the savage mind) 所造成的退化現象，是馴化心靈 (the domesticated mind) 的運作模式舉隅 (synecdoches) 的暫時壓抑。”而象喻語言是不受時空阻隔的，因為它就是“對指涉的全球性結構的原始感知 (the primitive apprehension of a global structure of signification) ——而這便是一種理解活動” (1988：194—5)。這“指涉的全球性結構”係取決於“人類心靈的構造所組成的結構” (1988：202) 以及“將一套文法秩序 (a grammatical order) 加諸一堆零散元素的普同需要” (1988：197)。

我們可以說，無論《牯嶺街》的編、拍、製團隊，或廣大的觀眾群，所忙於從事的，便是建立或找尋這麼一套“文法秩序”。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這套秩序與其說是被建立出來的，毋寧說它是在自我尋求完整結構的建立。《牯嶺街》的工作群一再提及導演對結構的注重，譬如，閻鴻亞記述楊德昌的看法：“結構是最基本、最實在的基礎，完美的結構原則，能令創作者充滿信心與安全感地創作”

（閻鴻亞，1991：118）。他們跟隨著導演，也都深深沈浸於結構的樂趣中，正如閻鴻亞和楊順清等人的記述所顯現的。而楊德昌本人，則顯然深以自己的結構功夫與對作品的主控權為傲。他抱持著“作者論”，認為“就算劇本不是我寫的，我相信電影真正在寫〔拍製〕的時候，在校稿〔剪接〕的時候，還是導演在寫的”（金馬展執委會，1991：13）。正和他的整個工作團隊一樣，為首的楊德昌也深深沈浸於組構的樂趣中。他自以為對整個的組構活動操有主控權，但是，人數龐大的工作團隊能夠深深共享組構的樂趣，以及楊德昌“身在其中”的觀點，正可以顯示，恐怕是有一套更普同、超然的組構活動在進行著自律性（autonomous）的運作，在它的帶動之下，參與組構者選擇適合的元素，並將它們一一推到適合的位置。而導演楊德昌的意志和用心，也就為這整套活動所徵用。拍《牯嶺街》的楊德昌，大大不同於前此現代主義的楊德昌，他不再預先設計並嚴格看緊每一個場景，相反地，“拍《牯嶺街》的時候，已經不太分鏡，都是到現場才分，這樣就多了很多〔現場發生的東西的〕魅力和製作上的彈性”（金馬展執委會，1991：11）。如此，“電影的創作是一直在發生的……在影片剪接完成後，會再一次驚訝的發現，它又比拍攝時的情節更活潑生動”（楊德昌，1991b：130）。

為什麼會“更活潑生動”呢？難道不是因為影片在千錘百鍊的過程中，一步步更加接近那“指涉的全球性結構”？而當作品的結構相當吻合於這“全球性結構”時，意義的生發也就無往而不通了。閻鴻亞記述道：

片子開拍後…我經常夢見到戲院看到《牯嶺街》完成後的樣子，其中一個特寫畫面只留人物邊框，內裏流動如七彩繪圖。夢

中覺得新鮮有力而毫不驚訝。醒來後知道絕不可能，卻十分清楚夢中反應的心理——《牯嶺街》的橋已經搭起來了，在這麼安全的骨架上再生出多少奇妙的變化，都是成立的了。(閻鴻亞，1991：119)

這“安全的骨架”無疑便是李維斯陀所說的“指涉的全球性結構”，當“神話拼裝師”成功地接通這個普同結構之時，他個人以及讀(聽、觀)者的自由聯想，便能夠在那全球性的電路板上，隨機接通指涉的電流，於是，“再生出多少奇妙的變化，都是成立的了”，正如閻鴻亞所說的。

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引起廣泛共鳴並流傳久遠的神話，或“國族寓言”，便得以產生。這整個活動，由於主要是在超乎個人的普同人類心靈層面運作，因此李維斯陀下了個扼要的結論：“並不是人在神話裏頭思考，而是神話在人裏頭思考”。(1969：12)

這無疑便是拍攝《牯嶺街》的片場裏所發生的事。在此，一則國族神話徵用了楊德昌及其工作團隊的手和腦，以便它得以思考並自成體系。

2.2 賴皮的國族神話(學)：走不出去的圈環

上一節的探討顯示，無論創製者或觀眾（正如寫作本文的筆者）都深深沈浸於《牯嶺街》所提供的組構遊戲中。這組構的遊戲，在創製群敲打、拼裝《牯嶺街》的過程，由於一再自我檢視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脫離本能的層面，而發展成一門相當細緻的學問。我們可以說，《牯嶺街》的眾多問世版本（劇本、長4小時多的試映版、3小時半的院線版、3個小時的錄影帶版）和拍片過程記錄，以及任一版成品的自我檢視以致得以自成體系的組構，都既是神話的組構活動，也是對神話組構活動的分析檢討——也就是說，《牯嶺街》這部影片既是神話的生產，也是神話的研究，即神話學。

這神話學具有一種解放的力量。《牯嶺街》的眾多版本和拍片記錄

顯示，眾元素可以做不同的配置，其所能產生的意義並無完全的穩定性，正如李維斯陀所指出的：“神話的研究無法按照笛卡爾原則 (the Cartesian principle) 來進行；你無法把問題分解成若干部份，以便找到解答。在此，方法論的分析沒有終點；當分解過程完成以後，也找不到隱藏的統合性。主題可以被無限制地分解” (引於 Derrida, 1978: 287)。在一套神話裏，以及研究神話的神話學裏，意義並無超越性，而是完全取決於元素與元素的相關位置與互動關係。如此，“神話的真理並不蘊含於任何特殊的內容；它是由空無內容的邏輯關係所組成的” (Lévi-Strauss, 1969: 240)。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盛讚這種神話學的解放功能，他說，李維斯陀學說最迷人的地方，便是“它明言放棄一切與中心、主體、優勢意符、起源和原初的關聯” (1987: 287)。在神話學的層面，《牯嶺街》也相當趨近於這種狀況。

如此，我們似乎可以在此終止對《牯嶺街》的分析與評價，而下結論曰：“在此片中，台灣文化開始思考‘結構的結構性’ (‘the structuality of structure’，見 Derrida, 1978: 278—80)，這是歷史性的一大步，極具解放力量”云云。

就院線電影的情形來看，《牯嶺街》確實代表著本地文化向前(?) 跨出的一大步。負責此片行銷的詹宏志說明，此片得到充份的外資，以致可以擺脫院線成規，“在拍片題材、方法概念上隨心所欲的做種種可能嘗試” (詹宏志, 1991: 135)。在“方法概念”上，《牯嶺街》依賴的也是外資，這是經由楊德昌國外留學經歷，和對西方文化、藝術的長年浸淫，而傳進來的西方影響。因而本論文拿當代西方的重要思潮作為分析《牯嶺街》的參考，這種作法應是有充份的適切性與必要必性的。

但是，《牯嶺街》對“結構的結構性”的思考，到底是往那一個方向跨出的一大步？它有多大的解放力量？為了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再次將楊德昌拿來跟李維斯陀並排比對。

實情是，不管是他們（李維斯陀和楊德昌）所要解析的神話，或是他們的神話學，都是呈現蛇頭咬住蛇尾的密封結構。我們可以說，這乃是出於一種需要，而那便隱匿的需要。出於一種罪惡感，以及由此而來的自我脫罪、自我鞏固的需要，現有的神話，以及李、楊的神話學，乃致力於隱匿罪行與犯意；而在截割了這些麻煩的環節之後，整個體系得以重新自圓。

讓我們先來看李維斯陀的情況。對李氏而言，那需要隱匿的是什麼？罪行或罪惡感何在？——那便是亂倫禁忌背後的弑父與爭奪女人。在《好妒的陶匠》（*The Jealous Potter*）一書中（1988：185—206），李氏回到他對佛洛伊德的爭辯。他批評佛氏落入對不存在的“原初神話”（the original myth）的追尋之中，循此，佛氏“找到”他自己所創發的神話，那便是以性解釋一切的精神分析。

在這本書中，李氏指名挑戰佛氏的《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一書。李氏一方面指出，此書對原始社會的解說——即在弑除大父之後，眾兄弟立約禁止奪佔母姊，如此社會和文化得以肇始——是無甚價值的，因為原始社會所產生的眾多神話本身，早已用更加豐富且微妙的情節來描述前述情況；也就是說，李氏肯定“弑父與兄弟立約”之說及其普遍性。

但是，另一方面，李氏却又一再批評佛洛伊德對性或伊底帕斯式慾望的強調。他認為精神分析式或有機心理學的（psycho-organic）符號，只是神話所採用的眾多符號之中的一套，絕不應被視為唯一或最重要的符號。接著李氏便進一步闡發他的中心理論：追求自成體系的結構才是神話的最基本性質，而不是某一種特定的內涵。

此處，李維斯陀陷入了明顯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對亂倫禁忌露出高度的關切，另一方面却又責備佛洛伊德過度關切此禁忌。我們記得，事實上，對亂倫禁忌的思考正是李氏本人燦爛緊湊的學術生涯的起點；在早期的《親族的基本結構》（*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一書中，他將此禁忌置於自然和文化的交界綫上，也就是將

之視為文化的基礎條件（見 Derrida, 1978：283）。

如此，李氏對佛洛伊德的貶抑，無異於對他本人學說之起源的否定。為什麼呢？難道不是出於難堪的不安？

不管如何，李氏捨內容而取形式，在一個個懸浮的結構及其無盡的組構遊戲中，尋求心智上的寧逸。他說，組構活動“運作愈複雜，所需的操作機巧難度愈高，其成果就愈能帶給人心智上的滿足。總之，這種活動能夠帶給人心智的樂趣，因為人們從中感受到那最為匪夷所思的變化底下的不變性”（1988：201）。

此種逃離內容而得的寧逸，實是出於李氏本人的需要，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化與時代的需要。李氏自己指出，神話所呈現的體系“製造出其內裏的方程式乃是有解的幻象”，而“這麼一個不是解答的解答，正是用以緩解心智的不安甚或存在的焦慮的方式”（1988：171—2）。只是李氏似乎未曾猜測到，他的神話學——他本人口中的“有關神話的神話”（1969：12）——也是一種緩解焦慮之道，而焦慮的來源正是他所口口聲聲貶抑的佛洛伊德學說。

佛洛伊德是幸運的，他恐怕是最後一個不受罪惡感侵襲的貨真價實的“父”。他大聲宣稱有關弑父戀母慾望和亂倫禁制令的一切；這些東西在他看來是天之經，地之義，理之所當然。

李維斯陀來晚了一步。他手執和佛洛伊德一樣銳利的理性思考之劍，却眼看著就要被新時代深處湧出的虬纏情緒所侵蝕——於是情急之下另闢（後）結構主義之路，作為理知或哲學思辨的最後逃逸路線。

但却留下足印被德希達識出。他在李氏著作中找到“一種倫理學，一種懷舊，甚至還有一種悔罪”（1978：292）。這會是什麼呢？

難道不是對有關亂倫禁忌的一整套體制的執著！

李維斯陀實際上向我們展現的，並不是解放之路，不是中心、主體、上帝、父親退位後的純然自由，而是舊體系的不朽與桎梏。他說，“一種組構一旦成立之後，就會總是以同樣的方式展開，到處生產同一組結構”（1988：204）。在以上這段文字之前，李氏以索福克里斯

(Sophocles) 描寫弑父娶母的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 為例，說明此劇的結構如何在後世別的劇本中重現。在此，李氏指的，是情節結構——而非內容主題——的重現。彷彿內容與其形式，題材與其結構，可以截然二分！這發生在一位人類學家身上，委實不可思議，因為當被組構的是人倫關係時，結構和內容如何二分？當人面對的是人倫的組構時，無論他的身或心，還有超然或逃逸的可能嗎？

而當不願放棄原有的人倫組構、而又不便明白抱住它的情境產生時，最高明的辦法無疑便是宣稱：內容無關宏旨，不用計較，重要的是結構，而這結構是不朽的，能夠到處播種複製（就像“父”一般！）

不僅於此，李維斯陀宣稱，新結構實則無從產生。無論語言或神話，“只能能在瞬間誕生。事物無法逐漸獲取意義。任什麼都不具意義的階段〔只能直接〕轉變為一切都具有意義的階段”（引於 Derrida, 1978：291）。李維斯陀的這個觀點，跟他的另一個觀點，即“神話只能從歷史的遺骸與瓦礫中取材”的觀點，擺在一起，無異宣稱：新的結構無從產生。

一切的佈署，無不指向一個目標——原有體系的保存！即使為了保存，而必須隱蔽它，也在所不惜。（這不正是潛意識——即伊底帕斯機制所製造的“雖然不去看、看不見却存在”狀態——的變形嗎？）

以上李維斯陀的解決方法，原原本本地、在楊德昌身上重現。在有關《牯嶺街》的報導或訪談中，無論楊德昌或其餘參與成員的發言，都一面側重此片的結構和技術層面，絕少論及它的主題。但是，這不意謂《牯》片的內容或主題不重要。

相反地，《牯嶺街》的主題，即禍水和父子承傳的問題，正是楊德昌過去三部主要影片的重要主題。《海灘的一天》表面上似乎是在讚頌兩個女人，骨子裏却是在哀歎一對父子之間承傳的失敗。《青梅竹馬》裏的阿隆背負著台灣歷史的遺產，最後却以虛無主義的方式，莫名其妙地因一個女人而死，此片隱隱然露出怪罪女人的意思。《恐怖份子》則對“禍水論”作辯証式的冗長、反覆思考。

在《牯嶺街》裏，禍水與承傳這兩個主題首度結合，並得到無限度的發揮。這部片子是個值得研究的案例，因為它似乎預示著台灣文化在後現代的發展方向——那便是佛洛伊德和李維斯陀的結合，也就是父（男）權結構以種種眩目的變貌不斷重新展開的狀態。

譬如《牯嶺街》，擺著自我批判、自我檢視的宣告，實際上所作的，却是父權的重新整合、再度鞏固。它隱匿父權機構的暴行，以便保住父的清白形象；它割棄“正常女人”有害（於男人）、不可解的一面，造成好女人／壞女人的二分，以便堂而皇之地拘囚好女人、去除壞女人。在這些不可見人的東西被截切、隱匿之後，父既成爲兄弟而又仍然是父，而且，眾兄弟和像兄弟的父所組成的聯盟，仍然藉著將女人界定爲他者（Other）而建立其本身的架構。

至於此片自我批判、自我檢視的層面所展現的，則是上述截割與隱匿之舉的揭發——以及此舉的必要性和整個體系的必然性的宣告。如此，我們看到，楊德昌的作法完全相同於李維斯陀。

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男人都既不願也無法走出原有的圈環。（我們要知道，《牯嶺街》所代表的，恐怕已是台灣男性對父（男）權最近距離的檢視與批判。）

（男）人已病入膏肓。即使在純粹呈現（pure presence）的最基進“殘酷劇場”（the theater of cruelty）上，也只能上演那一再發生的弑父的一幕——即使此劇沒有劇本、只演一次而且演完即被忘懷。

（《牯嶺街》上演的則是弑父之後兄弟立約的一幕；這部院線電影到處一再放映並且得到國際的嘉獎。）阿托（Antonin Artaud）因而厭倦至極，甚至連他夢寐以求的殘酷劇場也不要了。他“不想再看到那個爲父所居住和作祟、而且一再進行著弑父的地點所散發的東西”。這樣的阿托寫道：“我，安東尼·阿托，是我的兒子，／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自己。”（Derrida, 1978：249）

德希達對阿托的思考並不在這裏停止。（爲什麼呢？至少這樣還有開創新格局的可能啊！）他接下去建議，再現（representation，即

對父、神、中心、真實等等的描摹呈現) 既已展開, 便無以終止, 我們於是應該將它構思為密封的, 以便它那環形界限所圈住的密封空間會成為“遊戲的空間”(playing space), 在此我們能夠反覆思考“再現的悲劇命運——它那毫無理由、毫無基礎的必然性”(Derrida, 1978: 250)

有關父的禁制令的一切(即本文第2部份所討論的一切), 縱然有再多的不對或不好, 也最好讓它在既有的環形界限內裏, 無止盡地玩配置、變貌的遊戲。

只因爲這一切(被設定爲)有著“毫無理由、毫無基礎的必然性”。
啊, 毫無希望的賴皮的(男)人, 賴皮的神話, 賴皮的文化!

參考書目

- 台北市金馬國際影展執行委員會(1991), 《楊德昌》, 《電影檔案: 中國電影》, 第3冊, 台北: 時報。
- 楊順清(1991), 〈片場心情: 工作人員拍片手記〉, 《影響電影雜誌》, 第16期, 頁122—8。
- 楊德昌(1983), 《海灘的一天》。
- (1985), 《青梅竹馬》。
- (1986), 《恐怖份子》。
- (1991a),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 (1991b), 〈電影的創作一直在發生: 楊德昌談《牯嶺街》的拍片經驗〉, 《影響電影雜誌》, 王詩婷採訪, 第16期, 頁129—31。
- , 閻鴻亞(鴻鴻)、楊順清、賴銘棠編劇(1991),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分鏡劇本》, 台北: 時報。
- 詹宏志(1991), 〈行銷《牯嶺街》: 詹宏志談《牯嶺街》的行銷與發行〉, 《影響電影雜誌》王詩婷採訪, 第16期, 頁134—6。
- 閻鴻亞(鴻鴻)(1991), 〈《牯嶺街》的編劇事物與邊緣狀態〉, 《影響

電影雜誌》，第16期，頁116—9。

Freud, Sigmund(1974)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and ed. by James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Psychoanalysis.

Derrida, Jacques(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by Alan Ba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irard, René(1977)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évi-Strauss, Claude(1966)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The Raw and the Cooked*, trans. by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From Honey to Ashes*, trans. by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The Jealous Potter*, trans. by Benedicte Chori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四期 1993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4, March, 1993.

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 台灣個案

成露茜、熊秉純

Women, Export-Oriented Growth,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Taiwan

by
Lucie Cheng
Ping-chun Hsiung

關鍵詞：父權體制、國際勞動分工、家事工作者、家屬工作者

Keywords: patriarchy,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domestic workers, family workers

收稿日期：1992年8月9日；通過日期：1993年2月2日

Received: August 9, 1992; in revised form: February 2, 1993

摘要

本文試圖通過文獻、統計及口頭訪問資料，來說明婦女內外兼顧的雙重角色是台灣能在競爭激烈的世界經濟體系裡占一席地的必要條件。我們認為，在60、70年代，台灣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父權體系與資本主義透過家庭結構、產業組織和政府政策，強化了對婦女勞動力的剝削。婦女變成了低酬甚至無酬的生產勞動者；在家裡她們繼續擔任無酬家務勞動者和家庭勞動者的角色。政府在這一期間，刻意的塑造婦女雙重角色的形象，配合當時對彈性勞動力特別需要的經濟形成。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insights of development studies, feminist studies, and studies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We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rough analyses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statistics, and field work, that as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have penetrated the family, enterprises, and the state in Taiwan they have promoted the exploitation of women as low-waged and unwaged income generating workers, and as unwaged domestic workers responsible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and for care of the elderly. The twin ideologies that dominate state and society alike actively promote "the double burden" as an acceptable and even aspired to woman's role in the servic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role, in turn, is a necessary though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aiwan's economic advancement in a competitive world system.

過去十年裡，發展學，婦女學，及國家機器研究這三個領域互不干涉，直到最近才有學者試圖把這三個領域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 (Charlton, et al, 1989)，延承此一新研究方向，本文將對經濟發展與父權體系的相互關係加以探析。我們認為，在台灣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父權體制 (patriarchy) 與資本主義 (capitalism) 透過家庭結構，產業組織，和政府政策，強化了對婦女勞動力的剝削。在勞力市場裡婦女變成了低酬，甚至無酬的生產勞動者；在家裡她們繼續扮演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媳的無酬家務勞動者的角色 (unwaged domestic workers)。父權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導了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台灣社會發展的走向，社會大眾不但視婦女“內外兼顧”的雙重責任為當然，甚至進一步視其為促使國家進步，經濟發展的不二法門。換句話說，台灣婦女內外兼顧雙重角色其實是台灣能在競爭激烈的世界經濟體系裡躋居一席地位的必要條件。本文討論的重點將著重在台灣經濟起飛，成長最快的60及70年代，必要時，我們也將引用近幾年的資料。

學者對於促成台灣經濟發展奇蹟的因素究竟為何，意見不一，其中爭執最少的就是台灣擁有價格低廉，招募和解僱都容易的勞工。多位學者指出婦女是組成這股勞動力的主要成員 (Diamond, 1979; Kung, 1983; Gallin, 1984 a, b; 邊, 1985; Liu, 1984; 劉, 1985; 蔡, 1985; Koo, 1987; Chou, 1989)。雖然婦女對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成績斐然，但是，她們並沒有得到與男性類似的報償。在高薪，高職位的行業裡，婦女仍然是少數 (劉, 1985:40)，她們的薪資仍然不能與男性薪資相比 (Liu, 1984:96; 邊, 1985:270-1)。對於此男女不平等現象的持續，學者提出不同的解釋，有人歸咎於男女社會化的差異，有人強調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有人著重在雇主歧視女性的陋規惡習上。本文將探討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民黨政府的發展策略對男女不平等現象的影響。根據多方舉證我們指出，在經濟掛帥和父權社會主導的先決條件下，國民黨政府結合父權意識及資本主義理念擬訂了一套經濟發展政

策，目的在充分利用及剝削價格低廉、招募解僱容易的婦女勞動力。台灣之所以終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貿易市場上佔得一席之地，主要是因為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婦女扮演著廉價勞工 (cheap wage workers)，無酬家屬工作者 (unwaged family workers) 和無酬家事勞動者的多重角色。

1. 婦女勞動與台灣經濟發展

一般關於婦女勞動力與經濟發展的討論大都著重在婦女就業與勞動參與。從婦女勞動力質的改進與量的增加看來，台灣是可頗以其成果為傲。1951年，在國民黨剛移駐台灣不久，男性勞動參與率是90.0%，女性是42.1%，往後的十五年男女兩性勞動參與率均出現降低的現象，1966年男性勞動參與率降到81.4%，女性只有32.6%。導致降低的原因至今仍不甚明朗，劉和黃（1987）透過控制年齡與性別的資料，顯示其與教育水準提高，低經濟成長率，男性義務兵役的實施，高出生率和統計報告定義改變等因素有關；無論如何，在此階段，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降低，一般均認為與歧視婦女的僱傭陋規無關，甚至是好現象，因為它是婦女勞動力質的提高和婦女育幼年限增長的效果。然而仔細推究此一論調，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人口變數對婦女勞動參與率的影響並非“必然如此”，其背後有社會因素在推波助瀾。

毫無疑問的，婦女教育機會的增加有許多正面的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婦女勞動力質的提高，不幸的是，對婦女而言，增加受教育的機會，並不意味著男女平等的來臨，誠如 Greenhalgh (1985) 指出，教育水準的提高和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降低，意味著男女不平等程度的惡化。許多受初中或高中教育的年輕少女加入就業市場的目的是為了賺錢使她們的弟弟或哥哥能完成更高的學位。換句話說，婦女教育水準的提高並沒有使得婦女相對於男性的地位提高，它只代表整個家庭在婦女教育上的投資報酬率提高了，父母因而願意增加對女兒教育的投資，使她們能有機會找到一個“好賺錢”的工作。

劉和黃（1987）所提的生育率與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負相關，它所反應的其實是社會價值體系的結果而非生理上的必然性，例如，要求婦女在生產後離開就業市場以便撫育幼兒，這並不是因為生理上的需要，而是一個“約定成俗”的社會現象，資本主義的僱用方式使工人的報酬取決于他的生產力，而不顧慮到其他社會需要，對婦女尤其不利，因為婦女往往被社會要求要同時兼顧育嬰家務。

2. 婦女勞動參與的彈性特質

大部份討論台灣兩性勞動參與的文章都以1966年為起點，從1966年起台灣經濟結構的變遷直接反應在勞動力市場上。對婦女而言，其勞動參與率從此呈鉅齒狀成長，到1987年，38.1%（三百一十萬）的勞動人口是婦女（行政院，1989: 5）；就婦女本身而言，1966年32.6%的15歲以上婦女在就業市場內，1987年增加到46.5%。我們將從婦女勞動參與增加的時期，婦女勞動參與率成長的趨勢，及婦女的低報酬三方面來證明婦女對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

婦女勞動力增加最顯着的時期是在1966年到1973年之間，這也是台灣以勞力密集為主的出口加工業萌芽成長的時期。在這段期間，婦女勞動參與率由32.6%增加到41.5%（表2-1），而男性勞動參與率則維持不變，這個趨勢表示，在國際勞動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市場的轉變下，台灣經貿政策也跟著轉變。

資本主義在60年代中期的重整，為邊陲及次邊陲國家創造了進入世界體系的機會，台灣因為能即時動員其資源而充分掌握了這個機會。外資，國內資金累積，國民黨政府政權的獨立自主，政治穩定，以及外貿市場的拓展，使得台灣能發展出一套以出口為主的經貿政策。這個以勞力密集為主的出口貿易政策，需要一群數量龐大，價格低廉，以及招募解僱容易的勞工，婦女勞動力正符合這些條件。台灣婦女勞動力不僅降低了工廠的工資成本，而且還增強了台灣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邊，1985; Gallin, 1990）。此外，應用婦女勞動力也有

表2-1 台灣地區1965至1987年男女勞動力參與率和失業率

單位：%

年別	勞動力參與率		勞動參與成長率		失業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65	82.6	33.1	2.1	0.8	2.3	5.9
1966	81.4	32.6	2.1	2.0	2.3	4.9
1967	80.9	33.7	3.0	7.5	1.8	3.5
1968	80.2	34.4	2.8	5.9	1.6	2.0
1969	79.2	35.4	2.9	7.0	1.6	2.6
1970	78.9	35.5	3.9	4.2	1.5	2.2
1971	78.4	35.4	3.5	3.7	1.5	2.1
1972	77.0	37.1	2.2	8.9	1.2	2.1
1973	77.1	41.5	3.4	16.0	1.1	1.7
1974	78.2	40.2	4.9	0.3	1.3	2.0
1975	77.6	38.6	2.7	-0.8	2.1	3.1
1976	77.1	37.6	2.7	0.8	1.6	2.1
1977	77.8	39.3	4.2	8.1	1.7	2.0
1978	78.0	39.2	4.5	3.2	1.6	1.9
1979	77.9	39.2	2.5	3.4	1.2	1.5
1980	77.1	39.3	1.3	3.0	1.1	1.5
1981	76.8	38.8	2.2	1.7	1.2	1.6
1982	76.5	39.3	2.3	4.1	2.3	2.3
1983	76.4	42.1	1.8	9.6	2.7	2.7
1984	76.1	43.3	2.0	5.2	2.4	2.5
1985	75.5	43.5	1.7	2.8	2.9	2.9
1986	75.2	45.5	2.0	7.1	2.8	2.5
1987	75.2	46.5	2.2	4.4	2.0	2.0

資料來源：行政院，1988，頁52-3。

助於紓解美國等核心國家的通貨膨脹壓力 (Mies, 1986)。

相對於男性勞動力，婦女勞動力有彈性得多。此可由婦女勞動力的急劇起伏顯示出來。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對世界經濟的波動也比男性勞動參與率敏感得多 (Chiang and Ku, 1985:8-9)。概括說來，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是隨著台灣的經濟周期升降的 (Chou, 1989:437-8。)

從表2-1的資料看來，男女勞動參與年成長率有相當大的差距。男性年成長率的波動較小，從74年的4.9%到80年的1.3%，反觀女性勞動參與年成長率不但幅度較大，並且呈鉅齒狀，1973年曾達16%，這自然與台灣採取以勞力密集工業為主導的發展策略有關。女性勞動參與成長率在1974年降到0.3%，次年因石油危機淪為負數之後，幾乎過了十年才得以恢復。同表在失業率的比較上，女性也比男性波動大。女性失業率變動甚大而且頻繁，並且一次比一次差距擴大。

與男性相比，女性就業與否不僅較易受景氣循環的影響，也較易隨個人與家庭生命週期 (life-cycle) 的改變而變動。年齡，婚姻狀況與子女的多寡對女性勞工之參與勞動市場與否，有決定性的影響。女性在25至34歲間，也就是新婚及生下第一胎之後，多有離開就業市場的傾向。35歲後，在家庭責任轉輕之際，她們往往重新加入就業市場。也有許多女性在35歲後，留在家裡全心全力照顧年長者。男性則沒有這種家庭責任及顧慮，他們往往一直留在就業市場直到退休年齡 (表2-2)。

表2-3充分顯示結婚與否對男女勞動參與率的不同影響。對於單身人士來說，男女勞動參與率的差別不大。而對已婚人士來說，所有年齡層的男性勞動參與率均高過女性勞動參與率兩倍以上。六歲以下學齡前子女，往往大幅度降低婦女的勞動參與率 (劉玉蘭, 1985:76-7)。在整個就業結構與昇遷評估標準是以男性為考量重心所發展出來的情況下，婦女往往處於極端劣勢。因為她們的職業生涯，常因家庭責任中斷。也就是說女性因生育而必需提早或頻繁離職，往往使她們更成為被剝削的廉價勞工。

表2-2 不同年齡層男女勞動參與率之比較

單位：%

年齡	1966		1974		1983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19	54.6	54.7	49.9	52.4	76.4	39.2
20—24	84.0	46.6	78.7	54.3	36.2	60.9
25—29	97.3	28.9	96.6	36.7	75.9	46.5
30—34	98.1	28.7	98.8	37.8	95.3	46.9
35—39	98.3	33.2	98.8	53.5	98.1	48.9
40—44	96.9	30.6	98.5	47.9	98.1	48.0
45—49	95.1	27.4	96.1	41.4	96.1	52.9
50—54	89.1	20.0	89.0	32.6	89.8	35.0
55—59	71.4	11.7	82.8	19.4	79.7	26.8
60—64	46.2	6.0	52.7	7.0	60.2	15.6
65+	17.2	1.5	11.8	1.0	15.4	2.7

資料來源：蔡青龍，1985，頁303。

表2-3 台灣地區不同婚姻狀況、年齡層男女勞動參與率之比較，

1984年

單位：%

年齡	男			女		
	未婚	已婚	離婚、喪偶	未婚	已婚	離婚、喪偶
15—19	30.2	90.8	—	33.4	30.7	100.0
20—24	70.5	97.3	100.0	76.8	34.1	91.3
25—34	91.2	98.9	94.7	86.1	41.8	71.5
35—44	89.0	98.4	96.2	76.0	50.0	63.2
45—54	83.3	94.6	90.3	61.5	39.5	43.3
55—64	50.3	75.4	56.7	42.6	21.8	20.5
65+	10.4	18.0	8.5	32.4	4.3	1.7

資料來源：劉玉蘭，1985，頁25。

3. 女性勞工淪為廉價勞工

到底女性勞工在台灣有多廉價呢？我們將檢視男女薪資間的差異及女性薪資。台灣政府向來以勞工廉價及順從做為招攬外資的宣傳口號。部份學者指出低薪與缺乏福利為女性勞工之特點 (Kung, 1983; Cumings, 1987; Deyo, 1989)。實際上，許多學者主張這些特徵為女性勞工在資本主義中存在的理由。如表3-1和3-2顯示，在台灣經過20年的成長後，女性勞工仍多集中在各行業的低階層工作，而且大部份就業婦女受雇於工資低廉的勞力密集工業。

與其他國家相同，在台灣，女性與男性仍同工不同酬。事實上，兩者間的差距不僅持續，甚至在某些行業，這個差距在過去20年裡有

表3-1 台灣地區男女就業行業結構分佈之比較

單位：%

行 業 別	1966		1970		1980		1988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農 林 漁 牧 狩 獵 業	42.6	46.0	35.1	40.6	20.2	18.1	15.2	10.6
礦 業	2.0	0.4	2.7	0.8	0.9	0.3	0.5	0.2
製 造 業	17.2	17.5	19.7	21.9	29.3	39.9	31.7	39.0
水 電 煤 氣 業	1.0	0.2	1.0	0.3	0.6	0.1	0.6	0.1
營 造 業	4.8	0.6	7.0	0.7	11.7	2.0	10.6	1.9
商 業	11.4	13.7	14.0	16.1	15.0	17.9	17.7	22.5
運 輸 倉 儲 通 信 業	5.9	1.7	7.0	1.9	7.7	2.3	7.3	2.1
金 融 保 險 及 工 商 服 務	15.2	19.9	13.6	17.8	2.0	2.5	2.9	3.8
公 共 行 政、社 會 及 個 人 服 務	—	—	—	—	12.8	16.8	13.7	19.9
總 計	2,702	945	3,121	1,425	4,375	2,191	4,946	2,986

資料來源：1966、1970、1980年：劉克智、黃國樞，1987年，頁100；1988：行政院，1988，頁8—9。

附註：總計是以千人為單位，15歲以上之人口。

表3-2 台灣地區男女就業職業結構分佈之比較

單位：%

職業別	1970		1980		1984		1988*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專門技術性人員	(a)	0.3	—	0.3	—	0.3	—		
	(b)	2.6	0.6	2.4	0.6	2.8	0.8		
	(c)	9.4	12.0	11.0	14.5	10.9	14.3		
	(d)	22.8	23.8	26.9	33.1	26.2	32.6	6.2	7.8
行政及主管人員	(a)	0.1	—	—	—	—	—		
	(b)	9.3	1.0	2.6	0.1	2.5	0.2		
	(c)	5.3	1.6	1.1	0.2	1.1	0.2		
	(d)	6.8	2.0	1.8	0.3	1.6	0.2	1.3	0.2
監督及佐理人員	(a)	0.5	0.3	0.6	0.5	0.5	0.8		
	(b)	6.3	8.3	14.6	13.6	14.4	14.5		
	(c)	13.0	12.8	15.6	26.9	15.3	26.4		
	(d)	19.7	14.7	21.4	21.4	20.1	22.4	11.5	20.3
買賣工作人員	(a)	0.1	—	—	—	—	—		
	(b)	4.7	4.5	3.1	0.9	3.0	0.8		
	(c)	32.8	38.5	30.7	30.2	31.7	30.3		
	(d)	0.9	1.2	0.7	1.1	1.0	1.1	14	5.1
服務工作人員	(a)	—	—	0.1	0.3	—	0.2		
	(b)	1.6	1.6	2.4	1.1	2.1	1.1		
	(c)	11.8	21.8	14.6	20.3	15.3	22.3		
	(d)	22.3	39.7	22.6	27.6	23.4	30.5	7.3	11.8
農林漁牧狩獵工作人員	(a)	98.0	99.5	98.4	99.0	98.4	98.7		
	(b)	1.0	0.6	—	—	—	—		
	(c)	0.6	—	0.1	—	0.1	—		
	(d)	0.7	—	0.2	—	0.3	—	15.1	10.6
生產作業人員	(a)	1.1	0.2	0.6	0.3	0.6	0.2		
	(b)	74.5	83.3	74.9	93.6	75.2	82.6		
	(c)	27.2	13.2	26.9	7.8	25.6	6.4		
	(d)	26.8	18.6	26.4	16.5	27.4	13.2	44.1	34.2

資料來源：劉克智、黃國樞，1987，頁140-1；行政院，1988。

附註：a.農業；b.製造業；c.服務業；d.社會與個人服務。

*1988年的數字為所有行業就業者之分佈比例。

增大的趨勢（劉克智，1984:95—8；劉玉蘭，1985:56-66；劉克智與黃國樞，1987）。表3-3顯示過去10年裡，在所有九個行業中，有五個行業出現男女薪資差距繼續惡化的現象。1970年代男女工資幾近相當的成果，在1980年代幾乎完全消失，採用1980年的資料，劉克智（1984）發現，個人條件（human capital）的不同並不能完全解釋男女薪資上的差異。

性別歧視在台灣雖被廣泛的認知，但却未被廣泛的譴責。根據一份分析報紙分類廣告的研究報告指出，高薪職位往往只偏好男性，對於低薪職位，報紙廣告却標明“只限女性”（婦女新知第59期，1987：8）。官方雖聲稱男女平等，但在其公職任用上却歧視女性（丁志輝與柏青容，1987），女性往往不准參加某些高權位公職的高考、普考，例如在海關，外交，國際新聞業及勞工處的高階級職位。某些公職對女性職員有一定的限額。譬如，1985年的領事人員考試，預計錄取五十人，但是政府公然宣佈女性的名額不得超過七人（鄭至慧與薄慶容，1987：8）。當政府官員被質詢有關此項性別歧視時，他們的回答是，對個人及整體社會而言，女性最好只做她們真正擅長的事。內政部長甚至公開宣稱，女性應以能減輕丈夫對家庭的顧慮為榮，而不是只在乎自己的事業能否更上層樓（婦女新知第五期，1982：13-4）。

實際說來，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高估了女性佔支薪工作的人數，因為兩項統計均包括了大量的無薪家屬工作者，大部份這些人都是女性。表3-4顯示，在所有行業裡，女性無薪工作者之比率均高過男性。而在無薪家屬工作者中，女性人數遠超過男性。還有什麼勞工比無薪勞工更便宜？

女性的有薪與無薪勞工成長，與台灣政府出口貿易政策有直接的關聯。因為政府的財政與稅率政策鼓勵企業從事外銷加工（Directory of Taiwan, 1963：164-174；于宗先，1981），外銷工廠的擴張刺激家庭婦女進入就業市場，而政府贊助的“客廳即工廠”計劃更是充分利用家庭及社區裡的女性勞工。客廳與工廠的合一，使得女性的勞力

表3-3 台灣地區不同行業男女平均月薪之比率比較

行 業 別	單位：%			
	1973	1978	1984	1988
農 林 漁 牧 狩 獵 業	—	56.8	51.9	55.0
礦 業	37.2	65.8	53.6	55.2
製 造 業	54.4 ^a	61.0	61.1	57.6
水 電 煤 氣 業	68.5 ^a	75.1	74.0	81.6
營 造 業	65.4	75.8	68.0	71.9
商 業	—	72.6	68.0	68.4
運 輸 倉 儲 及 通 信	71.7	71.2	75.0	76.7
金 融 保 險 及 工 商 服 務	—	59.2	68.0	65.1
公 共 行 政、社 會 及 個 人 服 務	71.3	72.7	75.7	72.8

資料來源：1973年：行政院，1974，頁682；

1978、1984年：劉克智，1985，頁61-2；

1988年：行政院，1988，頁90-1

附註：a.製造業、水電煤氣業之百分比，乃由1972年的資料計算得出。

表3-4 農業、製造業、商業、及服務業中男女無酬家屬工作者之分佈比較

年 別	單位：%								
	農 業		製 造 業		商 業		服 務 業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66	(a)	28.7	74.9	4.4	12.1	8.3	41.6	2.0	7.2
	(b)	48.8	51.2	48.6	51.4	31.9	68.1	34.9	65.1
1971	(a)	23.0	78.9	2.8	9.7	8.2	43.2	2.0	5.7
	(b)	38.4	61.6	32.3	67.7	27.0	73.0	36.5	63.5
1976	(a)	20.9	71.4	2.5	4.7	6.6	36.3	1.3	4.6
	(b)	38.0	62.0	44.6	55.4	26.5	73.5	34.2	65.8
1981	(a)	16.1	65.8	2.4	4.6	6.2	36.3	1.4	5.2
	(b)	37.1	62.9	43.1	56.9	22.0	78.0	28.6	71.4
1986	(a)	16.5	67.3	1.9	5.3	6.6	36.3	1.4	5.8
	(b)	34.7	65.3	30.7	69.3	19.9	80.1	22.5	77.5

資料來源：周碧娥，1989，頁450-7。

附註：a.在特定行業中，男女無酬家庭工作者之分佈比率。

b.無酬家庭工作者中，男女之分佈比率。

負擔加重及工時延長。女性勞動參與率及就業率的增加並不表示女性生活的改善或地位之提昇。相反地，這只意味了對女性剝削的強化。如今，在原本的家務負擔之外，婦女得從事報酬微薄的工廠勞動。總括說來，女性就業人口之增加其實是資本主義生存的必要條件，這不應被視為男女平等之勝利。

4. 女性色情行業與政府

女性勞工中常被忽略的一項，也是對台灣資本累積有極重要貢獻者，就是色情勞工。關於這個主題的探討有很多，但討論的重點大部份都是著重在道德，以及對女性生理剝削的論題上，很少觸及到它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從1950年代起，台灣一直被視為男性觀光客的天堂。除了有登記註冊的妓院，還有許多以各種行業作為掩飾的商業色情服務。這些行業包括觀光理髮廳，溫泉澡堂，按摩院，酒家，咖啡廳，及餐館。這些色情行業通常被台灣政府統稱為“特定”或“特種營業”。表4-1顯示，妓院的數量在1967年到達頂點，其後則開始下跌，而酒家的數量則在同時期上漲至兩倍之多。雖然很可惜地，台灣政府已不再公佈有關特種營業的資料，不過大多數人都知道哪裡有色情服務（婦女新知，1987，66期：10）。其中，“牛肉場”則是最近興起的色情行業。

促成色情行業在台灣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成長的原因有二：美軍的駐兵以及美國率先以旅遊業促進第三世界之開發。韓戰越戰促成亞洲地區色情交易之增加，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雖然其確切影響有待進一步研究。台灣，南韓，泰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城市，均為美國大兵最喜歡留連的色情場所。這些地區的婦女相繼成為女性色情行業的剝削對象（Kim, 1987; Truong, 1990）。在戰爭結束後，這些色情行業仍繼續對觀光客提供色情服務。

第三世界觀光業的發展與全球政治經濟有密切的關係（Truong, 1990）。美國政府為了使50年代銀行在航空業所做的大量投資成本回

表4-1 台灣地區色情行業之分佈情形，1946-1974

單位：間數

年別	旅棧	茶室、咖啡屋	酒家	舞場	妓院
1946	866	—	—	11	216
1947	969	—	—	—	—
1948	932	—	—	—	—
1949	902	—	—	—	—
1950	801	—	31	—	—
1951	842	346	56	—	—
1952	892	546	88	—	—
1953	961	786	86	—	—
1954	1,093	930	54	—	—
1955	1,137	930	52	—	—
1956	1,251	1,001	—	—	—
1957	1,326	984	—	—	249
1958	1,479	1,043	—	—	349
1959	1,576	1,030	—	3	424
1960	1,671	963	—	8	463
1961	1,782	1,002	—	11	476
1962	1,897	793	—	15	453
1963	2,014	825	—	17	412
1964	2,143	801	—	27	529
1965	2,272	859	—	32	509
1966	2,403	756	—	31	489
1967	2,949	765	76	46	636
1968	2,662	629	163	33	452
1969	2,802	596	449	25	384
1970	2,864	568	429	25	355
1971	2,916	511	372	25	337
1972	2,974	485	342	25	319
1973	2,997	451	407	25	311

資料來源：行政院，1974，頁188—9。

收，大力鼓吹觀光業在第三世界的發展。亞洲諸國家尤其是它的推展對象 (Truong, 1990)。觀光業被視為維持和平，製造和諧的行業。但是以觀光業在政治上及文化上的功能，還不足以說服發開中國家以大量資金去購買客機，建造豪華旅館及其他觀光設施。經過美國一再的努力，發展觀光事業才變成這些國家向世界銀行、聯合國、及國際性機構吸取資金及技術協助的計劃。由於觀光業可以吸收到大量的外幣，這造成許多亞洲國家以觀光業作為開發的策略。

台灣政府在韓戰後開始提倡觀光業。自此，縣議會與輿論對於發展觀光事業的利弊，展開一系列熱烈的辯論。觀光業的支持者，強調觀光業對台灣經濟、政治、及文化方面可能造成的正面影響，他們指出觀光業有賺外匯、吸取外資、及擴展外貿的潛力 (鄧文儀, 1975: 402)。而在政治立場上，觀光客則是最有價值的鼓吹者，他們可以向世界介紹台灣的發展，因此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此外，觀光業更可發展中國傳統文化 (周揮彥, 1966)。而反對者則指出，觀光業所帶來的經濟及其他利益，還不足以補償其所造成負面的社會影響 (李元貞, 1987; 瞿海源, 1984)。婦女團體與人權運動組織譴責政府串通色情交易商人，沒有澈底實行現有的法律，或沒有通過新法律使得娼妓合法化，祇在“註冊”與“地下”色情勞工間作無意義的區分 (婦女新知, 1986—87)。即使是觀光業發展的支持者都承認，基於商業的利潤動機，觀光業確實造成色情交易的滋生，同時也影響了台灣一般民眾的道德觀 (詹純鑑, 1966: 5—9)。然而台灣政府却以色情業者“破壞良好社會風氣”為藉口，禁止從事此行業的婦女組織工會。(婦女新知 1988, 69期: 14)。

觀光業主要在滿足觀光客的視覺、聽覺、味覺等各式感觀經驗，其特質是個人需求的商品化 (Truong, 1990)。讓觀光客有賓至如歸的感受是其最終目的。台灣政府機構與觀光業者為招攬觀光客特別強調親切，懇懇的服務態度。其中尤以中國女性的順從、服貼、溫柔、善解人意、性感、及誘惑為重點 (Directory of Taiwan 1963:

178—180)。在政府手工藝品店及辦公室的觀光客手冊裡，均印有誇大台灣女性性感吸引力的廣告。色情遊覽團的從業者，更以文字圖片詳細描述色情服務的種類及價格，使外國觀光客相信他們可以在台灣充份滿足其性慾。某份政府出版刊物，甚至在讚頌台灣自光復後的進步之餘，還強調我們有無窮的“歡樂資源”正待開發…（鄧文儀，1975：403—4）。

因為性病不僅會嚇走觀光客，也同時會使政府蒙羞，為了防止性病氾濫，台灣政府以法令控制娼妓及其他的色情交易。大致說來，這些法律採取兩個途徑：其一，為確保安全性交，政府要求娼妓持有並出示健康證明；其二，以增加執照稅和營業稅來限制特種營業的數量。女性色情勞工與外貿的連結是許多台灣有名作家的寫作題材（黃春明，1981）。雖然我們無法確切估計，到底色情行業對台灣的經濟成長有多少貢獻？但無疑地，它對政府的觀光事業歲收貢獻良多。將台灣觀光事業的年收入視為外銷貿易，在過去二十年中，它的收入在出口貿易總收入額中排名第四到第六（鄧，1975：402）。表4-2顯示從1953年到1973年，即台灣外銷成長起飛時期，觀光事業收入之成長。

表4-2同時顯示在同一時期，來台觀光人數從15,000人成長至824,000人，此成長主要由於日本觀光客的激增。1957年美國觀光客比例超過所有其他觀光客，達70%，1973年美國觀光客比例降至20%，同年日本觀光客構成觀光客的72%（行政院，1974：516—7）。日本男性因色情遊覽消費而惡名昭彰，他們的惡行一直是日本婦女及其他亞洲國家婦女示威的目標（Kim, 1987；婦女新知，1987；Truong, 1990）。當國際獅子會於1986年在台北聚會時，以整幅版面報導指點觀光客何處可去“買春”的報紙廣告比比皆是。台灣婦女因而舉著中文、英文、及日文的旗幟示威：“歡迎到台灣來建立友情，而不是色情”。（婦女新知，1986，62期：6）

在色情交易中，傳統觀念女性的自我犧牲及順從，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女兒多半為了家境不佳或是供給兄弟教育經費，而“自願”或

表4-2 台灣地區之觀光事業

年別	觀光人數	觀光人數 成長率(%)	觀光外匯 收入估計(美元)	觀光外匯收入 成長率(%)
1956	14,974	—	935,876	—
1957	18,159	21.3	1,134,938	21.3
1958	16,709	8.0	1,044,313	-8.0
1959	19,328	15.7	1,208,000	15.7
1960	23,636	22.3	1,477,251	22.3
1961	42,205	78.7	2,637,914	78.7
1962	52,304	23.9	3,269,000	23.9
1963	72,024	37.7	7,202,000	120.3
1964	95,481	32.6	10,345,000	43.6
1965	133,666	40.0	18,245,000	76.4
1966	182,948	36.9	30,353,000	66.4
1967	253,248	38.4	42,016,000	38.4
1968	301,770	19.2	53,271,000	26.8
1969	371,473	23.1	56,055,000	5.2
1970	472,452	26.9	81,720,000	45.8
1971	539,755	12.2	110,000,000	34.6
1972	580,033	7.5	128,707,000	17.0
1973	824,393	42.1	245,882,000	91.0
1974	819,821	-0.6	278,402,000	13.2
1975	853,140	4.1	359,358,000	29.1
1976	1,008,126	18.2	466,077,000	29.7
1977	1,110,182	10.1	527,492,000	13.2
1978	1,270,977	14.5	608,000,000	15.3
1979	1,340,382	5.5	919,000,000	51.2
1980	1,393,254	3.9	988,000,000	7.5
1981	1,409,465	1.2	1,080,000,000	9.3
1982	1,419,178	0.7	953,000,000	-11.7
1983	1,457,404	2.7	990,000,000	3.9
1984	1,516,138	4.0	1,066,000,000	7.7
1985	1,451,659	-4.3	963,000,000	-9.7
1986	1,610,385	10.9	1,333,000,000	38.4

資料來源：行政院，1987，頁397。

附註：1956—1961年觀光外匯收入資料，來自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65年，頁18—32。

被生、養父母推進火坑（婦女新知，1986，47期：2—3，呂秀蓮，1986）。雖然沒有官方正式的統計資料可循，但一般估計，1989年女性勞工從事於色情行業的人數大約超過30萬，其中包括來自東南亞的女性，及年僅11歲原住民的少女。她們的顧客包括來自海外的華僑及外國觀光客，這些外地來的買春客，不僅能以極低廉的價格，滿足他們的性慾，更重要的是他們能享受到在台灣政府監督管理下的性交易。在台灣，女性色情勞工與其他女性勞工一樣，一直是國家成長、開發策略下被剝削的對象。她們變成台灣的珍奇特產，足以“吸引觀光客，助填滿機位及旅館房間。來自住宿，食物，飲料，及服務上的稅收使政府從中漁利。不同於她們的肉體，娼妓對整個資金累積過程的貢獻一直是無形的。”（Truong, 1990：128）政府雖然公開譴責從事特種營業的女性，並且定期逮捕無照娼妓，但同時又鼓勵繼續以色情業吸引觀光客。

5. 女性之無酬家務勞動

國家統計數字並未顯示出，婦女從事之必需却單調繁瑣、費時且無酬的家務勞動。許多研究不斷指出在，大多數社會裡，男人大半是不做家事的（Miller and Garrison, 1982，魯宇島1984）。即使偶而分擔家務，他們做的家事多半是有選擇性的，且做得心不甘、情不願的。台灣女性因社會化的結果，相信做家事是女人的天職。她們雖然偶爾抱怨一下，但從不奢望得到男性的幫助。

女性之無酬家務勞動和經濟發展有何關聯呢？廣泛說來，女性所扮演的家庭主婦與母親的角色，以生育及供養勞動人口來創造經濟成長。但是，女性之無酬家務工作不祇是生理上繁衍新一代勞動人口而已。調查指出，家庭主婦是國內市場主要的消費者。在台北地區，所有家庭開銷中的59.4%是由家庭主婦決定的，另外的14.7%的家庭開銷，則是由家裡其他的女性決定的（婦女新知，1983，16期：6-7）。台灣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發展出一套極先進的消費方式，這種消費方式

為商品及服務業帶來一個不斷成長的市場。難怪所有消費廣告都是針對女性而設計，而婦女也開始感到自己有影響大企業生意的潛力。

此外，女性始終是維持家庭成員生活安定，精神振奮的支柱。中國傳統視女性在維護家庭及社區之和諧所扮演的角色，為國家發展之重要關鍵 (Diamond, 1973；劉克智與黃國樞，1987)。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繼續以教育媒體及種種宣傳活動來營造這種中國婦女的形象。

70年代在歐洲及美國許多學者與政客熱烈爭論“為家務爭薪”(wages for housework)，顯示家務勞動的價值 (Kaluzynska, 1980)。1983年當《婦女新知》指出，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經濟價值大約是每個月 \$ 35,000，高過一個大學副教授的月薪後，無酬家庭勞動在台灣成為公眾的爭論點 (1983, 16期：17)。在《婦女新知》的估計裡，它只包含了烹飪、洗衣、打掃、照顧年長者、及一星期督導子女課業兩次。一般購買食物、衣服、及日常用品等家庭管理及消費相關勞動的經濟價值則不包括在以上的估計中。近來，金錢雜誌根據其子女的數目與年齡計算發現，一中產階級已婚婦女至少每月需賺台幣18,620元至36,620元，才值得出外工作。(錢，1990：162)。當考慮到一般大專教育水準女性的中等月薪為台幣17,146元時，則讓家庭主婦出外賺取收入，對家庭的經濟就不一定有助益了。

女性免費地對年長者、子女、及病人所付出的關心與照顧，減低了政府社會福利的成本。這筆節省下來的經費對台灣尤其重要，因為台灣政府向來運用大筆預算在國防經費上。女性無酬勞動所節省下來的經費可以用在政府認為重要的投資生產上。

有些學者預測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終將嘉惠女性。然而，由許多先進國家的經驗看來，我們並不樂觀。經濟發展並未如預期般地減輕女性家務勞動的負擔。以男性為主的官方機構並不重視女性的權益。能夠減輕家務負擔的機器與服務，並不容易在開發中國家取得。就算是家務機械化了，它只改變家務勞動的方式，並沒有真正達到省時的目的。從某單一勞動上省下來的時間，或者花在其他的家務上，

或者用來提高整個家務的標準而已。

一般而言，家事的機械化與商業化，為所有女性創造了出外受雇的機會，但對不同階級的女性而言，仍有不同的影響。勞工階級的女性以生產機器及提供家務服務，使得中產階級的女性能夠找到更好的工作。這兩階級的女性愈來愈需要賺錢來維持家庭的生活水準。對中產階級女性而言，她們也許可以用消費的方式減輕一些家務責任，勞動階級女性，則因買不起家電用品或請不起佣人，而繼續負著操做家務的沉重擔子。台灣的資料顯示，15%以上的經理級或專業性的已婚職業婦女，依賴佣人幫助照顧子女（Lu，1984：367）

雖然，經濟成長為一般人帶來了更多的閒暇，但男人並沒有利用閒暇幫忙家務。實際上，男性的閒暇是來自於女性的無酬家庭勞動。研究指出，就業的男性比就業的女性及全職的家庭主婦，擁有更多的閒暇（Waring, 1988：163），男人寧願和其他男人一起消磨空暇。在美國，男人以飲酒、玩牌、露營、釣魚、看球賽或是看電視來消磨閒暇。在台灣，男性消磨閒暇的方式也許不同，但是期望他們以分擔家務來消磨時間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家務操作有彈性，而且很多家事沒有一定的標準（家裡不一定非要一塵不染，衣服也不一定非燙不可），所以家務並不妨礙婦女從事無酬但能增加家庭收入的工作、或者做家庭代工，也就是說婦女實際上做內外兩份工，可是表面上看不出來。這是因為在父權體系社會裡，只有男性的工作才被視為工作，婦女做的工作——家務操勞——根本不被認為是工作。

6. 有酬工作與無酬工作：女性工作之延續

Mies (1986) 主張，在資本主義下，人們已習慣用男性的標準來衡量女性所做的工作。大部份的男性上班時間固定，上班場所遠離家庭，而且上班時不受家務打擾。他們定時領薪，工作也受不同程度的官方保護。女性工作的性質及條件大不相同。雖然，女性從事受雇工

作的人數逐漸增加，但大多數女性還是從事家務勞動。很多女性就業於非正式經濟制度 (informal economy)，她們的工作沒有保障也不受保護。對大多數女性而言，家務和上班是連為一體的。如果用男性工作的性質和標準，來衡量或了解女性做的工作，往往造成誤導。因此女性主義學者主張，根據女性工作的特質發展出一套新的定義 (Beneria, 1982; Mies, 1986; Waring, 1988)。一些在台灣出口業工作女工的生活片斷，可能有助於這一新概念的建立¹。

女性的日常作息是以她們做妻子、母親、及媳婦的家庭責任為軸。

1. 梅倩每天早上 8 點左右，在丈夫上班後，到家附近的小工廠做著色玻璃的工作。11 點左右，她回到離工廠五戶之遠的公寓為她丈夫做午飯。1 點左右在她丈夫回去上班後，她又繼續至工廠工作直到大約 5 點半或 6 點，然後回家做晚飯。晚飯後她繼續為帶回的玻璃上彩、一面等水洗衣服。直到半夜後她才就寢。

2. 阿夏和她的小姑，輪流分擔照顧她公公的責任，一人負責 15 天。輪到阿夏的 15 天時，她早上 6 點左右起床，在去工作前為她公公準備好早飯及午飯，因為她公公堅持要在 11:45 時吃午飯。阿夏中午 12 點回家吃剩的飯菜。12:50 回到工廠，到 5:10 才回家。晚飯後她又回工廠直到晚上 9 點。

3. 這星期輪到阿秋留在家裡照顧她臥病在床十年之久的公公。她只有在下午 1 點到 3 點公公午睡時間去工廠做工。她趕到工廠，蹲在地上以最快的速度做她的工作。整段時間她都一語不發，只有在離開時說聲“再見”。

女性家庭外之有酬勞動常需牽就自家營業的無酬勞動。當一位男士考慮結婚時，他估算的不僅是自己要花多少錢在訂婚喜宴、聘金、和婚禮上，而且包括可從太太的勞動中收回的成本。

當我恭喜林姓工廠老闆文定之喜時，他談到他的未婚妻：

1. 以下所引個人訪問資料，除有其它附註者外，均來自熊乘純提供之田野調查訪問報告。

“我並不是要找一個花瓶，我也不是爲了‘性’，如果我真要‘性’，街上便宜的到處都是。我聽說她很會計帳，而且又很儉省、勤快。前幾天，我在菜市場遇到她，她騎著一輛125cc的機車。她是那種身體很壯的女人。”我問他結婚總共要花多少錢，他告訴我大約四十萬元。“其實蠻值得的，別人都說（這筆交易）很上算。”林先生說。

根據以上這個例子，我們不難理解爲什麼很多女性婚後辭去她們的工廠工作。她們的夫家需要的，不僅是她們有酬的勞動力，而且包括她們無酬的生育和家屬勞動力。

魯姐只唸完小學，她沒上中學，因爲她覺得自己不是唸書的料。她在潭子加工出口區的成衣工廠做了十多年的工，幾年前在父母安排下結婚。婚後她辭掉了原來的工，因爲她必須在夫家開的工廠工作。她在自家開的工廠裡沒有薪水可領。直到去年因爲工廠生意清淡，魯姐才開始到外面找工作。即便她在鄰近地區找到工作後，她仍需要挪出時間來做自家工廠裡的無酬工作：

魯姐早上7點左右開始一天的工作。她得先在自家工廠裡工作半小時，然後才去上班。她和她的兩位小姑每週輪流替工廠員工煮飯。在不負責工廠伙食的日子，她在興良五金行工作，從早上8點到12點，下午1點再繼續。輪她煮飯的日子，她11點離開興良，12點半回來，不像其他同事1點吃完飯才回來。每天下午魯姐從五金行放工後，還得在家裡的工廠從4點半做到5點半。因爲她一星期在興良做不到40小時的工，所以興良以鐘點計算她的薪資。

對女性而言，這樣複雜又重疊的工作作息表反映出，她們的生產勞動與再生產 (productive & reproductive labor)，有酬與無酬勞力 (waged & unwaged labor) 是合而爲一的。

這樣複雜的女性勞動力如何繼續被剝削，以及男女不平等如何歷久不衰呢？政府在其中又扮演什麼角色？

7. 父權體制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台灣政府

許多學者指出，國民黨政府一直是個父權統治體系下的政府 (patriarchal state) (Diamond, 1975; Gallin, 1984 a, b)。這可以它的婦工會及半官方的中國婦聯總會種種活動中明顯看出。兩個組織不僅鼓吹傳統男性的價值觀，它們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均只是婦女家庭角色之延伸；例如，為軍眷子女及戰眷遺孤建立學校育幼院、為軍人縫製軍衣，舉辦勞軍及雙十節慶祝活動，協助安置來台大陸難民，並設立多種訓練課程與講座，教導婦女縫紉、插花、手工藝家事管理、烹飪等技藝 (Republic of China, 1983: 285, 287)。

在台灣，女性的從屬地位其實並不只是傳統價值與文化的延續。它是父權體制資本主義的產物。經由此體系，資本家、台灣政府以及國際市場都從中牟利 (Gallin, 1984b; Gates, 1979)。Gates (1979) 指出“國民黨政權其實不只是保守，它不僅保留復興傳統的舊文化，而且藉著政治手段和經濟變遷，國民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保守境界。”

在國民黨政府積極的鼓吹下，大眾媒體及教育制度“創造了一個社會意識環境，其中，婦女只能從事卑微勞動與家務勞動。”造就了一個父權體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此制度裡，女性的無酬家務勞動及不支薪的公共勞動能順利的被壓榨，“無須改變男女角色之文化定義，或是轉變男性在家庭中權利及地位的結構。” (Gallin, 1984 a: 398) 一份研究台灣中、小學教科書的報告指出，台灣的中、小學教科書裡，科學家、政治領袖、及專家學者幾乎全是男性；而處理家務的則全是女性。此外，男性的形象大多是具野心、勇敢、堅忍、冒險、有智慧等；而女性的形象則是孝順、謙恭、熱忱等 (婦女新知, 1988)。

8. 女性雙重擔的助長：社區發展計劃

如先前所述，以外銷為主的經濟發展策略，需要有廉價而且招募解僱自如的勞力。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婦女勞動力正扮演著這個角色。

但是不可否認的，女性的就業對男性地位及家庭穩定性具有潛在的威脅力。爲了防範於未然，國民黨政府於1968年提出一連串的社區發展計劃，其重點即在強調婦女出外就業與操持家務的雙重義務。這計劃的目標，“不但要解決民眾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上各方面的問題，而且還要使固有的倫理道德、生活規範等等，都能表現於社區民眾日常生活行爲之中。”（台灣省政府社會處，頁19，年代不詳）在整個社區發展計劃中，女性不僅是政府特別訓練的對象，而且也是計劃的積極實踐者。她們的參與，爲社區發展計劃成功的關鍵。

9. 組織結構

在各縣市、社區、村里都設有社區發展委員會。而省主席、縣市長、機關首長及其他政府官員，則是各不同階層委員會會長，負責監督及考核社區發展計劃。此外，每個社區都設有社區理事會，理事會有理事9到17名，由這些理事中選出一名理事長。理事會的理事，理論上應該是由居住於該社區的各戶戶長選出，而社區理事長則或由理事票選，或者由上級鄉鎮公所“指派當選”。然而，實際上在1983年以前，約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理事（26%）及四分之一左右的理事長（24.4%）是由政府指派的（台灣省政府研究考核委員會，1983：67-8）。

這種將新成立的社區發展計劃納入原先就存在的官僚制度內，使女性被摒除於整個政府的決策過程之外。此外，由於理事會理事是由各戶戶長而不是社區居民選出，女性幾乎沒有機會成爲她們社區理事會的理事。整體看來，社區發展計劃意味著國民黨政府勢力向基層社區的滲透。在這個過程中，婦女竟然被摒棄於最基層的決策參與，國民黨政府對婦女政治參與的態度可見一般。

這種由組織結構上限制婦女參與政治的結果，可以由1983年社區發展成就評鑑的調查報告中顯示出來。在來自127個社區的1,810位理事中，女性只佔不到百分之七（6.7%）（台灣省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1983：54)。對於“社區理事長應由誰來擔任較佳？”的問題，只有不到百分之一（0.9%）的人提到社區婦女（台灣研考會1983：131）。

10. 計劃內容

社區發展計劃選定三個建設目標：完成基礎工程建設、實施生產福利建設、加強精神倫理建設。根據這三大目標，國民黨政府擬訂了詳細的工作綱領，在縣、市、地方社區推展執行。“客廳即工廠”及“媽媽教室”是直接和婦女有關的項目。這兩個方案充分顯示，雖然因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需要，國民黨政府所強調的婦女角色有些轉變，但其父權社會理念的本質則始終如一。

11. 客廳即工廠

“客廳即工廠”方案是國民黨政府推展家庭副業的計劃之一。其目的，在於動員社區及家庭的剩餘勞動力，加入生產就業行列以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政府官員表示以社區發展方式推行家庭副業，以增加國民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使得“社區發展與經濟發展更能相互配合平衡發展。”（經建會，1978：1）

自政府所贊助的調查完成後，發現在社區裡有很多“空閒的女性”，於是就產生了“客廳即工廠”的方案（經建會，1978：2）。政府提供特殊的貸款，幫助有興趣購置機器、投資於家庭工作的家庭。甚至設立了工作室，以便婦女學習生產性的工作。許多“客廳”都變成“工廠”，家庭主婦成了女工，而工作也就“家庭主婦化”（housewifized）。

毫無疑問的，“客廳即工廠”推展的結果之一，就是那些有家庭主婦在客廳做工的家庭，生活水準得以提昇。然而，社會的其他份子由此計劃獲利更多。資本案因家庭主婦加入生產行列，不僅解決了勞工短缺的問題，而且也減輕了潛在的加薪壓力。此外，因為許多客廳變

成工廠，工人在家裡做工，資本家因此節省了工廠設備，能源，宿舍，及管理等項目的開銷。以及“客廳即工廠”策略把家庭主婦納入生產行列，意味著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結合，因為在資本家的眼裡，代工者 (homeworkers) 是一群願意在家裡代工的 householders，而不是一群在家裡工作的工人。他們沒有健康保險，也不受基本工資法的保障，因為他們的工資是按件計酬的。而整個社會也因為生產力提高、物價穩定、以及經濟成長而得惠。國民黨政府甚至自誇，這種以家庭副業方式來招募勞工的策略，無形中減輕了資本家與勞工間衝突的可能性 (經建會，1978：3)。

在以工業以主的歐、美各國，家庭工作的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 (Daniels, 1989)。在台灣實例中，與眾不同的是政府極力推展家庭工作，以全國性的計劃方案，例如“媽媽教室”，來確保婦女在工作的同時，也不忘她們做“賢妻良母”的責任。

12. 媽媽教室

跟“客廳即工廠”搭配的“媽媽教室”，是加強精神倫理建設的方案之一。許多政府官員不僅強調“媽媽教室”的重要性，而且深深了解它與社區發展計劃成功的關連性。1984年社會處處長趙守博指出：“媽媽教室是一個法良意美的構想和制度。教好一個媽媽，可以說等於教好一個家庭，每個家庭都能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這個社會必然能安和樂利，團結和諧，國家必然富強康樂，所以社區媽媽教室負有相當重大的任務。” (趙守博，1984：27)

1984年官方出版“社區發展”季刊的社論指出，“社區美化、髒亂清理、安全講習、技藝傳授、衛生教育、營養改善、文康活動、室內佈置、敦老睦鄰、成人補習、公益服務等。至少有三十九項，屬於媽媽教室活動範圍，除非婦女們在媽媽教室中學習、討論、充分吸收，否則這些永遠祇是口號，不能見諸實行。” (社區發展28期，1987：4)。

根據媽媽教室的創始者謝東閔指出，該計劃是為要“減輕由經濟

發展造成的社會緊張及混亂……例如離婚及青少年犯罪率的提高，對老年人的忽視，及奢靡、浮華、浪費。”

一份政府文件中敘述：

“我國社會以家庭為基礎，而以倫理為其構成要素，家庭又以母親為重心，有良好的母親才能有良好家庭，倫理始得維繫，社會才能繁榮進步，國家民族才能富強康樂。故推廣母德、母教，為當前重要之課題。”（台灣省政府62年3月1日，府社三字第八〇二七號令）

國民黨政府聲稱，“媽媽教室主要活動教材之選擇，以配合政府政令宣導社區中的工作、國家慶典、民俗節日、季節及文教活動，次要活動以整合媽媽們之興趣與需要。”（趙守博，1984：24）換句話說，在地方社區以媽媽教室為名開辦的課程，其主要意圖只是為達成政府設定的目標。

無數的媽媽教室在各地社區開辦。從1977年起，政府進一步舉辦媽媽教室輔導人員研習會，儲訓地方幹部。省政府更出版了十冊一套的“媽媽讀本”作為輔導人員的研習教材。每本大約三十頁左右，文字敘述都簡單易懂，並附有豐富的插圖。其主題包括有家庭計劃、兒童教育、產前保健、嬰兒保健、食品營養、房屋清理、家庭財務管理、家庭生活管理、服飾搭配、及居住環境衛生等（台灣省政府，1977）。另外政府還定期出版補充教材，如“媽媽教室補充教材”。（實踐家專，1985）截至1985年止，政府總共訓練了8,130位輔導人員，出版了16萬本以上的讀本。

媽媽教室的影響，可以從各社區開辦媽媽教室的情形看出，到1984年為止，全省總共有4,063個社區執行社區發展計劃。其中90%的社區在1984年開辦了媽媽教室。全省的21個縣市裡，有三分之一的縣市，其地方社區對媽媽教室的贊助率達到90%。其中，有三個縣市的媽媽教室遍及每個社區（趙守博，1984：26）。

1987年以來，省社會處舉辦媽媽教室輔導人員座談會，來自21個

縣市負責媽媽教室的地方工作人員及代表，在會中提出辦理媽媽教室的簡報。其中有10個縣市提及地方社區一年來開辦媽媽教室的次數，表12-1顯示每個社區開辦媽媽教室的頻率不一，有的一年舉辦一次，有的每個月舉辦兩次。

在都市地區，參與者大多是中產階級的家庭主婦(趙守博,1986)。一般說來，參加媽媽教室的婦女來自社會各階層(台灣省74-75, 1987)。特別是在鄉村地區，媽媽教室扮演了在傳播家庭計劃、嬰兒保健及營養的資料等方面重要的教育性功能。

媽媽教室大多於週末在社區活動中心舉辦，其主題包括：倫理教育、家政指導、衛生保健、生產技藝、休閒育樂、社會服務及家庭法律常識。倫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輔導社區婦女實踐國民禮儀範例及生活須知，激勵崇尚婦德，加強親職教育，促進家庭良好人際關係。”(趙守博,1984:25) 媽媽教室教導婦女如何為家人準備營養豐富的食物，與丈夫參加社交活動時如何粧扮得體，以及如何照料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生產性技藝訓練，則與“客廳即工廠”計劃相互呼應。休閒育樂與社會服務的課程則鼓勵婦女“利用餘暇組成服務隊，訪問社區內老人、兒童、殘障者、精神病患、貧寒家庭。”(趙守博, 1984:26) 實踐家專校長謝孟雄在省社處與實踐家專合辦的“媽媽教室學習研討會”上表示，今天的女性要同時扮演漂亮的女子、可愛的妻子、盡職的母親、及成功的職業婦女等四種不同的角色。”(謝,1985) 表12-2則是1985年至1986年台南縣媽媽教室的課程及婦女參與率。

如表12-2顯示在1985和86年間，台南縣舉辦了一千班以上的媽媽教室課程，總共有一萬多人次參加，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在一萬多人次當中，有多少人只參加過一次，有多少人參加過許多次，但由其活動項目我們可看出最常舉辦的是休閒娛樂方面的課程。而且婦女們非常擁躍的參加化粧技巧、家庭(婆媳)關係、及公共保健等課程。

多位政府官員對某些社區的媽媽教室過份注重在休閒娛樂活動，

表12-1 縣市政府開辦贊助媽媽教室之次數，1987年。

每年每社區教室	縣市
1+	1
3	1
6	4
8	1
12+	2
24	1
未答	11
社區總數	21

資料來源：台灣省，1987，頁20—40。

表12-2 台南縣媽媽教室活動和參與之情形，1985-1986

課程及活動	班 數		參與人次		每班平均參與人次	
	1985	1986	1985	1986	1985	1986
家庭關係 (母子、 夫妻、婆媳)	100	35	1,342	976	13.4	27.6
公共保健 (衛生、 家庭計畫、急救)	90	57	1,402	1,004	15.6	17.6
家事處理 (烹飪、 插花、室內設計)	308	170	2,735	1,725	8.9	10.1
新知學習 (防患犯 罪、化粧、社會 技能)	84	79	1,628	1,234	19.4	15.6
生產技術 (手工藝、 刺繡、編織、玩具 製造...)	66	61	851	612	12.9	10.0
休閒活動 (露營、 烤肉、土風舞)	707	659	3,522	4,126	5.0	6.3
社會服務 (拜訪 老人、貧孤、 社區服務)	68	79	536	350	7.9	4.4
總 計	1,423	1,150	12,016	10,018		

資料來源：台灣省，1987，頁32—3。

表示遺憾。謝副總統指出“有少數辦理‘媽媽教室’活動偏重於土風舞的學習，致有些媽媽為跳土風舞不顧丈夫和孩子，而造成家庭問題。”

（謝東閔，1986）社會處處長趙守博則指出，“社區媽媽教室推行，旨在以‘親職教育’為手段，來建立幸福的家庭，進而增進社會之安定與和諧。‘媽媽教室’並非只限於單純技藝訓練或研習烹飪、插花、或跳土風舞。唯少部分鄉鎮市區社區媽媽教室舉辦的活動，偏於副活動之學習，而忽略了主活動之實施，致予人有本末倒置之感”。（趙，1984：26）

根據“客廳即工廠”及“媽媽教室”所揭示的目標、實施重點、及相關課題，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第一，國民黨政府把婦女納入其社區發展計劃的方式，無非強化了她們傳統在家庭及社會所扮演的從屬角色和不獨立的地位。家庭主婦代工的收入，雖然對改善家庭生活水準極有貢獻，但是她們的工作却被視為“副業”，這些勞動婦女被視為需要賺點零用錢的家庭主婦，而不是販賣勞力的工人，當作者之一訪問中部某社區時，社區幹事及里長私下指示一群從事“家庭副業”的家庭主婦，謊報她們的薪資以掩飾她們待遇低於政府規定最低工資的事實。從事“家庭副業”的家庭主婦，同時要面臨化學污染、收入不穩定、以及其他在非正式經濟制度（informal economy）下勞工面對之問題。第二，國民黨政府一再宣揚婦女對家庭及其他社會份子的“道德責任”，強化了婦女傳統“母親”及“呵護者”的角色。“客廳即工廠”和“媽媽教室”要求婦女擔當起促進台灣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多重擔子，第三，整體說來，社區發展計劃是一個由上而下的計劃。它是以父權體系的官僚結構為本，而完全忽略了原本就存在、以女性為中心之地方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地方婦女因而被排除於決策過程之外，這無形中增加了政府推展社區發展計劃不必要的阻力。

13. 結論

由於當前世界經濟體系，對彈性勞動力特別需要，婦女勞工因而倍受重視，婦女勞工之所以向來被認定為從事彈性勞動的最佳人選，是因為一般相信婦女本身視相夫教子、操作家務為其天職。根據此一邏輯，家庭的安定、鄰里的和睦、以及社會的有條不紊，都可經由母性光輝的發揚而實現，政府鼓勵婦女從事有酬勞動的先決條件是，婦女的就業不與她們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媳的角色職責衝突，而彈性勞動的生產就業方式恰巧符合這個條件。本文之宗旨，不在於反對彈性勞動，我們所反對的是彈性勞動所代表的價值觀及其廉價、不安全、沒有保障的工作條件。概括說來，彈性勞動是一個特殊政經條件下的社會產物，政府政策、社會體系、家庭結構皆再再強化保證它的存在與延續。換言之，台灣出口貿易為主的經濟成長策略，是建立在父權體系的社會基礎上，在此體系裡，外貿企業與父權家庭掛勾，連合剝削婦女勞動者，國民黨政府經由教育機構和社區發展計劃控制並教化婦女，使她們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擔負起就業、齊家、報國的責任。

辭典

- 父權體制 patriarchy
資本主義 capitalism
國際勞動分工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廉價勞工 cheap wage workers
家屬工作者 family workers
家事工作者 domestic workers

參考書目

- 人口研究中心 (1985),《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 台灣省政府 (1973),公告第 8027 號,台中。
-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65),《台灣光復二十年》,台北。
- (1977),《媽媽讀本》,十冊,台中。
- (1987),《台灣省社區發展後續第二期五年計畫工作手冊》,台北。
- 台灣省政府研究考核委員會 (1983),《台灣省三十年來社區發展建設之評鑑與未來發展之研究》,台北:台灣省政府研究考核委員會。
- 台灣省 74—75 年度社區媽媽教室輔導人員座談會綜合紀事 (1987),台北。
- 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年鑑》,台北。
- (1974),《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台北。
- 行政院主計處、經濟計畫委員會 (1988),《台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報告》,台北。

- 李元貞 (1987)，〈雛妓問題，步步艱難〉，《婦女新知》，57 期，頁 1。
- 李建興 (1985) 〈社區媽媽教室與社區教育〉，《社區發展季刊》，29 期。
- 呂秀蓮 (1986)，《情》，台北：敦理出版社。
- 私立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 (1985)，《媽媽教室補充教材》，台中：台灣省政府。
- 于宗先 (1981)，〈對外貿易〉，成嘉玲編，《我國經濟的發展》，台北：世界書局，頁 301—84。
- 周揮彥 (1966)，《觀光事業論集》，第一冊，台北：台北中國文化學院。社區發展季刊，台北：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 婦女新知 (1982—1989)，台北。
- (1988)，《兩性平等教育手冊》，台北。
- 黃春明 (1981)，《莎啞啦哪、再見》，台北：遠景。
- 經濟建設委員會 (1978)，《如何以社區發展方式推行家庭副業之研究》，台北。
- 詹純鑑 (1966)，〈當前發展觀光事業的途徑〉，周揮彥編，《觀光事業論集》，第一冊，台北：台北中國文化學院，頁 4—16。
- 趙守博 (1984) 〈台灣省推行社區媽媽教室之現況及未來展望〉，《社區發展季刊》，28 期，頁 24—7。
- (1986)，〈強化媽媽的功能〉，《台灣省媽媽教室輔導人員研習會手冊》，台北，頁 1—2。
- 鄧文儀 (1975)，〈三十年來的台灣觀光旅遊事業〉，《台灣光復三十年》，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台中，頁 337—409。
- 劉玉蘭 (1985)，《台灣地區婦女人力運用——回顧與展望》，台北：梅枝圖書印刷文具有限公司出版部。
- 劉克智、黃國樞 (1987) 《台灣人口及經濟結構演變與就業關係之研究》南港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 錢 (1990) 5 期，台北，頁 156—86。
- 蔡青龍 (1985)，〈性別差異〉，《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

- 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頁 277—308。
- 鄭至慧、薄慶容 (1987)，〈正視職業婦女所受的就業歧視〉，《婦女新知》，58 期，頁 1—9。
- 謝孟雄 (1985)，〈社區媽媽教室與家事教育〉，《社區發展季刊》，29 期，60—61 頁。
- 謝東閔 (1986)，〈爲什麼要創辦媽媽教室〉，《75 年度台灣省媽媽教室輔導人員研習會手冊》，台北，頁 6。
- 瞿海源 (1984)，〈性與雛妓問題〉，楊國樞、葉啓政編，《台灣社會問題》，台北：巨流出版社，543—71 頁。
- 邊裕淵 (1985)，〈婦女勞動對經濟發展之貢獻——台灣之實證分析〉，《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台北：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頁 259—76。
- Beneria, Lourdes (ed.) (1985) *Women and Development: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Rural Societies*, Westport, CT: Praeger.
- Charlton, Sue Ellen, Everett, Jana, & Staudt, Kathleen (1989) *Women, the State and Development*, Albany: SUNY.
- Chiang, Lan-hung Nora & Ku, Yenlin (1985) *Past and Current Status of Women in Taiw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 Chou, Bi-ar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in Women's Status: A Reevaluation of Some Data from Taiwan", 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Wei-yuan Cheng, & Hou-sheng Chan eds,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p.423-61.
- Crane, George T. (1982) "The Taiwanese Ascent: System, State and Movement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Edward Fried-

- man ed., *Ascent and Decline in the World-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pp.93-113.
- Cumings, Bruce (1987)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Frederi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43-83.
- Daniels, Cynthia R. (1989) "Between Home and Factory: Home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Eileen Boris & Cynthia R. Daniels eds., *Homework*,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Deyo, Frederic C. (ed.)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amond, Norma (1973) "The middle class family model in Taiwan: Woman's place is in the home", *Asian Survey*, No. 13, pp. 853-972.
- (1975) "Women under Kuomintang Rule: Variations of the Feminist Mystique", *Modern China*, Vol.1, NO.1, pp. 3-45.
- (1979), "Women and Industry in Taiwan", *Modern China*, Vol.5, NO.3, pp. 317-40.
- Directory of Taiwan* (1963) Taipei: The China News.
- Evans, Peter & Pang, Chien-kuo (1989) "State Structure and Stat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Taiwanese Case for

-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Hsin-hung Michael Hsiao, Wei-yuan, Cheng & Hou-sheng, Chan eds.,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p.3-30.
- Gallin, Rita S. (1984a) “The Entry of Chinese Women into the Rural Labor Force: A Case Study From Taiwan”, *Signs*, Vol.9, NO.3, pp. 383-98.
- (1984b) “Women, Famil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12, NO.1, pp. 76-92.
- (1990) “Women and the Export Industry in Taiwan: The Muting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Kathryn Ward ed., *Women Worker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79-92.
- Gates, Hill (1979) “Dependency and the Part-time Proletariat in Taiwan”, *Modern China*, Vol.5, No.3, pp. 381-407.
- Greenhalgh, Susan (1985) “Sexual Stratification: The other Side of ‘Growth with Equity’ in East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NO.11, pp. 265-314.
- Hsiao, Hsin-hung Michael Hsiao, Cheng, Wei-yuan, & Chan, Hou-sheng (eds.) (1989)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Jones, Gavin (ed.) (1984) *Women in the Urban and Industrial Workforce,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Kaluzynska, Eva (1980) “Wiping the Floor with Theory: A Survey of Writings on Housework”, *Feminist Review*, No.6, pp. 27-54.

- Kim, Elaine (1987) "Sex Tourism in Asia: A Reflec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Eui-young Yu & Earl H. Phillips eds., *Korean Women in Transitio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enter for Korean-American and Korean Studies pp.127-44.
- Koo, Hagen (1987) "The Interplay of State, Social Class, and World System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The Cases of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Frederi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65-81.
- Kung, Lydia (1983) *Factory women in Taiw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iu, Paul K. C. (1984) "Trends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The Transition toward Higher Technology Activities". in Gavin Jones ed., *Women in the Urban and industrial Workforce,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75-99.
- Lu, Yu-hsia (1984)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Taiwan", in Gavin Jones ed., *Women in the Urban and Industrial Workforce,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339-67.
- Mies, Maria (1986) *Patriarchy,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Zed Books.
- Miller, Joanne, & Garrison, Harword H. (1982) "Sex rol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and in the Workpla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8, pp. 237-62.
- Republic of China: A Reference Book* (1983) Taipei: United Pacific International, Inc.

- Truong, Thanh-Dam (1990) *Sex, Money and Morality: Prostitution and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Zed Books.
- Waring, Marilyn (1988)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 Winckler, Edwin A., & Greenhalgh, Susan. (eds.) (1988)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Armonk, N.Y.: M.E. Sharpe.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四期 1993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4, March, 1993.

台灣色情海報的解讀分析

游美惠

The Analysis of Poster Ads for Erotic Floor
Shows in Taiwan

by
Mei-hui You

關鍵詞：文本分析、色情圖文、再現

Keywords: textual analysis, pornography, representation

收稿日期：1992年4月8日；通過日期：1992年9月16日
Received: April 8, 1992; in revised form: September 16, 1992

摘 要

台灣牛肉場色情海報所呈現出來的樣貌與其他的色情產業相當不同，它公開展示於各公共場所（如大馬路邊、巷子口和麵攤小吃店中等）毫不遮掩，為何色情海報可以如此無孔不入地張貼於各處，其中是否蘊藏著一些不為人所明察的癥結，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所以筆者嘗試對牛肉場（色情）海報作文本分析，自其中粹取一些資料與訊息，探索色情海報的對話對象，並運用弗洛伊德（Freud）的心理分析取向，將色情再現與男性雄風的心理叢結扣連分析，揭露其中建構展佈的政治技術，揭示此再現作為（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的意義建構過程與背後型塑的力量，以便破解種種相關於色情與性的社會神話。

一般人（包括牛肉場經營者、色情海報製造者、路上行人等潛在買受者等）都會將色情海報視為給定之物，對滿街遍見的牛肉場色情海報，不以為疑地認為它只是為吸引人去觀看“有肉”表演的宣傳海報罷了，或指稱它為淫穢不德道的；但這些看法均不足以幫助我們對色情海報的意涵有更深刻的了解。而女性主義者對色情品的批判則視其為父權體制壓迫女性的表徵之一。就讀者的性質來區分：“一般人”的讀法是被海報與製作者圈套住式地全盤接收，而女性主義者與筆者則嘗試在平常的圖文層面中，另外挖掘意涵予以詮釋批判，顛覆既有的閱讀方式。女性主義者既已提供出在色情圖文中女性是被宰制的說法，本文則嘗試提出另一種觀點：揭示色情海報的訴求主體並探討如此的呈現樣態與性文化建構有何內在關聯。相信如此的研究取向，可以補充並幫助我們對色情產業有進一步的瞭解。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poster ads for erotic floor shows in Taiwan. I try to expound the internal meanings of "pornographic poster ads", to explicate their implici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purpose is to deduce the macho complex of "pornographic poster ads" and provide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While watching the pornographic poster ads for erotic floor shows, the majority think that they are obscene and immoral. But some regard them as attractive and interesting. All these opinions are of no use for us to interpret the pornographic poster ads. I try to deconstruct the "common sense" view (another ideology) toward pornographic poster ads. I want to deduce a historical,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connect it with psycho-analytic factors.

My thesis is that the pornographic poster ads reveal male internal anxieties: that men are afraid of facing the sexual complex deep in their mind. Men construct all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ies to release the fear in order to express their sexual domination. It is by means of those devices that men maintain the internal cohesion of a "Patriarchal Culture".

1. 引言

台灣的牛肉場色情海報在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早已蔚成一片特殊的景觀，它們“公開展示，無所不在”，和媒體（不論是電視影像或報章雜誌）中的腎虧、壯陽藥物廣告相互輝映，侵入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而新興的理容院、指油壓、色情賓館、成人出版品等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市井街頭露臉，這些不勝枚舉的台灣“性”現象，反映出的已經不是“西風東漸，人心不古”等道德判斷字眼所能涵蓋的，而傳統倫理思想中的“不可說”的性態度相映於今天的景況，似乎是悖離千里，讓人百思莫解。面對著如此繁榮興盛的“性景觀”，如何“談色論性”應該是值得我們正視的一項議題，而不能僅僅將之視為是茶餘飯後的閒談笑料而已。而在這種種的“性景觀”中，牛肉場色情海報所呈現出來的樣貌更不容忽視，它與其他色情行業的運作邏輯或許相似，例如同是以展現、販賣女體為手段，也均是將女性的性格、形象作兩極化的刻板呈現；但是黃色書刊、A片錄影帶或其他的情場所均或多或少有些隱密神祕化的特質，等待“有心人士”去“消費”、“翻閱”；但牛肉場色情海報則公開展示於各公共場所（如大馬路邊、巷子口和麵攤小吃店中等）毫不遮掩，和一般書本式的刊登法相當不同，使人不得不“強迫中獎”地看見。而且為何色情海報可以如此無孔不入地張貼於各處，其中是否蘊藏著一些不為人所明察的癥結，也是值得再深入探討的問題，所以筆者嘗試解讀色情海報的內在涵義，揭示此再現作為（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的意義建構過程與背後型塑的力量，以便破解種種相關色情與性的社會神話。

我們可以說，“色情圖文”（pornography）是同時壓縮了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歷史沉澱在其中的再現產物，任何單一的理論觀點均不足以涵蓋而對其有完滿的解釋。女性主義者一向對色情再現中的男／女性別權力關係相當關切：愛琳·戴門（Irene Diamond）（1980）針對女性主義的色情分析曾有如此的說法：“…在許多觀點

與傳統的詮釋方式相當不同，對女性主義者來說，色情的內容 (the “what” of pornography) 不是性，而是權力與暴力；關心的對象 (the “who” of concern) 不再是男性消費者或藝術家，而是女人；在傳統的分析模式中是看不見女人的” (Diamond, 1980: 132) 而艾倫·索伯 (Alan Soble) (1986) 曾大約總括女性主義者對色情的批評為以下四項議題：(1)色情品的某些內容是性別歧視 (sexist) 的，它刻畫出一種婦女受虐、受辱的性行為景象。(2)色情不僅支撐了性別歧視論 (sexism)，且會產生一些其他可批駁的效應，例如它造成了一種關於性的刻板印象 (sexual stereotypes)，致逐漸損毀了性關係的品質，並且就如同蘇珊·布朗米勒 (Susan Brownmiller) (1975) 所說的：它塑造一種“攻擊是可容忍”的社會氛圍。(3)色情的生產與消費內含了對女性的剝削。(4)此種推動剝削的色情消費，也是對其他男性操弄的一種表現，色情的生產製造者因而從中獲利。畢竟色情的相關爭辯與討論，牽扯的因素多且繁雜，以上索伯所提出的四點大抵僅觸及了“色情內容”、“色情與性”、“色情的生產與消費”這三項議題。另外，女性主義者也分別關懷到“色情與檢禁”、“色情與情色 (pornography & erotic) 的區分”、“色情與性暴力”等相關的問題，在此則不一一陳述。

本文的分析方向，是想立基於過往這些討論，以解讀台灣牛肉場 (色情) 海報的內在意涵為主要的分析焦點，自其中粹取一些資料與訊息，探索色情海報的對話對象，並運用佛洛伊德 (Freud) 的心理分析取向，將色情再現與男性雄風的心理叢結扣連分析，揭露其中建構展佈的政治技術，並推而廣之，藉由色情海報來省思傳統社會文化如何在制約塑模人們的性 (sexuality)、女性和身體的各種呈現。在本文中，筆者不打算對色情海報作政治經濟學式的分析，所以並未剖析台灣本土歷史發展過程中，國家政策、帝國主義的侵入、經濟發展與國際分工等因素對色情產業 (文化) 所造成的影響，在分析層次上本文與這些類型的研究是有明顯的差異。筆者認為對色情的研究其實是可

以開拓出相當廣闊的詮釋空間，只是目前台灣相對於色情的研究有其體質不健全之處，不僅累積的具體研究成果寥寥可數¹，且常將“父權體制”（意識型態）、“物化”、“商品化”等視為不言自明的概念，反覆運用，致使對色情的探討落入既有的解釋窠臼。而對滿街遍見的牛肉場色情海報，一般人不以為疑地認為它只是為吸引人去觀看“有肉”表演的宣傳海報罷了，或指稱其為淫穢不道德的，或說它是好看可吸引人的；但這些看法均不足以幫助我們對色情海報的意涵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筆者擬採用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的方法對色情海報進行解讀，希望能解構一般常識性的看法（common sense，據具

1. 目前可見有關色情的資料，以報導性文字居多；頂多也只是一些運用了部分理論觀點的文章，非常欠缺具體實質研究的成果。以下即是國內有關色情的文獻資料：
- (1) 李美枝(1986)，〈剖析“色情”本質與現象〉，《中國論壇》，第22卷第8期，頁46-8；符芝瑛(1986)，〈無所逃於色情污染〉，《中國論壇》，第22卷第8期，頁49-51。
- (2) 何善華(1987)整理，〈正視廣告中不當的女性形象：“現代女性喜歡的廣告”座談記錄〉，《婦女新知》，第59期。
- (3) 蔡源煌(1989)，〈牛肉場的記號分析〉，《解嚴前後的人文觀察》，頁271-4。
- (4) 江迅(1987)，〈父權宰制下的人肉市場：台灣色情產業的政治經濟分析〉，《南方雜誌》，第4期；于理(1987)，〈被踐踏的“第二性”——色情商品之省思〉，《南方雜誌》，第4期。
- (5) 〈推動社會進步須要更多的熱情〉，《婦女新知》，第78期。
- (6) 陳月霞(1989)，〈我正在做色情海報——台灣色情文化報告書〉，《自立早報》，8月22日。
- (7) 何春莊(1989)，〈從個人聖戰到國家機器〉，《自立早報》，8月27日。
- (8) 黃淑玲(1990)，〈反色情？反檢禁？——女性主義者對色情媒體的爭辯〉，《婦女新知》第100期。
- (9) 宋美登(1989)，〈欲解還結：文學／情色／色情〉，《新文化》，第7期；李元貞、杜文靖、楊憲宏(1989)，〈販賣色情有助媒體佔銷〉，《新文化》，第7期。
- (10) 李金梅(1989)，〈印刷女體辯——大學女生看性雜誌〉，《新文化》，第8期；〈大學女性看性雜誌〉，《新女聲》，第4、5期；〈性、神話、“女性”雜誌〉，《新女聲》，第4、5期。
- (11) 〈色情電影面面觀〉，《電影欣賞》，第41期。
- (12) 〈色情海報下的台灣〉，《中國論壇》，第352期，頁39。
- (13) 成令方(1990)，〈反色情，小心公權力的手〉，《中國時報》，12月3日。
- (14) 迷走(1990)，〈媒體的出神狀態〉，台北：唐山，頁13-9。
- (15) 卡維波、何春莊(1991)，〈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台北：方智。

爾塞〔Belsey〕(1980)的看法，這同時也是指一種意識型態)。行文的安排如下：

首節引言，指出色情海報在今日台灣社會“性景觀”中的特殊性，並說明本文的分析目的、方向與方法。

第二、三節進行色情海報的解析；解析的內容則以“對話對象的研究”與“男性雄風的心理叢結”為兩大主線。筆者想要指出色情海報的對話對象及其訴求策略，進而剖析色情品是男人內在需要女人但又畏懼女人的心理叢結糾纏後而產生的外在建構，所以雖然表面上我們在色情圖像中見到的是女性被屈辱、傷害或被切割擺佈的景象，事實上也可說那是男性另一層面的“弱勢”展現，以往相關的“男性勇猛，征服女人”、“女人干願也樂意為男人的性快感服務、甚或受之奴役”之色情神話，由此觀之，是相當站不住腳的。中國人的“腎虧症候群”可為此種性心理的另一佐證。

最後一章結語，從“色情海報、性建構與身體政治”的方向來延伸色情海報的解讀結果，啓發更進一步思考所有的身體政治權力宰制。

2. 色情海報的解析(1)——對話對象的探究

在這一節中，筆者將探究“一般”的觀(讀)者，如何成為色情海報的訴求主體。在色情海報的再現構圖中，“男性”成為設定好的觀看主體，在生產—製作—期待—觀看這個連串的過程中，一般的讀者與此設定好的觀看主體逐漸被引進牛肉色情海報的意識型態鎖鏈中，成為色情海報的對話對象及其不斷翻新花招的源泉與動力。所以實有必要探討其對話對象與相關的訴求策略。

色情海報中的影像與文字，為了達成其特定的目的，不論是其構圖組成、操弄編排手法或是其中的女性角色扮演(女體暴露功用)，與一般的廣告海報均有明顯的差異；它不是像一般商業廣告刻意安排人物的身份地位、活動、服裝等，塑造情境的氣氛，運用角色認同感情

投入的方式來感動人，而是欲直接刺激人們最原始的性慾需求與渴望²。即使是一些欲藉著“性促銷”策略（以女人胴體為裝飾品，性誘惑為餌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以促銷其產品）來運作的其他廣告，也會稍具變化地考量到訴求對象的地位、年齡層等差異，而運用一些美學手法營造氛圍，使人產生認同或其他感受，甚或進一步地探試個人的潛意識需求，使人產生白日夢似的幻想（dream-like fantasies），而達到其促銷的目的。但是，色情海報就不同了，它像部分的賣藥廣告一般，說服策略簡單，明白地呈現其商品效能，清楚地將廣告的用意與海報上的構圖連結：“我是要賣‘有肉’的女體展示歌舞秀（show），所以我就將主秀人物放在最顯眼的位置；我要賣給你的是女人胴體的觀賞娛興，所以我就將模特兒的身材、體態妝扮得挑逗性十足，吸引你來看”。分析牛肉場的色情海報可以看出它相當具有勾起（男）人們潛在性慾的意圖，只是它的技巧簡單，教人一目瞭然，訴求意圖也更直接。

首先就色情海報的版面編排來看，人物影像通常都佔有最大的篇幅，有時完全以主秀人物為主，不再加入其他配角；有時又會以數個女人的影像同時出現。而若是有其它的噱頭花招，當然也不忘在影像上特別凸顯出來。在文字方面，歌劇院的名稱、住址及電話，其字型大小、位置，大約都是固定不變的，而其他的宣傳文字則因主秀人物的名氣大小以及相關噱頭、活動不同而有差別，或是欲以主秀人物的名氣與“突破”為訴求重點，或是匿名，完全以怪招噱頭取勝，其中的“美女”到底是誰一點都不重要。揭穿色情海報的編排技倆，便可以發現它只是在廣告號召與表演噱頭上花招百出，其根本的運作方式則是相當的簡單而又僵硬，鮮少有創新之處。

至於色情海報的對話對象，我們則可由其呈現出來的內容為線索

2. 尤其是男人們的性慾需求與渴望；幾乎所有的色情海報，都是以女體來呈現其表演內容，訴求目標也是特定的（男性），而據筆者實際的初步田野觀察經驗，也發現牛肉場表演的觀眾以男性居多（年齡的分佈則較廣，由老至少均有）。

來加以探究。隨著色情海報所要彰顯的主題不同，可能是新潮大膽、香豔刺激、異國風情或是稚嫩幼齒、青春玉女等，其中人物的肢體語言表達或臉部表情、眼神、嘴唇等之型態會有很大的差別。例如有的海報會以“漂亮的身材不一定是大牌”來作訴求，於是模特兒的神情顯現出頗具挑釁的意味：對其他在牛肉場中表演的一些稍具知名度的影視明星挑戰，眉宇之間透露出來的訊息是她對自身“過人”身材的自傲，而搭配在其旁的女性，也都是被強調彰顯其胸部的豐滿巨大；由此來凸顯出此“秀”的特色，是爲了吸引人去看穿梆的好身材，而非去看明星。而若是欲以異國情調爲花招來招攬觀察，海報上便會呈現出一些外國女子，或是以文字來強調是某國的風味，說明是某國的紅星，其意圖顯而易見：變變花招，爲老顧客換換口味，同時也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觀眾。而由其中所使用的文字來看，也可得知海報與觀者在進行對話的蛛絲馬跡：例如“怪招連連，要您忘舒舒”、“你吃過真正的台灣土雞嗎？你吃過真正進口洋雞嗎？”（你——消費者，可以吃雞）；再加上其他利誘型的與競賽類的招攬怪招活動配合：如“百萬名車大摸彩”、“刮刮看百萬獎品大贈送”（爲你而準備的摸彩活動，看秀之外，還可得到獎品）與“飛彈木瓜比賽大對抗”等，（你是比賽的評審也是觀眾）；而也有（爲你）“重金禮聘”一些稍具知名度的明星“下海”表演的；由這些琳瑯滿目、變化多端的噓頭怪招，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是希望能吸引更多的觀眾去牛肉場消費之外，它的對話召喚對象其實是以老顧客爲主，而且這些常客老主顧是有其特定階級性的，這可由色情海報張貼地點的空間脈絡看出一些端倪。

色情海報爭取每一個露臉的機會，電影海報的公佈欄是其必然不會放過的張貼處所，由於色情海報的形式、規格與一般的電影海報大同小異，且同屬娛樂營利事業，（至於是否合法，對一般的觀者而言並不重要，也不會去在意），因此，他們並排張貼，並不突兀，也容易讓人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而且還可以一併達成許多效用，例如當人們想要消遣娛樂時，便可從一整排的海報看板中得到各式各樣的訊息，

各取所需（看電影或看牛肉場表演）；而想觀看色情海報者，在這五彩繽紛的海報看板前留連徘徊，也可較“光明正大”，不用擔心他人的眼光，而且能同時滿足窺視與自尊的感受。另外，建築工地的圍牆上，也常常可以見到一整排（已不是一張兩張地張貼）的色情海報肆意張貼，可能是緣於該牆面是“三不管地帶”，夾在公私領域之間曖昧不清（因為縣市府主管單位〔環保局〕並不積極取締，而私人方面，如工地主人或建築工人，也不會刻意去維護或排斥色情海報的張貼），所以才可能會有此種景觀出現。相類似的情況，也可以在顯眼的街頭巷口中見到，色情海報隨同那些徵職求才、房屋租售的廣告而求得一線生機。乍看之下，色情海報似乎是無所不在，它可以被張貼在廟口、自助餐店門口、檳榔攤邊及公車站牌、交通要道的路邊，其普及範圍與程度比一般的電影海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可以說這是著眼於商業利益的因素，為求廣為傳佈訊息以刺激消費之故。但是除了這一層廣為招徠的考量之外，色情海報所欲召喚的主體多少仍是有其社會階級特定性的：牛肉場表演的老主顧以中下層階級（如工人、榮民等）為主，而也偶有一些打游擊的“散客”夾雜其間，如大學生或部分中上階級者；而它的張貼地點（或被允許張貼的地點），也有生活空間階級區隔的現象：檳榔攤、自助餐店、麵攤之所以會有色情海報的蹤跡，乃是因為這些地方消費者的階級性比較可能會是牛肉場的潛在消費顧客。而在大百貨公司內、豪華餐廳（飯店）中與權要大官的聚會場所及必經要道，便如何也見不到牛肉場色情海報的蹤跡。所以，由這潛在欲召喚的主體性質看來，色情海報之階級位置是很明顯的了。

另外尚有一項更不能忽略的因素，那就是該主體是被鎖定性別的。墨爾維（Mulvey）曾在“窺視快感與敘事電影”（1975）一文中分析快感經驗，她指出：好萊塢的劇情電影採用了一套為男性的主體位置服務的敘述語言，將銀幕上的女性塑造成是一個供男性觀看的對象，且不僅為周遭的男性所窺視，也被電影的觀者所窺視，而鏡頭正是被男性（／主動）所掌握。男性不僅不會是一被凝視的性物（the

erotic object of the gaze), 反而是一較有力的理想自我 (ideal ego) (Mulvey, 1975: 16-7)。雖然墨爾維分析的對象主要是好萊塢的劇情電影, 但是其中的一些基本看法也可以運用來理解色情再現, 找出其中男性/主動、女性/被動的觀看模式。

就色情海報中的人體展示來看, 爲了謹守政府的法規尺度——“三點不露”, 所以在“欲露還遮”的過程中, 便花招百出: 或以雙手遮胸, 欲蓋彌彰, 或是僅掛一絲, 遮於胸前, 再不就是全裸拍照之後, 再以剪貼方式遮蓋, 而其他尚有以內衣、泳裝、皮草、低胸禮服、透明薄紗睡衣等方式來遮蓋乳房、下體等“重要部份”者, 如此一來, 正好來在法令與觀者的窺視快感夾縫中間求新求變; 遮蔽軀體的衣物, 反倒有激惹人們却一窺究竟好奇 (色) 心理的作用, 致使性對象更能以裸露身軀來吸引異性。就如同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1975) 所言:

“身體最性感的部份, 難道不是在衣服的張 (裂) 口處嗎? 在文本快感的範圍內之錯亂 (perversion), 沒有所謂的性感帶, 性愛是間歇性的, 如同心理分析所說的: 在兩件衣著的交接處, 在衣服的邊緣處 (如開領襯衫、手套及袖口), 肌膚的若隱若現, 便是一種誘惑, 或者更可以說是一種以不見爲見, 以隱藏爲顯現的演出 (the staging of an appearance-as-disappearance)” (頁 9-10)

色情海報製造者似乎深諳此道: 剝光後的女體不如若隱若現者俱挑逗性, 而爲了要若隱若現, 許多的花招與手法便相應而出地在其中施展: 例如會有海報中的女性刻意地揭開衣物的一角, 或是故作欲脫未竟之貌, 此外再加上臉部表情、身體表情的配合作勢, 不僅男性的性幻想於此得到滿足, 而且可以使其有主動控制權的感覺——衣物是待你 (男性、觀者) 去撕開的, 除了藉此滿足其主控欲望外, 欲脫未竟, 也可滿足主體的窺淫幻想, 這可視爲是爲觀看主體服務的證據之一。

色情海報中女模特兒的眼神與表情也能援以爲證: 或是睜開大

眼，看著鏡頭（攝影者或觀者）地使出邀請的眼光，或是眼睛不正視鏡頭，朝向遠方或凝神注視某物，表現出一種清純、無辜的形象。茱蒂斯·威廉森（Judith Williamson）（1978）在《解讀廣告》（*Decoding Advertisement*）時曾說：“在圖像中，男人是不存在却又無所不在的（the man in this picture is nowhere and everywhere），作為觀者，被海報上的女主角注視（looking at）著，很容易地便會將自己與那特定的物體（certain given objects）——（通常是異性的）——連結而有一種鏡像關係產生（1978：80—1）。許多的幻想與滿足在此觀看凝視的“眼神交流”過程中達成，拉岡（Lacan）（1977）曾經指出在每一個視覺上的察認中（visual recognition），潛意識和壓抑、欲望和缺乏，都是同時在對立辯證著，個人對異己者的欲望，透過窺淫與觀看，在被展示者的身上尋求肯定；

“眼睛不只是一知覺器官，它也是一獲取快感的感官，故有所謂的‘觀看與凝視的辯證’（Lacan, 1977：102）——“眼睛獲取象徵秩序，凝視則為尋求一種自戀式幻想的滿足，特別是對異己的欲望”（Wright, 1984：117）。

所以莫怪乎廣告中的模特兒眼神是可以讓我們據之以搜尋潛隱主體的重要線索。約翰·貝格（John Berger）（1972）也曾說過：“…所有的畫都存留著這個主體（某個女人）覺察到被某觀察者看的暗示。她並不如她所處地赤裸著。她之所以赤裸是因為有位觀賞者看她。”

（1972：43—4）而在色情海報中的影像呈現與文字描寫，也常可見將女性身體（某部份）塑造為是一種觀賞的景象或奇觀；例如類比女性的胸部為木瓜、桃子等可以食用的水果，或是描述其為“浪漫的傑作、爭奇鬥豔秀”，明顯意謂著女性的身體是可供（男）人享用與品評的。而由色情海報中的文字使用也同時可以見到其在召喚特定主體的跡象：“特別與君同樂、保證 SONG”、“噴火女郎紫羅蘭為您作最大膽的犧牲”和“為保護您的眼睛必請帶‘眼藥水’”等，語句中的您、君等字眼以及一些場面性、誘惑性的話語，都是在對觀者（主要是男性）

所說的，所以海報上雖然看不到，其主宰力量却是不可忽視的。

色情海報在為那沒有明示却又具有強大影響力的主體（男性或觀者或消費者等）服務。更深刻的說法，可以參考魯斯·依雷格瑞（Luce Irigaray）在《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1985）一書中所主張的看法：她認為女性進入了經濟受支配的領域之後，便會被認定為是被動的、一個供人冥想的漂亮物體，不僅是她的身體會被性欲化，同時也會要求她在供展示之外，也具有退縮保守與貞潔的特質，這種雙重意涵的活動，用意即是在刺激主體的趨力（the drives of the “subject”）（1985：26），所以物體（色情海報中的女體）的被展示與塑造，說穿了也就是為了要滿足主體；物的價格（price）及品評的標準是由主體依其需要或欲望來決定的，女性對男性而言是一種同時具有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性物（商）品（1985：31）。由古至今均是如此，只是色情海報的製作者更刻意運用此一“物化女性身體——主體化男性觀者”的現成關係罷了！

3. 色情海報的解析(2)——男性雄風的心理叢結

在這一節中，筆者將進一步對上一節中所提及的主體作深度解讀，此主讀不僅在表面上被引入“生產—製作—觀看—期待”的整套色情海報作為之中，他們的背後更有一些潛藏的心理癥結，可以進一步去挖掘，我把它解讀如下：

3.1 色情海報透露出的訊息

模特兒刻意裝出嬌憨、博人憐愛的表情，是色情海報常出現的一種類型，以一種不具任何威脅攻擊性的清純無辜表情出現，常被比照為流行歌壇中的“青春玉女”偶像歌星如何法製地受到塑造與包裝。關於此種現象，墨爾維的“視覺快感”理論，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絕佳的解釋：男性是要藉著如此的窺視來作為解決其閹割焦慮的一種方式。

“男性的潛意識可以通過兩種方法來解決其閹割焦慮：一為重演這項原始的創傷；即藉著考察銀幕上的這個女人，去除其神祕性，同時懲罰或挽救這個有罪的對象 (the guilty object)。另一方法則是尋求一個可供迷戀的對象或是將這個女性形象轉化成不具危險性，並且是一個可對之再肯定的戀物，以此來抵消閹割的威脅” (Mulvey, 1975: 21)

在模特兒臉上表情是如此展現，在語言文字宣傳手法也有類似的情況：以幼齒或一些特殊身分角色的女性來作“新鮮”的“招牌秀”，如“幼齒首度下海”，“學生情人秀”，“護專士特別秀”和“××商校夜間部打工秀”等，若將此與其他相關色情景觀配合來看：小電影中不乏強調“少女三點突破”者流，報章雜誌中的藥物、色情行業廣告，也不乏藉此以為招攬手段的例子；呈現出如此的情形，最值得質疑的問題便是：為何（台灣）男性會偏好此道？（筆者無法確定是否僅限於台灣有如此的現象，尚待跨文化研究進一步地加以求証。）這其中的性意識叢結為何？此將在稍後繼續探討。

除了這一類“清純類型的色情海報”之外，另外還有一類是屬於“大膽香豔”型的，其欲展現出來的風味與上一類型有極明顯的差異：模特兒以頭巾、墨鏡、豹皮衣飾、網狀罩衫等來妝扮，勾起人們欲一窺究竟的好奇心。為何會有這種類型出現呢？佛洛伊德（1910）對男人選擇其愛的對象 (object-choice) 的討論曾經提及：“這第二種類型的男子(指青樓之戀 ‘love for a prostitute’ 型的)，純潔善良的女子對其較無愛情的魅力，誘惑是來自節操和忠貞頗有可疑的女子，因為女人的浪蕩給他們帶來嫉妒的情緒，而只有當他們嫉妒的時候，他們的熱情才昇達沸點，對象的價值也才高得無可比擬”（1910：166—7）；並且由於性對象的選擇，受到亂倫禁忌的影響：假使性對象與亂倫對象相像，有如一般人對性行為對象的過份高估，會引發心理性無能的痛苦，故為免除此種痛苦，就必須將性對象降格，只有對那些地位低、無價值的女人，他們的肉慾才能暢行無阻，達到高度的快

感 (Freud, 1912: 183)。所以會塑造出此種如妓女般的形象來。

誠如激進派女性主義者所言，在男人的意識型態界定下，女人是因性才有價值的，女人若不是一個撫育子女、奉獻犧牲的母親，便該是一個僅供享樂的性玩物、性奴役。分析媒體廣告中的女性形象，常以最原型的二分法來塑造女性的模樣：一為聖潔玉女的形象（純潔、溫柔、潔白或天真爛漫的），另一則為妓女模樣（熱情的、引誘人的、豔紅的）；色情海報所呈現出來的樣貌，與這個一般廣告媒體的內容解讀結果是相同的，但是為何男性主宰的價值觀會如此地二分女性（不論是在現實生活社會的實際作為中，抑或是在其他再現中的形象表徵）？可能是在真實生活中，男性無法完全為所欲為地發洩其潛在趨力，所以須要如此地二分建構：純潔玉女是溫馴的，可以完全任其享用與擺佈，不會使他有任何的威脅與恐懼感，而放蕩的妓女是一種降了格的性對象，（據佛洛伊德的講法），是不致於引發他另一面情感（因涉及亂倫，已受禁制）的對象，所以他的肉慾便能暢行無阻。他們的控制欲望藉此得到滿足，且可以在最無威脅壓迫感受的安全距離（情境）中，享受他們“消費女色”的愉悅！牛肉場色情海報（表演）在這一方面也算是投人之潛在喜好，提供滿足與服務。

牛肉場色情海報也常可見到人獸同台表演的宣傳內容，將人與狗、雞…等其他動物相連的表演（宣傳海報），為何色情（表演）海報會偏好此道且樂此不疲，頗值得加以探索深究。格利芬 (Griffin)

(1981) 曾經對女人在色情書刊中被等同看待為動物的情況作過剖析與批判：她認為或許唯有如此，男人才能滿足其性欲與控制欲；人對動物是可施虐的，女人與動物一般，為性欲是可以不管任何的人情規範，是故男人便可稱心如意為所欲為地享用女人，所以色情書刊中的女人，不論是被塑造為主動挑逗，抑或是居於被動受虐的處境，均是被與動物等同的。另外，我們也可引用佛洛伊德 (1905) 對戀獸症 (bestiality) 的看法來補充說明：戀獸症與戀童症 (pedophilia) 出於類似的道理，因為對成年的異性對象缺少自信心，不敢與之發生關

係，而轉找其他的代替性對象，戀童症者會找年幼的異性孩童，戀獸症者則是代替性地與獸類交合（1905：148—9）。而色情表演（再現）中“人獸交合”、“美女與野獸”出現的原因則可說是因為：在不會說話、不會洩露秘密的動物面前，人可以用不用擔心害羞，可以大膽地要牠做你希望牠做的事。而在其中，不論是觀看、幻想與實際地去做，都可使人獲得一種掙脫禁制、發洩滿足的快感。

由以上色情海報透露出的訊息，我們便可據此來談隱藏在色情海報背後不為人所明察的男性雄風心理叢結。

3.2 色情再現與男“性”焦慮

男性一向被建構為須是雄赳赳、孔武有力、自主的、主動且富冒險探測性，並且是相當能自控的方可。但是否真的就是如此呢？恐怕在此炫耀、攻擊、正面的性質之後，潛藏著更多不足為外人道的焦慮害怕與不安，不然為何會有“閹割焦慮”與所謂的“腎虧症候群”出現呢？欲了解其中的癥結，不妨從心理分析所提及的“母子關係”間的矛盾情結來看女性在男性心中所造成（潛隱的）威脅。

佛洛伊德（1912）曾指出造成“心理性無能”的原因是由於愛情中的情與慾兩源流會流不良所致，這種抑制乃是發展過程中在孩童早期的固置，以及後來當亂倫柵欄設立後，在現實社會裡屢受挫折的結果；當男人面對的他所尊重的女人，性行為總是頗受威脅，只有在對付較低級的性對象時，他才能行動自如，為所欲為；也只有那些能戰勝他對女人的敬意，面對著與母親或姊姊亂倫的觀念而無愧色的男人，才能逍遙自在的戀愛（1912：184）。一個人對母親愛恨交纏的矛盾情結潛隱在男性雄風的偽面之下，當他們面對著母親（一位既能滿足而也能剝奪其需求〔need〕的重要人物），其本身的無助感便無處藏躲，他害怕母親的快感、性器官（異處：缺乏陽具），也害怕母親作為一種根源（as the source or origin），以及她的接近自然（closeness to nature）等等，母親（引申至所有女性）的身體對他來說是一種異

類，足以使他困擾不安，甚或懼怕。(參見 Kaplan, 1983; Dinnerstein, 1987; Brittan, 1989 等文獻)。可見母親所造成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另外，男性所最引以為賴（傲）的陽具（penis），在它獨立自主的“分明性”（distinctiveness）的背後，却也暗藏著危機：因為那陽具似乎是有自己的生命，尤其是在猛烈的性行為之表現中，它似乎與男性自我本體是分隔開的；此外男人也常有恐懼自己的陽具太小的心理，怕被人比下去，而多少有自卑的心結，加上色情再現（如電影、小說、圖片書刊等）中的男主角又都清一色地在強調其“又粗又大又持久”，更形塑且加強了男性在這方面的焦慮；在我們的歷史社會環境中，男性的心理、行為甚至其政治體制均環繞著陽具這個象徵在發展，陽具成為男人自豪的權力根源。所以筆者推論：就是因為男性對其“雄風”的維護是如此地在意，所以才會有“腎虧症候群”此種“性精神官能症”（sexual neurosis）的產生。

根據文榮光（1980）的研究指出：腎虧是一種具文化特殊性的疾病，包含多種症狀和病態行為³；中國人的性實踐中，腎虧的陰影一直揮之不去，扣連著傳統的陰陽五行說和醫療體系（理念）延續至今，有意無意地影響（指引）性活動的執行。例如須要進補的心理，不論

3. “腎虧症候群”一覽簡表（《中國時報》，1990年4月30日，文化觀察版）

腎虧症候群	夢遺、早洩、陽痿、縮陽症等
表現症狀	神經系統：心悸、耳鳴、冒冷汗、失眠、暈眩、惡夢頻繁、記憶減退、注意力不集中、四肢冰冷、神經衰弱、精神倦怠 骨骼系統：腰痠背痛、四肢無力、骨頭疼痛 泌尿系統：尿色白濁或深黃、頻尿、腹股溝疼痛 其他：消瘦、髮色變白、掉髮
精神病理	罪惡感、禁慾、性心理壓抑、焦慮病、憂鬱症等
一般腎虧廣告用語	補腎固精、滋陰補腎、肝腎不足、精關不固、元陽衰敗（v.s.真陰虧損）、脾腎虛寒、腎虛無子、腎虛目昏、房室虧損、精血枯竭、遺精淋濁
常見的治療方法	食補（如人蔘、蛇肉、鹿茸等）、藥補（藥酒）、藥物（如男寶、補腎丸、固腎丹）、物理治療（如“真空穴道蒸壓”）、精神療法（禁忌、節慾）、氣功（如“益腎神功”、“天龍神功”）、局部麻醉劑（如“印度神油”）

資料來源：文榮光；製表：蔡珠兒

是藥補、食補或是對性交條件的要求（如姿勢、間時、對象等），其實對性能力才更是會造成大的傷害，而此也正反應了他們潛意識中對性交的恐懼與罪惡感。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透過“射精的圖解”來理解性活動，視精液為人體最珍貴的要素，不唯中國如此（Foucault, 1985: 130），何以中國人會特別有腎虧如此的“疑難雜症”產生？道家以及中醫思想體系的浸淫人心，所謂“一滴精，十滴血”造成的“精液崇拜”恐為主因；而中國人重視傳宗接代，“身負重任”所承擔的心理壓力，再加上嚴謹的性規範、性禁忌與個人的性趨力間所造成的衝突結果，罪惡感、焦慮、憂鬱、恐慌終導致“腎虧症候群”此身心症的發生。可見在不同文化中，雖然有類似的身體關懷（physical concern），但是由於文化氛圍的相異，會影響有不同的操作方式出現，展現在台灣今日的情況便是充斥在大眾傳播媒體的重振雄風的壯陽藥物廣告；我們經常在同時接受這個以矛盾方式存在的男“性”景視：一方面是滿意、炫耀、攻擊的性，另一方面則是隱憂的、懼怕的和期待保護的性；而在色情圖文中也可以見到這種和中國人腎虧壯陽性心理同樣類似的情況。

美國女性主義者格利芬（1981）曾經指出：色情影像中的物化女性，並不是女性的真實呈現，反倒是男性自我須要維持的那種需求、情感和依賴的部份表現；色情品中的女體呈現出來的是男性自我否定的那一部分（a denied part of the self），女性在他的心中是代表他潛隱易受傷害的象徵（a woman is a symbol for a man's hidden vulnerability），因此他就如同一隻受困的動物，被自己的身體圈套住而無法掙脫開來，女性的身體也變成了他要發洩、懲罰的對象（1981: 83, 97）。所以色情品其實是男性要透過如此的圖像描述來再肯定其“性”的可控制性的一種表現，色情圖像讓他們可以控制（因為既是海報的訴求主體且可享受眼淫的快感）而又能免於親近的威脅。

所以雖然表面上我們在色情圖像中見到的是女性被屈辱、傷害或被切割擺佈的景象，事實上我們若由主導（事）者深層心理叢結的角

度切入剖析，便不難理解為何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男“性”展現；我們可進一步掌握出如此男性權力的操弄與建構的真正根源：在於男“性”的虧損與懼怕。當男性面對著具有誘惑力的女體時，會有一種“得而享受以求快感”的衝動，但是，潛在地，他却害怕自身的快感（高潮）來得太快，而其心中也暗自明白，對方（女性）的快感是否到來也不是他所能完全控制的，這種焦慮正是快感的障礙，況且他也很明白在新的社會秩序中，對女性的宰制愈來愈無法得心應手，所以他們須要藉著外在操控作為來彌補心理上的這些“弱勢”；色情影像就是男性為建構其實體而採取的方法之一，女性因之被物化，男性則在此“無聲影像”（silenced image）中尋求滿足。

4. 色情海報、性建構與身體政治——代結語

如果我們說色情再現是為滿足特殊目的——（男）人們藉此視覺感官的刺激來達致性的滿足——製造出來一種對身體、對性的操弄作為，那麼在省思色情問題時，我們便可將之放置於“社會文化／身體”這一架構來談：特納（B. S. Turner）（1984）主張：應將身體的被控制或所謂的養生之道與該社會的規範紀律作比照，許多所謂的“失調”（disorders）（特別是在那些社會上受支配壓迫的弱勢者身上），其實可視之為是社會控制的文化指標，例如歇斯底里（hysteria）、厭食症（anorexia）和空曠恐懼症（agoraphobia）等，一向被認為是女性專屬的疾病，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違常病症，可是若仔細探究，不難發現那其實是父權體制對女性身體操控壓制的產物（詳細申論可參見特納（1984）一書第六章與第八章）；而討論父權體系的制度化控制是必須與父權家計（指年長男性藉其父親威權對婦女及其子女的支配）的歷史根源扣連來看；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傳統父權家計體制逐漸削弱瓦解，在當代社會我們便須有一個新的概念來解析當今女人的地位，所以特納主張用“Patrism”來替代“Patriarchy”，指的是防禦性地對女人的規範與控制（a defensive regulation of

women) (1984: 155—6)；色情再現便可說是一種“Patrim”的產物；因此筆者主張：色情再現和其他傳統的性建構（如纏足、貞潔觀、“傳宗接代”價值觀等），雖然展現出來的是完全不同的型式，在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別，但他們之間相類似的性質和相仿的內部運作邏輯則透露出一個重要的訊息——亦即男性內在焦慮、懼怕的性心理叢結，須靠著外在種種制度化及意識型態的建構來加以宣洩，並藉此展現其“性”的可控制性，且更進一步地加強父權文化的內聚力，所以色情再現可視為整體性建構運作機制的一環（或可說是其中展現出來的一面而已）。在舊時封建社會，政經因素及社會潮流的變化影響不大，因此纏足、貞潔、賢妻良母的包袱與限制便足夠達成對女性的操控，保障父權優越地位並且維持其男性的尊嚴。但在今日資本主義社會，故技無法重施，無法赤裸裸地將其控制意圖（“父權”對女性或其他同是受壓迫的對象）展現出來，只有以商業消費為其手段、自由競爭作為幌子，來掩人耳目，以遂行其利用剝削之實，色情再現便是其中的明例。

發揮在人身肉體這部份的權力展佈作為，如節育、節食、穿著或化妝等，均與壓制性的政治支配實務（如政府、政黨、政策、選舉等）無大相關，（尤其是在現代所謂的民主自由社會中）；但是其中的權利運作仍是不可忽略的，就如傅寇（Foucault）所言，文化對身體這方面（結構性的）權力關係是“無所不在”、“由下而上”，是有意圖但又不具主體性的（1978：94），它經由越來越精細的管道（如媒介、輿論的影響，抑或集體隱名的凝視作用而後個人終將此凝視作用內化成為自己的監視者等），而達致個人本身，及於他們的身體、姿勢和所有的日常活動，且通常人們是在一種不自覺的情況內化這些意識型態價值觀，而自願對其奉行不渝的。所以它可以說是一種最持久且是最具彈性變化的社會控制。從纏足、貞節觀、傳宗接代到今日的色情海報再現與苗條減肥慾望的形塑等花樣百出的“身體紀律”，我們更可以理解這幅面廣括、淵遠流長身體控制現象的變化的社會歷史，牛肉場色

情海報不過是更赤裸裸地浮現出女性身體被利用操控結果的冰山一角罷了！而我們若將色情再現與其他對身體的操弄作為視為同類，他們之間只是在展現程度、型式有所差異：妝扮減肥雖是出於自願的，但仍然是為了在社會整體的“男生凝視”氛圍中，為吸引他人目光或避免遭人非議的作為；色情圖文則是色情製造者、觀看者為了特定目的而操縱（剝削）女體的妝扮、穿著、姿勢和表情等，二者的運作性質與邏輯，其實是如出一轍的。

解讀色情海報的用意，無非是希望能在普行的常識性看法之外，另添新意，從本土的色情現象出發，進而啓發思考性建構的問題並努力顛覆既有迷思。筆者相信對色情海報作文本分析的結果，可以補充並幫助我們對色情產業與再現有進一步的瞭解；例如本文提出“主導男性的‘雄風’心結其所內含的焦慮不安及防衛心理的作用，以致有色情海報等這些外在建構”的說法，便可以發揮顛覆一般男性至上論的作用，也可以是反駁相關色情迷思（社會神話）的有力論點。另外，台灣色情海報本身呈現出來的特殊展現情形，更令我們醒悟到建立本土色情文化史的必要性。相較於牛肉場的表演本身或其他的色情書刊，牛肉場色情海報的呈顯與暴露是頗“保守”的，但是它又更為無孔不入，以致大家會不經意地以普通的商業經營來看待“色情”買賣，因此，面對著如此複雜糾葛的情形，本文的分析只是一個嘗試的起點而已，對色情的研究其實是可以開展出相當廣闊的詮釋空間，畢竟，色情問題不是今日才有，也不會在今日終結，實有必要從各個角度去加以研究批判與解讀分析。發展出一套屬於台灣本土的性與身體的社會學分析；作更進一步的問題思索，這是此後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之一。

參考書目

（關於台灣本土的色情相關文獻，請參見註一，此處不再列出）

Barthes, Roland (1975)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ew York: The

- Noonday Press.
- Belsey, Catherine (1980) *Critical Practice*,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 Berger, John (1972) *Ways of Seeing* (中譯：陳志梧 (1991), 《看的方法》, 台北：明文),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d Penguin Books.
- Brittan, Arthur (1989) *Masculinity and Power*, Oxford &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Brownmiller, Susan (1975) *Against Our Wil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Diamond, Irene (1980) "Pornography and Repression : A Reconsideration", *From Women: Sex & Sexuality*, ed. by Catharine R. Stimpson and Ethel Spector Per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29-44.
- Dinnerstein, Dorothy (1987) *The Rocking of the Cradle and the Ruling of the World*. London: Women's Press.
- Dyer, Gillian (1982) *Advertising As Communication*,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85) *The Use of Pleasur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Freud, Sigmund (1905)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Vol. 7, pp.125-243.
- (1910) "A Special Type of Choice of Object Made by Men."

-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Love I),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Vol. 11, pp.165-75.
- (1912) “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 in the Sphere of Love,”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Love II),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Vol. 11, pp.165-75.
- Griffin, S. (1981) *Pornography and Silence*,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 Irigaray, Luce (1985)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ser, Wolfgang (1980)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ed. by Jane P. Tompkins,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Kaplan, E. A. (1983) *Women and Film*, New York: Methuen.
- Kappeler, Susaune (1986) *The Pornography of Represent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Lacan, Jacques (1977)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 Mulvey, Laura (1975)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 Vol.16 No.3, pp.6-18.
- Soble, Alan (1986) *Pornography: Marxism,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of Sexual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Bryan S. (1984) *The Body & Societ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Wen, Jung-Kwang (文榮光) & Ching-Lun Wang (1980) "Shen-K'uei Syndrome: A Culture-specific Sexual Neurosis in Taiwan," *Normal and Abnormal Behavior in Chinese Culture*, ed. by Arthur Kleinman & Tsung-Yi Lin, pp.357-69.
- Williamson, Judith (1978) *Decoding Advertisements—Ideology and Meaning in Advertising*, London & New York: Marion Boyars.
- Wright, Elizabeth (1984)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Theory in Practice*, New York: Methuen.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四期 1993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4, March, 1993.

這場性別革命確如“請客吃飯*”：
綜觀女作家“工業”與西方學者對中國當代小說之論述

露蕙絲·愛德華斯

This Gender Revolution Is a Tea Party:
the “Women Writers’ Industry” and Western Accoun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by
Louise Edwards

關鍵字：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國的女作家、性別之政治意義

Keywords: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China's women writers, gender and politics.

* “請客吃飯”這句話來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18。

本文特別感謝鄭瓊燕小姐中譯，以及錢永祥先生協助修改。同時作者也要感謝漢學研究中心與中研院社科所於作者訪台期間所提供的幫助。

收稿日期：1992年3月18日；通過日期：1992年4月25日

Received: March 18, 1992; in revised form: April 25, 1992

摘 要

本文剖析西方中國研究界在過去十年間出現的當代“女作家”現象，並探討此現象與女性主義關於文學理論和政治行動的觀點的關係。本文認為，西方中國研究學者之所以罕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為基礎研究當代小說，部份原因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門所設定的框架有不衰的影響力。

本文的一個主要論點是，中國的女作家部門視“婦女”為一個生物範疇而非政治範疇，結果完全剔除了性別的政治意義。女作家於是變成了一個特定的作家團體，溫柔馴服，不論實情如何均具有特殊的“女性”意義。女作家被歸為一類之後，她們非但無法如表面所言有利於婦女，反而使女性所能獲得的發言位置更告縮小。本文主張對文學批評的方法重新加以檢討，俾使兩性的文學寫作中的性“無意識”成為探討的對象。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phenomenon as it has emerged in Sinology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examines its relationship to feminist notion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ac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arth of Sinological work on contemporary fiction which takes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as its foundation is understandable partly in terms of the resilience of the parameters set by the culture indust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e of the paper's major points is that the women writers' industry of China has effectively depoliticised gender by ensuring that woman remains a biological and not a political category. This has produced women writers as a special group of tame “domesticated” writers giving them special “women's” significance whether appropriate or not. This isolation of female writers has thereby narrowed the base of speaking positions available to women rather than serving, as is ostensibly claimed, to promote women's interests. This paper calls for a reassessment of critical methods whereby writing from both sex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sexual “unconscious”.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雖已在當代英文作品之研究中佔一席之地，但在西方漢學研究中却剛起步¹。這確實令人震驚，因為過去十年來已有一些華文女作家作品之譯作出現。我確信，以女性主義文學評論為主要的作品之所以稀少，部份得歸因於大陸文藝界所設定的一些框架無法去除。有鑑於研究台灣與香港文學的西方學者也都會受大陸情勢與動向的影響，本文之觀察對所有有關華文女作家之研究均可成立。

本人所以會認定大陸文藝界所設定的論述框架是導致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始終無法施展的主要原因，實因眼見漢學研究的其它領域中，都早已頗深入在運用女性主義理論。以社會科學為例，伊利莎白·克魯爾 (Elisabeth Croll) 於1978年發表的《中國的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及茱蒂斯·史坦斯 (Judith Stacey) 在1983年發表的《中國的父權體制與社會主義革命》均大力且成功地引用西方的女性主義理念於其中國研究之中²。連最近興起的電影研究，也不落人後的採取女性主義論點來分析電影，此外，針對1949年以前出版小說之研究，也似乎多熱衷於反對傳統取向、反對主流觀點。麥克馬洪 (R.K. McMa-

1. 女性主義文學評論在漢學研究中最近幾年才有一點成就，比較好的作品不多，其中 Rey Chows(1991)的 *Women in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sot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比較突出。Barbara Hendrichke 的 “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論及類似“女性主義”的西方概念應用到中國的可能性，她主張這概念應該擴大以使用於近年大陸的作品上。參看 Anna Gerstlacher,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Genny Schon(eds) (1985),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Bochum: Studienverlag, pp.397—428.

2. Elisabeth Croll(1987),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Judith Stacey(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其它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關於性別理論的主要論文包括 Charlotte Furth(1986)的 “Blood, Body and Gender——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1600-1850,” *Chinese Science*, 7, pp. 43—63; “Concepts of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1(February, 1987)pp.7—33; “Androgynous Males and Deficient Females: Bi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9.2(December,1988),pp.1—31.

hon) 對明清小說中的性愛的研究專文,以及本人對《紅樓夢》所做的性別研究均屬之³。由此可見,西方漢學界唯獨對當代華文小說,不願從女性主義論點來研究。

這種差別待遇,我深信主要肇因於中共文化當局如文化部,和負責對外傳播中國文化之專責機構如外文出版社和中國文學出版社之深遠影響力。西方漢學界對中國當代小說之研究不注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當然還有其它原因,其一是漢學家們不願將此自有其政治色彩的理論應用到文學作品之上,因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產生,正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政治與文學息息相關的論調。不過,本文中我將只探討一個主題:大陸文藝界設定的框架。

1. 女性主義文學理論

要探討何以大陸文藝界妨礙了採取女性主義觀點的批評,須先解釋何謂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單單涉及在文學作品中女性或女性形象者,並不能稱得上是女性主義文學理論。隨著英法思潮合流演變至今,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包含三項主張(這些主張不只適用於文學研究,更是女性主義政治觀、科學觀與歷史觀的骨幹),其中最重要的基本主張是:批評本身即帶有政治性,也就是說,不可能有非政治、唯美學的評論存在。此一主張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自身當然也成立,因為女性

3. 參看 Chris Berry, "Sexual Difference and the Viewing Subject in *Li Shuangshuang* and *The In-laws*," 在 Chris Berry(ed.) (1985),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nem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pp.32—46. R.K. McMahon(1978), "Eroticism in Late Ming, Early Qing Fiction: The Beauteous Realm and the Sexual Battlefield," *T'oung Pao*, 73, pp.217—64; "A Case for Confucian Sexuality: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Yesou Puyan'", *Late Imperial China*, 9.2(December, 1988), pp.32—55. Louise Edwards(1988—1989), "Jia Baoyu and Essential Feminine Purity",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20—21, pp.36—47; "Women in *Honglou meng*: Prescriptions of Purity in the Femininity of Qing Dynasty China," *Modern China*, 16.4(October,1990), pp.407—429; "Gender Imperatives in *Honglou meng*: Baoyu's Bisexualit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12(December,1990), pp.69—81.

主義文學評論本就有其政治基礎與政治訴求，就這點看來，確與毛派的批判觀念近似。

但女性主義文學評論將毛派的“政治與藝術不分家”的論點，更向前推進一步，這就是它的第二大主張。藝術與文學不但深具政治性，且隱藏著性別玄機。每位作家或評論家都站在由性別所決定的政治立場上。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排斥所謂“中性作品”，就如同毛派主張排斥“無階級的作品”一般。更重要的是，這種性別定位並不取決於該作者或批評者之性別，而是取決於他們對於攸關性別之間權力分配的各項問題所取的立場。

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第三主張與第二主張息息相關，此即：視所有作品為“局部的”表現，而非“本質的”或“全面性的”。作品與其創作時的現實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此一主張也適用於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自己，因為女性主義文學評論原就秉持此一“局部觀”，以否定學術研究或文學標準的客觀性與全面性。所謂的“全面性”常意謂“男性”，而“客觀”則常以男性為主導，至於“本質性”更常將女性之體驗貶到理論的邊緣⁴。做了以上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之簡介後，我們方能嚴肅地探討何以這套理論雖與毛派思想同樣的主張社會與文學息息相關，却仍被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運作體系所摒棄、限制。

2. 女作家“工業”

大陸的文藝輸出作業一向很熱衷於促銷女作家之譯作，並以強調作者為女性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此一趨勢在西方世界也引起迴響，

4. 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介紹文章，可參考 Toril Moi(1988)的 *Sexual/Textual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Gayle Greene 和 Coppelia Kahn(1986)編的 *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 範圍比較廣，但也很值得看。Bonnie S. McDougall 對毛澤東延安談話做了一個很好的翻譯及評論，Bonnie S. McDougall(1980),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紛紛出版台灣、香港和大陸女作家小說之譯作⁵。像《北京周報》這類期刊，更常刊印有關的文章來為此“女作家現象”造勢⁶。這種強調作者性別的作法，可達到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大力宣傳社會主義下的中國女性有賴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與支持，正迅速地朝兩性平等與卸除封建思想餘毒的康莊大道邁進。“女”作家的存在更是以證明女性在文學、學術界嶄露頭角，也證明中共領導階級對兩性的社會地位與角色所持的“進取態度”。

從這點來看，大陸的女作家“工業”，已有效地將“性別”的政治性一掃而空，政府與黨的父權體制首肯了婦運目標的合法性，進而化解兩性對峙的抗爭基礎。性別之爭論為無牙老虎般的發不了威，“男性”、“女性”二詞已失去其爭權的潛力，而只有字面上的差別而已，〈全國婦女聯盟〉的成立就是此一“包含”手段的最佳例證。哈尼克希 (Honig) 與赫謝特 (Hershatter) 二人針對1980年中葉為止的發展情勢總結如下：“婦盟的存在，其目的是為排除再成立其它婦女組織的需要。”⁷縱然婦盟隨即採取各種保障女性權益的行動，它仍只是個上行下效、由政府出面贊助的組織，而不是由婦女們獨立組成的團體。婦盟出版的期刊《中國婦女》，以多國語言發行，是典型的婦盟工作之一，該期刊的內容不外乎一些不辭辛勞、自我奉獻的母親與妻子

5. 參看 Panda Series(1982),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Rosemary Roberts and Angela Knox (eds and trans)(1987), *One Half the Sky*, London: Heinemann; Nienling Liu 等(eds and trans)(1988), *The Rose Colored Dinner: New Work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Hongkong: Joint Publishing; Eva Hung (ed)(1990),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Hongkong and Taiwan*, Hongkong: Renditions; Ann C. Carver, Sung—sheng Yvonne Chang (eds) (1991), *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6. 看 Guo Linxiang(1979), “Zhang Jie: A Niw Women Writer,” *Chinese Literature*, 9, pp.103—4; “Women Writers”, *Beijing Review*, 23.36(1980),p.29; “Women Writers Through Tree Generations,” *Beijing Review*, 29.2(1986), p.18; “Improving the Image of Women in Literature,” *Beijing Review*,29.31(1986), p.27.

7. Emily Honig 和 Gail Hershatter(1988), *Personal V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0.

的故事，穿插在各式食譜與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新聞之間。

以相同的手法，頒令上班女性在國際婦女節享有半天休假，不但可達到將性別“非政治化”的目的，同時也可與中共當局一再宣揚的兩性平等論調相互唱和。大陸限制言論自由與示威運動已行之有年，3月8日絕不可能成為以婦女政治行動為焦點的特別日子。中國共產黨只不過藉此恭維婦女，冠以“女工人”之美名，使有別於“真正的”（男性）工作者而已。這個象徵性的半天假，空洞得毫無可能激發任何政治抗爭行動，却能使中國共產黨掌握住“維護女權”的崇高地位。然而婦盟的成立，《中國婦女》的刊行，或多放半天假等舉動，都不是針對解決婦女問題而存在的，只不過因為目前為止尚不准任何其它形式的組織、雜誌或政治行動存在，因而更能確保這類“官方的”婦女活動之保守的政治效果。由父權體制的文化機構來積極促銷女作家，同樣也能使性別“中性化”，“女”作家變成女“作家”，很有技巧地將大陸的性別革命弄得像“請客吃飯”一樣。

3. 女作家與“真作家”的分野

女作家的作品都帶有特殊的性別色彩，藉以提醒讀者在字裡行間搜尋作者對生活感到不太公平、不太現代化的怨懟情愫。就這點而論，大陸的女作家們扮演了女性權益代言人的角色，不管她們是否願意扮此角色。從她們的作品中，我們不會特別去留意是否有“家務以外”的政治訊息，除非某作者已被扣上“異議份子”的帽子。而所謂的女性問題不外是些煩人的刁絮（也較不危險的）、又令小市民頭疼的瑣碎問題。在這樣過度渲染的父權式世界觀之下，正視婦女身兼數職或離婚後受到歧視待遇等問題，足以使婦女無心再挑起“無止境地攫取社會權力”的戰火。嘮叨的家庭主婦只需一句同情的話或耐心認同她們的遭遇就能安撫住，然後就天下太平，一切還是老樣子了。

有人或要堅稱女作家的創作原動力與男作家沒什麼兩樣，的確，作家之所以會帶有所謂“女性問題”色彩也常受讀者或文化事業決策

者的感受之影響。一種較實際的歸類法則是視華文女作家為爭取知識份子權益的代言人，而非所有女性權益的代言人。最近被力捧的女作家謹容的〈人到中年〉譯作，已於80年代由潘達出版公司納入《中國七位當代女作家》叢書中，該作品闡述的是知識份子的苦難（尤其是醫學界），而不是為女性抱不平⁸。相反的，張賢亮的《習慣死亡》、《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雖是男人寫男人的故事，其中却不乏對社會主義下女性在生活各層面所受差別待遇的描寫⁹。另一位男作家張弦在其描述悲劇式愛情的《被愛遺忘的角落》小說中，也大有發揮，他在《寡婦》中更描寫寡婦的悲慘，這些作品都被收集在毛澤東死後新秀作家的文集裡¹⁰。同樣的，知名度極高的女作家張潔確在《方舟》小說中，談離婚婦女的歧視待遇問題，但她也在《沈重的翅膀》一書中，描寫工廠無效率的情形¹¹。賦予女作家“所有女性的代言人”之堂皇頭銜後，她們可寫的主題雖更寬廣了，但也變瑣碎了，徒然強調“女性式語錄”的空洞形式而已。

雷金慶 (Kam Louie) 在一篇研究“毛澤東死後出版小說中的愛情觀”論文中，就採取了一個較聰明的途徑來探討個人或家庭問題。他完全不把愛情與婚姻所牽扯出複雜問題女性化，而致力於討論分別由男、女作家執筆的相關作品，因此我們讀到的是對“政治化愛情觀”

8. Shen Rong(1982), "At Middle Age", Yu Fanquin 和 Wang Mingjie 譯，在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p. 119—204.
9. 見 Zhang Xianliang(1985), *Mimosa*, Gladys Yang 譯，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p. 13-181; *Half of Man is Woman*, Martha Avery 譯，London: Viking, 1987; *Getting Used To Dying*, Martha 譯，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10. Zang Xian(1983), "A Place Forgotten By Love", 在 Lee Yee (ed.), *The New Realism: Writing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therine Lu 譯，New York: Hippocrene, pp. 244—60; "The Widow", 在 Michael S. Duke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Post—Mao Fiction and Poetry*, Howard Goldblatt 和 Ellen Yeung 譯，Armonk, N.Y.: M.E. Sharpe, pp.91—7.
11. Zhang Jie, "The Ark", 在 Zhang Jie(1987), *Love Must Not Be Forgotten*, Stephen Hallet 譯，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p.125—222; *Leaden Wings*, Gladys Yang 譯，London: Virago Press, 1987.

這個主題的種種看法，而不刻意去強調作者的性別，也因而能對小說中的愛情觀作一更包羅萬象、更毀譽均衡的分析¹²。

芭芭拉·漢瑞奇克 (Barbara Hendrishke) 於1982年在中共文化部訪談《文藝報》一位男性編輯劉希正 (譯音) 後，也強調“對女作家作品的感受與期望”是個老問題。劉先生表示，男作家偏向取材自較廣泛，較與社會有關的主題，作品雖較膚淺、風格也平淡無奇，但却較中肯、有活力。而女作家的作品較細膩，但主題多為對大自然的冥思、道德問題及個人觀感等，少有社會性的題材。女性作家常頗直覺的關心人類行為模式，並將故事情節安排在像家庭這樣一個較狹窄的空間裡。在劉先生發表這段話之前不久，女作家宗璞會重申男女作家在大陸文藝界中平起平坐，作品沒多大差異¹³。不同性別的文藝從業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實在值得注意，因為許多女作家不願因她們的身份“特殊”，而讓人小看了她們的作品。而台灣的評論家葉奇英則視“女性意識”為女性特有的生理與心理機制的自然結果¹⁴。我認為大陸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意識，在在顯示其讀者與評論家都以純生物學的成見來看女作家，旨在限定她們成為小家子氣或溫馴的作家。

這些女作家們不愛“女”作家的名銜，而寧可為女“作家”，像個大家公認的“真正作家”，而不是“虛有其名”的“女”作家¹⁵。她們也察覺到“女作家”之名只是客套恭維，因為男性作家從未被標為“男作家”，女作家的特殊身份只是藉著戴高帽來貶低她們的貢獻。西

12. Kam Louie(1985), "Love Stories: The Meaning of Love and Marriage in China, 1978-1981," 在 Jeffrey C. Kinkley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pt. in Kam Louie(1989),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Essays on Post-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Sydney: Wild Peony, pp.49-75.

13. Hendrishke(1985), "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400.

14. Yeh Chih-ying(1990),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Mainland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Vol.26, No.1, p.116.

15. 女作家拒絕“女作家”這別號的人很多，參看“Discussions with Five Chinese and British Writers,” *Chinese Literature*(Summer, 1989), pp.174-87.

方的女性主義者已費了相當心力，試著重建女性自古以來的文學傳承，以作為現代女作家出發的依據點，雖然她們的主張是兩性對立的，但她們這種局部觀的研究方式較不空洞，也較令人正視。再說，西方的女作家，不一定會和以出版女性主義作品為主的出版社如女性出版社 (Women's Press) 或悍婦出版社 (Virago) 搭上線，而且西方的讀者也不一定在乎作家的性別。反觀大陸，女作家完全沒有這種身兼雙重身份 (女人和作家) 的自由，不管她高興與否，她們只像是私家珍藏品般被展示著。因此，大陸的女作家“工業”在父權體制下所扮演的的是整合而非對立的角色，其地位也因特殊的身份標誌而遭貶低。

以下我將說明父權體制如何鞏固其地位，如何套用女性主義理論於王蒙、張賢亮、劉心武、白樺等男作家的作品中，以自我肯定其權力“不”平均分配的一貫作風。研究這些“真正作家”的論述多半大力吹捧這些作品具有較廣泛的社會意義，並賦予它們一個有別於因“特殊”而抬頭的女作家作品的正統地位¹⁶。舉例來說，這些男作家都會以其獨創的社會批判或文字風格備受讚譽，而像張抗抗、遇羅錦等女作家違抗死板寫實主義窠臼的作品，却只被視為展現特殊女性主義色彩而已。尤有甚者，在大陸像張、遇這樣勇於探討較難處理的兩性問題 (如家庭) 的作家，連其個人習性都常惹人非議，却沒人誇她們有膽識、有創見。就拿遇羅錦來說，她那本描寫一場不愉快又飽受凌辱並以離婚收場的婚姻自傳式小說出版時，恰巧是她為要求二度離婚而打官司的時候，現實生活與小說情境被混為一談，一時間，不但各媒體出現大篇幅的報導，輿論也為之沸騰¹⁷。像殘雪這位也強烈排斥

16. 關於王蒙的討論見 Leo Ou-fan Lee, "The Politics of Techniqu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Dissid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在 Jeffrey C. Kinkley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pp.159-82; Frances La Fleur(1991)討論劉心武(1990), *Black Walls and Others Stories*, Don J. Cohn, (ed.), Hongkong: Renditions, 在 *World Literature Today* p.766; Michael Duke 關於白樺的討論在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Jeffrey C. Kinkley(1991)關於張賢亮的討論，在 *World Literature Today*(Autumn), p.767.

刻板文體形式的女作家，其作品雖剛有英譯本問世，但却叫人更難漠視其女性的原創力，也更難對她所作的努力遽下教條式的批判。因為她作品中的主角性別模糊（讀者不太能確定那第一人稱的“我”，究竟是男是女），而且行文間又充斥著沒有頭緒又雜陳並列的意象，完全不按寫實主義的牌理出牌，使她不致成為女作家“工業”的操縱者可駕駛的工具¹⁸。值得一提的是，殘雪和遇羅錦都不是作家協會的成員。

尤戴陽 (Yue Daiyun) 和卡羅萊·魏克曼 (Carolyn Wakeman) 一向較傾向於推崇能從廣泛社會層面來探討女性問題的作家，他們曾說：“目前真正探討女性問題的作品正是在揭露影響整個社會的問題。”¹⁹但是，將女性問題與社會問題相提並論，似乎有意無意的將前者的地位置於後者之下。事實上，這些所謂的女性問題也同樣是“男人的問題”。我們若花點時間來談談“男性的種種問題”也將大有斬獲，同時也可使女性不再是注意的焦點，因為她們的“受害者”形象，透過所謂“女作家”的披露，一直助長著貶低女性貢獻與潛能的趨勢。

17. 參見 Emily Honig(1984), "Private Issues, Public Discourse: The Life and Times of Yu Luojin," *Pacific Affairs*, Vol.57, No.2, pp.252—65. 在台灣, Chou Yu—sun(1986) 的 "Yu Lo—chin's Winter and Spring", *Issues and Studies*, Vol.22, No.6, pp.9—12. 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一個問題。這篇文章表揚遇羅錦作品中的大膽風度及她到西德求政治避難的行動。遇羅錦第一部作品翻成英文稱為 *A Chinese Winter's Tale*. Emily Honig 提及她的第二部《春天的童話》，說廣州的《花城》刊物曾發表這作品，但該期一出版就被撤回了。

18. 參看 Jorg Michael Nerlich, "In Search of the ideal Man: Yu Luojin's Novel *A Winter's Tale*," 在 Anna Gerstlacher et al (eds)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pp. 454—72. Ronald Janssin and Jian Zhang 最近把殘雪的作品已翻成兩冊, *Dialogues in Paradis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和 *Old Floating Cloud: Two Novella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我對第一部小說作了短的評論, "Broadening Horizons: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Asi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4(1992), pp.59—66.

19. Yue Daiyun 和 Carolyn Wakeman(1983), "Women in Recent Chinese Fiction: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2, No.4, p.887.

4. 無政治色彩、純生物學的性別觀

從坊間完全沒有研究華文文學作品中男性及男性特質的論述這一點來看，確實足以反映出華文女作家身份的“特殊”。除了雷金慶最近著表的兩篇男性研究論文外，西方漢學界一直很坦然的忽略兩性之一的“男性”²⁰。由於“女性作家工業”界與一般的西方漢學家一向視女性為“問題”，才使“男人”、“男性”一直保持著其不容置疑的規範與標準的地位。在這樣的格局中，問題是單向的，是專屬“女性”的。因為不從整體觀點來看性別問題，不把“男性特質”、“女性特質”視為可互相借鏡的一件兩面，“女性”問題遂被孤立起來，成為需要特別處理的對象，而男性為鞏固其性別不平等地位的陰謀也很俐落地被忽略掉。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完全著眼在“女性”身上，似乎旨在質疑女性與人類典範的男性間的差異與優劣。假如有第三性別存在，並扮演著目前女性犧牲小我、助長男性雄威的角色的話，女性才有可能擁有像男性的地位。為此，科幻作品特別構想了各式各樣會打雜跑腿的機器人，使男性與女性科學家可以平起平坐²¹。

這個漏洞是由於不把性別問題視為政治問題所致，恰與女性主義理論所提倡的主張背道而馳。因此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套純然基於生物學本質論的“女作家”公式和一套廣義而且非生物觀的真正作家(意指男性)的高調。“男性作家”才是文化與文明新觀念的主導者，而“女作家”只是陪襯他們，藉以彰顯男女有別的自然定律而已。女

20. Kam Louie(1991), "The Macho Eunuch: 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in Jia Pingwa's 'Human Extremities,'" *Modern China*, Vol. 17, No.2, pp.163—87; "Masculinities and Minorities: Alienation in 'Strange Tales from Strange Lands'",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1992). 這兩篇例外的作品可能暗示快來的動向，鄭萬隆的小說充滿了硬漢式的英雄大丈夫及缺乏個性的女性人物。這些形像很值得女性主義批評的批判研討。

21. 參看 Rudolf Wagner, "Lobby Literature: The Archaeology and Present Func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in China," Jeffrey C. Kinkley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pp.17—62.

作家之所以被歸為一類，被扯出來成為注意焦點的唯一理由是她們的女性荷爾蒙比男性荷爾蒙多。在北美地區，許多女作家並不關心女性問題，她們寧躋身於反對爭取男女平等的“真正女人”的團體中。羅絲瑪利·羅勃斯 (Rosemary Roberts) 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注意到張潔在處理婦女解放問題時的保守態度，例如：張潔一成不變地賦予女幹部反派角色，會讓人以為她贊同女性不適合當官的看法²²。上述這種“由男人一手促成”的牽強撮合，將女性作家集中起來作為研讀與批判對象之舉，實在是因為在父權體制的觀念裡，女性原本就很無奈地受限於她們的血肉之軀 (劣於男性)，而且又很容易滿足於扮家家酒式的性別革命。

在西方漢學界也出現這種純從生物學觀點，而非政治觀點，來研究華文女作家的作品，像邁克爾·杜克 (Michael S. Duke) 編的現代中國女作家論文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書所收集的論文之間沒有多大關聯，只不過所研究的作家都是女性，其中有不少篇更是另有目的而寫的，所以很難由此判斷女性在中國社會的地位。不過，該文集的序論中，倒是很廣泛地談到女性在中國社會的政治地位。探討李昂、張抗抗、和洪婷婷等不同風格女作家的多篇論文，便以生物學決定論的角度而收錄在同一冊文集裡。有別於該書序論的是，這些論文視各位女作家為“真正的”作家，並研究她們運用臆想和象徵的手法……等等寫作技巧，而不涉及具有政治色彩的“女性”之議²³。

與該文集成強烈對比的，則有泰尼·巴羅 (Tani Barlow) 的丁玲小說譯作集，儘管丁玲對女性主義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常持不同的看法，這本文集的主旨在於透過這丁玲的作品和生活體驗來揭露女性

22. Rosemary Roberts (1989), "Images of Women in the Fiction of Zhang Jie and Zhang Xinxin," *China Quarterly*, No. 120, p. 803. 據說丁玲對於西方的女性主義也感到很難瞭解，參看 Tani Barlow's with Gary J. Bjorge (eds.) (1989) *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Boston: Beacon Press, p. 45.

23. Michael S. Duke (ed.) (1989), *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 Armonk, N.Y.: M.E. Sharpe.

寫作、女性主義理論和性別差異等非常合時宜又無國界的女性切身問題²⁴。這個主旨持續出現在每篇故事譯文前的評論文章中，也使本文集中所出現的“女性”一詞成為具有政治色彩的字眼。

如果施爾菲亞·陳 (Sylvia Chan) 所說的“任何一篇文學作品本身沒有所謂男性、女性之分，但經研讀後才見分別”這句話屬實，那麼，為什麼我們總想把女性問題讀“進”女作家作品中呢²⁵？強調從女作家作品看女性問題的作法，只會使女作家的發言立場愈來愈狹隘。大體而言，女性主義和婦運的目的在於擴展女性的各種機會、增加女性發言立場和發言權，而大陸的女作家“工業”却達到了會使女性發言立場狹隘的目的，因為他們限制“宜室宜家”的“女”作家們，在其有志難伸的創作領域中，只能為“女性”代言。

對真正有心探討大陸兩性觀念的學者們而言，如果先從研究男、女作家作品開始，並設法由字裡行間理出一條馬基雷 (Macherey) 所謂的“無意識”路線的話，應會較有收穫²⁶。如此一來，或能將女作家從女作家“工業”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5. 結論

本文很清楚的指出，長久以來，西方漢學家們在他們的華文小說研究中，普遍都接受大陸女性作家“工業”對女作家設限的這項事實。這些研究包括受歡迎又不具政治色彩的女性作家作品譯文集，也有非政治性的只探討女作家寫作技巧的論文集。這些特色當然會不斷改變，正如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逐漸入侵大陸的文學體制一般²⁷。但

24. 看 Tani Barlow, "Introduction," *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p.2.

25. Sylvia Chan(1989), "Chang Chieh's Fiction: In Search of Female Identity," *Issues and Studies*, Vol.25, No.9, p.85.

26. Pierre Macherey(1978),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Geoffrey Wall 譯,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7. 參看 Lin Shuming 文章裡面討論的小說。Lin Shuming(1990), 〈評當代我國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評論》,第4期,頁36—43。

是，較根深蒂固的女作家無政治立場的陝隘觀念仍會有些許影響，並持續存在，因為無論在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父權體制下，這種觀念都具有整合的作用。不但大陸的女性文學工業一直不正視女性問題大力促銷這一群身份特殊的“招牌”作家，許多西方的漢學者也很熱心地反芻著這種對女作家的父權式成見。

將“男性”“女性”的觀念政治化，其重要性不只限於性別革命而已，它也是漢學界挖掘嶄新且富挑戰性研究題目的重要線索。

參考書目

- Barlow, Tani E. with Bjorge, Gary J.(eds) (1989) *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Boston: Beacon Press.
- Berry, Chris (1985) “Sexual Difference and the Viewing Subject in *Li Shuangshuang* and *The In-laws*,” In Chris Berry (ed.)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nem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apers, pp.32—46
- Can, Xue (1989) *Dialogues in Paradise*, trans. by Ronald Janssen and Jian Zhang,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91) *Old Floating Cloud: Two Novellas*, trans by Ronald Janssen and Jian Zhang,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Carver, Ann C. and Chang, Sung—sheng Yvonne (eds) (1991) *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 Chan, Sylvia (1989) “Chang Chieh’s Fiction: In Search of Female Identity,” *Issues and Studies*, Vol.25, No.9, pp.85—104.
- Chou, Yu—sun (1986) “Yu Lo—chin’s Winter and Spring,”

- Issues and Studies*, Vol.22, No.6, pp.9—12.
- Chow, Rey (1991)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Vol. 75, Minnesot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roll, Elisabeth. (1978)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9) “Discussion with Five Chinese and British Writers,” *Chinese Literature*, pp.174—87.
- Duke, Michael S.(ed.) (1989) *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 (1985)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Louise (1992) “Broadening Horizons: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Asi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24, No.1, pp.59—66.
- (1990a) “Women in *Honglou Meng*: Prescriptions of Purity in the Femininity of Qing Dynasty China,” *Modern China*, Vol.16, No.4, pp.407—29.
- (1990b) “Gender Imperatives in *Honglou meng*: Baoyu’s Bisexualit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 Vol.12, pp.69—81.
- (1988) “Jia Baoyu and Essential Feminine Purity,”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Vol.20—21, pp.36—47.
- Furth, Charlotte (1988) “Androgynous Males and Deficient Females: Bi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9, No.2, pp.1—31.

- (1987) “Concepts of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46, pp.7—33.
- (1986) “Blood, Body and Gender—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1600—1850,” *Chinese Science*, No.7, pp.43—66.
- Greene, Gayle and Kahn, Coppelia (eds.) (1986) *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
- Guo, Linxiang (1979) “Zhang Jie: A New Women Writer,” *Chinese Literature*, No.9, pp. 103—4.
- Hendrishke, Barbara (1985) “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Anna Gerstlacher,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and Jenny Schon (eds),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Bochum: Studienverlag, pp.397—428.
- Honig, Emily and Hershatter, Gail (1988)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nig, Emily (1984) “Private Issues, Public Discourse: The Life and Times of Yu Luojin,” *Pacific Affairs*, Vol.57, No.2, pp.252—65.
- Hung, Eva (ed) (1990)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Hong Kong and Taiwan*, Hong Kong: Renditions.
- (1986) “Improving the Image of Women in Literature.” *Beijing Review*, Vol.29, No.31, p.27.
- Kinkley, Jeffrey C.(1991) Review of Zhang Xianliang, *Getting Used to Dying*, *World Literature Today*, trans. by Martha Ave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767.

- La Fleur, Frances (1991) Review of Liu Xinwu, *Black Walls and Other Stories*, Don J. Cohn.(ed.), *World Literature Today*, Hong Kong: Renditions, p.766.
- Lee, Leo Ou—fan (1985) “The Politics of Techniqu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Dissid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Jeffrey C. Kinkley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9—82.
- Lin, Shuming (1990) “Ping dangdai wo guo de nüquan zhuyi wenxue piping,” *Wenxue pinglun*, No.4, pp.36—43.
- Liu, Nienling et al (eds and trans) (1988) *The Rose Colored Dinner: New Work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 Louie, Kam (1992) “Masculinities and Minorities: Alienation in ‘Strange Tales from Strange Lands’ ,” *China Quarterly* ,forthcoming .
- (1991). “The Macho Eunuch: 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in Jia Pingwa’s ‘Human Extremities’ ,” *Modern China*, Vol.17, No.2, pp. 163—87.
- (1985) “Love Stories: The Meaning of Love and Marriage in China, 1978—1981,” Jeffrey C. Kinkley (ed.)*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Cambrd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pt. in Louie, Kam.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Essays on Post—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tey*, Sydney: Wild Peony, pp.49—75.
- Macherey, Pierre (1978)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trans. by Geoffrey Wal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cDougall, Bonnie S.(1980)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McMahon, R.K (1988) "A Case for Confucian Sexuality: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Yesou puyan' ," *Late Imperial China*, Vol.9, No.2, pp.32—55.
- (1987) "Eroticism in Late Ming, Early Qing Fiction: The Beauteous Realm and the Sexual Battlefield," *T'oung Pao*, No.73, pp. 217—64.
- Moi, Toril (1988) *Sexual/Textual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 Nerlich, Jorg Michael (1985) "In Serach of the Ideal Man: Yu Luojin's Novel *A Winter's Tale*," Anna Gerstlacher,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and Jenny Schon (eds),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Bochum: Studienverlag, pp. 454—72.
- (1987) *Renditions*, (Special Issue on Women Writers), No.28.
- Roberts, Rosemary (1989) "Images of Women in the Fiction of Zhang Jie and Zhang Xinx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0, pp.800—13.
- (1982)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 and Knox, Angela (eds. and trans.) (1987) *One Half the Sky*, London: Heinemann.
- Shen Rong (1982) "At Middle Age,"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trans. by Yu Fanqin and Wang Mingjie,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p.119—204.
- 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gner, Rudoolf (1986) "Women Writers Through Three Generations," *Beijing Review*, Vol.29, No.9, p.18.
- (1985) "Lobby Literature: The Archaeology and Present Func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in China," Jeffrey C. Kinkley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62.
- (1980) "Women Writers," *Beijing Review*, Vol.23, No.36, p.29.
- Yeh, Chih—ying (1990) "The Dvelopment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Mainland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Vol.26, No.1, pp.107—17.
- Yu, Luojin (1986) *A Chinese Winter's Tale*, trans. by Rachel May and Zhu Zhiyu, Hong Kong: Renditions.
- Yue, Daiyun and Wakeman Carolyn (1983) "Women in Recent Chinese Fiction: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424, pp. 879—87.
- Zhang Jie (1987) "The Ark," trans. by Stephen Hallet, Zhang Jie, *Love Must Not Be Forgott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p.125—222.
- (1976) *Leaden Wings*, trans. by Gladys Yang, London: Virago Press.
- Zhang Xian (1985) "The Widow," Michael S. Duke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Post—Mao Fiction and Poetry*, trans. by Howard Goldblatt and Ellen Yeung, Armonk, N.Y.:M.E. Sharpe, pp.91—7.
- (1983) "A Place Forgotten By Love," Lee Yee (ed.). *The New Realism: 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 by Katherine Lu, New York: Hippocrene, pp.244—60.

Zhang Xianliang (1991) *Getting Used To Dying*, trans. by Martha Ave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7) *Half of Man is Woman*, trans. by Martha Avery, London: Viking.

—(1985) “Mimosa,” , *Mimosa*, trans. by Gladys Yang,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p. 13—181.

Zheng Wanlong (1992) *Strange Tales From Strange Lands*, Kam Louie (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forthcoming.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四期 1993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ò. 14, March, 1993.

臺灣新政商關係的形成與政治轉型

王振寰

The State, Capital, and Taiwan's Political Transition

by
Jenn-hwan Wang

關鍵詞：政商關係，政治轉型，國家機器，資本

Keywords: the state, capital, political transition

*本文曾經發表於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和中國社會學社舉辦之“臺灣民主化中的國家與社會”研討會，東海大學社研所內研討會，以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與清華大學文學所共同舉辦的“文化批判”研討會。作者感謝林忠正，陳介玄，趙剛，蕭全政，陳忠信，陳光興，與鍾維達等先生，以及與會的同仁和同學的寶貴意見。最後作者同時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審查意見。本文已經對某些批評作了必要回應，不過如有錯誤之處，仍由作者本人負責。

收稿日期：1992年7月27日；通過日期：1992年10月21日

Received: July 27, 1992; in revised form: October 21, 1992

摘 要

本文在討論臺灣政商關係的改變與政治轉型之間的關係。本文的主要問題是：是甚麼原因造成臺灣政商關係的轉型，而這個轉型又意味著甚麼樣的社會政治轉變？本文從國家機器，資產階級，以及下層人民的動員三個因素來解釋臺灣政治的自由化與新政商關係的出現。本文指出，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大眾的動員和對威權體制的抗拒有密切的關係，由於大眾的動員使得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之間產生更密切的聯盟關係。最後，本文指出雖然資產階級對國家機器的影響力逐漸的增加，但是國家機器並沒有失去主導的力量，資本家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關係是從“父子關係”轉變到“大小伙伴”的聯盟關係。

Abstract

The main question of this paper is: what factors have cau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capital relationship in Taiwan's recent political transition? This paper uses three factors in accounting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state, the capitalist, and the popular movement. The main argument is: while the popular movement has caused Taiwan's recent political transition, it has also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of a neo-authoritarian regime that transforms the state-capital relationship from a patrimonial to a senior-junior type of alliance. However, though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allowed the capitalists to have more influence on the state, the KMT state still has kept its autonomy in major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四十多年來，臺灣商人從來沒有這麼風光過，過去他們和政客打交道必須偷偷摸摸進行，…但現在他們卻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公然擁抱…。商人和政客變成一對親密的伴侶，這已是一項公開的事實。過去商人很難進入政治的殿堂以及政客的密室，但現在他們卻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一個新的政商關係也於焉形成。

——新新聞，195期，1990年12日。

臺灣在1987年政治解嚴之後，興起了很多新的現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商關係的改變。在戒嚴的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政府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是高高在上的，它扶植資本家，強化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國民黨政府官員與資本家之間總會保持某些距離而未全然公開，免得被批評為官商勾結。然而這個現象在1990年之後有了極大的轉變。李登輝總統和郝柏村院長除了公開宣布“政府的角色就是為資本家賺錢”的政策性宣示之外，更是經常性的與企業界會餐和打高爾夫球。而某些大資本家更是經常的出入重要政府部門而無所忌諱。這些現象在政治解嚴前是無法想像的。要如何理解這個現象？為甚麼資本家的角色會有這樣的改變？又到底是甚麼樣的結構性原因造成這樣的轉變？

然而假如我們再仔細觀察，在解嚴前，甚至在解嚴初期，資本家在政治舞台上的這種如此明顯而活躍的角色之現象並未出現。它的出現主要是在1990年之後。而這個時期的特色是，國民黨政府的郝柏村內閣，一方面強烈的壓制社會運動，另一方面積極為資本家創造投資環境，並不斷的利用各類的全國性經濟會議的召開，將主要政府官員與資本家齊聚一堂進行意見整合，以改善投資環境。在此同時國民黨亦開始進行經費達八兆新台幣的六年國家建設計劃，企圖透過公共投資強化臺灣的基礎結構；以及進行國會全面改選的政治改革計劃，希望能以其預期的方式進行政治的轉型。到底國民黨政府的這個“國家計

劃”(state project)與新興的和轉型中的政商關係這兩個現象之間是否有關聯？

本文的目的在討論臺灣政商關係的改變與政治轉型之間的關係。本文的主要問題是：是甚麼原因造成臺灣政商關係的轉型，而這個轉型又意味著甚麼樣的社會政治轉變？到底臺灣的資產階級在這個轉型裡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臺灣的資產階級未來可能扮演葛蘭西(Gramsci) (1971)所描述的“具有意識型態霸權”的角色嗎？即，它可能在意識型態宰制國家機器和整個社會之上，且國家機器的運作原則是基於共識 (consent) 而非壓迫 (coersion)，而被宰制階級不認為社會有剝削且為這樣的政治社會型態辯護？

1. 政治轉型與權力鬥爭

1980年代以來第三世界的政治轉型，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威權政體的瓦解，是從威權體制過渡到其他體制 (something else) 的過程。歐當納與施密特 (O'Donnell & Schmitter) (1986) 指出了威權政治轉型的兩個不同的過程——自由化與民主化。自由化的主要面向是權利 (rights)，它是指有效的賦與或重新界定個人或群體的基本權利，以免於受到執政當局或第三者任意或非法的迫害行動之過程而言 (1986: 7)。例如人身基本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而民主化的基本面向是公民權，是指公民權能有程序和有規則的建立的過程；這包括政治制度運作原則的改變，擴張公民權到不同群體，以及擴大公民參與的面向和議題等 (1986: 8)。簡單的說，正如史瓦斯基 (Przeworski) 說的，自由化是指政治體制的鬆動，但是原來政治體制的運作和結構並沒有質上的轉變。而民主化則是指建立一個制度化衝突和妥協的規則和模式，而競爭的各方也能心甘情願的接受在這制度內競爭的結果之過程而言 (1991: 66)。

自由化和民主化這兩個過程並不相同，其發展也未必一致。一般而言，自由化先於民主化，即威權政體必須先瓦解，然後才會有新遊

戲規則的建立。但是自由化發生之後，未必一定跟隨著民主化的到來。有些威權政體可能開放較大的自由權利給人民，但是却未必在政治制度上作改變或給予不同政黨相同的競爭空間。相反的，有些威權政體逐漸而緩慢的擴張公民權，但爲了有效的掩蓋一些爭論性問題，因此仍然嚴格的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 (O'Donnell & Schmitter, 1986:9)。但不論如何每個社會政治的轉型由於其特定的歷史條件，展現出不同的步調和模式。而在這些政治轉型的過程中，舊有的聯盟可能瓦解而出現新的聯盟和統治形式。而有些社會可能在轉型的過程裡又重新回到威權統治的類型。威權統治的轉型，民主化不是唯一的形式而祇是眾多可能性之一而已。

以下本文將指出，臺灣的政治轉型主要是在自由化的面向上，即國民黨威權政體逐步的瓦解，但是在民主化的層面上，即建立公平的政治競爭規則，仍未穩固。而在威權政體自由化的問題上，本文認爲它是一個權力鬥爭的過程以及結果。而在這裡包含了三個主要的因素。一是國家機器的角色；另一是資產階級的角色；以及最後是下層大眾 (mass) 的動員能力。而本文主要的命題是：那些在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階級或群體不可避免的會拒絕改革，因此民主改革的動力來自社會內較被剝削和較不利的大眾群體。而自由化正是不同階級或群體之間權力鬥爭或聯盟的產物。因此政商關係的類型，不可避免正是鬥爭中的階級或群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結果。

1.1 國家機器的角色

國家機器¹是一個行使政治統治權力的機構。因此它包含了權力的使用和權力運作的制度。而權力的使用和制度，在任何國家機器都不是鐵板一塊，它包含了不同的權力集團 (power bloc) 以及不同的組

1. 國家機器在這裡的用法較接近韋伯 (M. Weber) 的定義，即在一定領域內，具有壟斷合法暴力的一套行政，立法，行政，警察，司法，和軍事的組織和制度。新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機器的看法，較傾向將它視爲資本主義的反映，而缺乏對國家機器作制度性的分析。但這個看法在晚期的普蘭札斯有很大的修正。

織和制度。不同的權力集團希望透過國家機器擴張其利益，而國家機器內的不同組織和制度同樣也企圖擴張其權限。

因此，國家機器的運作與轉型牽涉到不同權力集團之間，以及它們與大眾 (masses) 之間的聯盟與鬥爭關係。各種權力集團，包括階級與非階級性，企圖透過聯盟掌握國家機器的權力來擴張其利益。而大眾則透過制度之外和之內的方式挑戰國家機器內的權力集團。國家機器本身的各種制度和組織因此成為鬥爭的場域。而政治轉型也因此是各種權力集團和大眾透過鬥爭而改變國家政治體制的過程。這正如晚期普蘭札斯 (Poulantzas) 指出的，“國家機器並不是一個一致的集團，而是一個策略的戰場” (1978: 138)。

但國家機器亦必須放在歷史特定的條件下來看，因為國家機器的形成和運作包含了歷史的痕跡。任何國家機器都是在其特定歷史條件下，承繼著先前的制度，再隨著階級鬥爭、地緣政治以及經濟發展的情況而變化。國家機器內部未必那麼的一致，它可能內在地在制度上互相矛盾。正因為國家機器是在歷史變遷中所形塑的組織與制度的集合體，因此其組織制度之間可能互相衝突，行政效率可能高低不一 (Skocpol, 1979, 1985)。而在現代民主政治體制裡，由於組織結構的複雜程度愈來愈高，加上代議制度的形成，因此國家機器內部的一致性相對減低而行政部門的潛在自主性則相對增加 (Domhoff, 1990: 9)。

不過國家機器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與資本家之間具有內在的結構性關係。歐非與榮格 (Offe & Ronge) (1975) 指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需要稅收來支付國家機器的費用，以及需要經濟的景氣使得人民能夠就業來維持其正當性。但經濟的景氣需要優良的投資環境和社會政治秩序，因此假如沒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則資本家不投資，則統治精英將面臨統治的危機。換言之，正如布洛克 (Block) (1977) 認為的，資本家可以用投資罷工 (investment strike) 來威脅國家官僚或作要求。資本家考慮的是利潤，而利潤需要優良的投資環境和穩

定的社會秩序，至於政權的形式民主與否並不重要。相對的，國家官僚考慮的則是統治有效性和穩定性，而這需要資本的支持，因此國家官僚需要創造條件使得資本家能投資。雖然國家官僚與資本家之間有分工，但二者的利益却是一致的——維持穩定的社會生產秩序。

因此，資產階級與國家機器之間有結構性的優勢地位。它一方面是權力集團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也可以投資罷工的方式壓迫國家機器。而相對的，社會大眾並不容易影響國家機器的運作，除非透過社會政治運動。然而正因為國家機器內部權力集團利益的不同，以及國家機器內部各種制度之間的不一致，因此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運作內，仍然有機會，但不是結構性的機會，來影響國家機器權力運作的方式。

1.2 資產階級的角色²

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論述裡認為，現代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古典馬克思主義認為，是由於“征戰的資產階級”(conquering bourgeoisie) 改造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古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由於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封建地主的利益對立，而封建的政治制度不利市場經濟的運作，因此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是由於資產階級透過鬥爭所建立的一種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因此，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最佳的外殼”，它透過一人一票的制度來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 (Lenin, 1971)。

然而這種對資產階級在民主化裡的角色看法受到嚴重的挑戰。穆爾 (Moore) (1966) 在60年代的比較歷史地著作中已經很清楚的說明，不同社會由於不同的歷史條件，使得資產階級在各社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一般而言，社會有三種方式進入現代世界，一種是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地主而建立了與其利益相符合的形式民主政治；另一

2. 資產階級在這裡主要指涉大財團。資產階級在西方的興起是城市的中產階級和商人。而在今天主要則指涉擁有大公司和財團相當多股權或資本的家族。

種是資產階級與國家官僚聯盟，透過由上而下的法西斯政權進入現代社會。最後則是下層的農民與工人，結合共產黨透過由下而上的社會革命，建立共產政權以進入現代世界。因此，認為，資本主義與其他政權形式是完全相容的，資產階級未必會為民主政治而奮鬥。

特波恩 (Therborn) (1977) 在一篇歷史比較研究中亦指出的，在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資產階級一開始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的。資產階級曾經與封建地主爭取政治權利，然而在建立了與地主共治的寡頭統治後，他們很少再進一步希望將既有的權利擴張給下層人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下層人民享有參政權是透過勞工運動爭取而來的 (亦參見 Rueschemeyer et al., 1992:46; Marshall, 1966:65-122)。而一些學者對第三世界的政治社會發展的研究裡也發現，由於大部分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並不強大，因此對政治運作的影響力並不大。它們一方面是靠國家機器來扶植，另一方面也與國家機器聯盟共同擴張其利益。而在這種情況下，私人資本並未有動機要求民主政治，它們所希望的是國家機器能夠壓制社會政治運動，維持生產秩序，以強化其資本的積累 (Dupul & Thuchil, 1979; Evans, 1977, 1982; Perez Saint, 1980)。

雖然資產階級不會主動將權利下放給下層人民大眾，但是資產階級之間的分裂與鬥爭却提供了人民大眾在政治社會動員上的機會。換言之，資產階級並不是鐵板一塊的階級，它分成不同的部門 (segments)，例如工業，商業，金融，與土地資本。而它們的利益亦可能在國際或國內，因此它們之間可能因為利益的不同而互相鬥爭 (Zeitlin, 1976, 1984)。而有些較開明的資產階級³，亦可能在人民動員之後認為，假如不開放政治權利給下層人民將導致社會的不穩定，而堅持社會政治改革。這使得他們與其他部門的資產階級有所衝突。一旦這

3. 開明的資產階級在不同的作者中有不同的名詞。多姆霍夫 (Domhoff) 曾經稱之為“企業界的自由派” (business liberals, corporate liberals)，而米爾斯 (C. W. Mills) 稱之為“細緻的保守派” (sophisticated conservatives) (參見 Domhoff, 1990:32-40)。

個衝突發生，將使得下層大眾的動員在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內有聯盟的對象，而較可能導致改革。換言之，正如特波恩指出的，統治階級之間的分裂亦是民主政治的發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即使開明的資產階級可能在政治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除非有下層大眾的動員，否則資產階級不會主動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推動力來自下層大眾。

1.3 下層大眾的組織動員能力

不論是特波恩或史瓦斯基在討論政治轉型時都認為，威權政治的改變必須有大眾的動員，而這個動員才能使得原來封閉的政治體制逐漸開放。不過即使下層階級的動員能力使得國家機器反應了其需求，但是這個政治轉型未必由下層階級主導。特波恩（1977）在研究了世界上多數的民主國家之後指出，勞工運動雖然是民主政治實現的必要條件，但是勞工運動對民主政治的影響從來就不是主導性的。他指出了幾個歷史事實。第一，工人階級從來沒有在鬥爭中，直接的就得到公民權的果實。這些果實都是在戰鬥之後才得到的。即，統治階級一開始是拒絕改變，經過了一段期間之後才開始改革。第二，勞工階級也很少能夠靠自己的力量而達到改革的目的。勞工階級要達到目的，必須有其他的力量，例如戰爭，統治階級的分裂，或與其他階級的聯盟，才可能達到。第三，雖然勞工階級不斷的在抗爭，與其他階級聯盟要求民主，但是改革的發生，其主動權却是在統治階級手裡，即“時間和形式的重要問題——甚麼時候及以何方式”從來不是由鬥爭的階級提出（Therborn, 1977:34）。

換言之，威權體制的自由化，大眾的動員是必要的條件。正如史瓦斯基指出的，它使得威權體制內的開明派得以利用這個機會而改變威權政體內的權力關係，而瓦解鎮壓機器（1991：57）。因此威權體制的自由化，下層大眾扮演著必要條件的角色。不過，想要使得政治民主化，則需要不同的面向，包括建立新的憲法和遊戲規則等。而這並

非本文的重點，因此不在此詳細討論⁴。

依照以上的說法，資產階級與民主政治的出現沒有直接的關係，則這又如何解釋既有的民主政治體制都出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沒有任何的民主政治體制出現在前或非資本主義社會的事實？在這點上，特波恩 (1977) 和盧施梅爾 (Rueschemeyer, et al.) (1990) 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即資本主義為下層人民提供了動員的資源，包括從封建關係中解放而形成自由結社，現代工廠制度使得工人得以集結，而使得他們較有能力與統治階級抗爭等。換言之，並不是資產階級自動的將權利下放給下層人民，而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下層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動員能力和空間，而與其他階級聯盟並與統治階級鬥爭⁵。

因此，正如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解放的力量。它使得下層人民具有較大的可能性與統治階級鬥爭。然而，歷史發展也指出除非下層大眾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否則不易推動民主政治體制的發展。通常具有較大資源的資產階級只關心物質利益的擴張而未必關心民主化的發展。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威權政治的轉型必須看成是不同群體和階級權力鬥爭和衝突的結果。而在這個轉型的過程裡，既有的聯盟關係可能重組和改變。

以上本文指出了國家機器，資產階級，和下層民眾的動員三個因素對政治轉型在自由化面向上的影響。即，雖然國家機器和資產階級

4. 民主政治的特色是沒有一個政黨或個人能夠控制政治過程的結果，而競爭的各方又能夠服膺競爭的結果。因此，這裡牽涉到的不只是威權體制的瓦解，還更進一步關係到如何建立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憲政體制，而將衝突制度化。而在這個面向上，如何建立各方都接受的制度是一個牽涉到利益鬥爭，是否心甘情願的接受競爭制度的困難問題。

5. 關於這點自由主義者李普塞 (Lipset) (1965:27-64) 亦曾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階級結構發生改變，從原來金字塔型的轉變為橢圓型。而社會財富的增加亦使得自由結社現象大量成長，這個現象亦有利反對力量的滋長。雖然李普塞主要的論點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利中產階級的興起，而緩和了階級的激進主義，使得經濟成長與民主之間呈現正相關。不過在資本主義提供較多資源給下層人民動員的資源的面向上，李普塞的論點適足以支持本文的論點。

都可能在特定的歷史時刻有利朝向民主政治轉型，但是在結構上除非有下層民眾的動員，否則這個轉型是不會自動形成的。而透過以上歷史結構的研究取向，以下本文將指出，臺灣政商關係的改變與政治轉型是一致的過程。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轉型雖然是由於 1980 年代的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促成的（王振寰，1989），但是轉型的主導權仍在國民黨的控制下。而 1987 到 1990 年間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的風潮，使得資本家不滿政治轉型造成的社會政治秩序失調，而要求國民黨政府政治建立秩序。國民黨在面對資本家的投資罷工及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的雙重挑戰下，決定了與資本家聯盟，而產生了新的政商關係型態。在這個新的結盟裡，資本家得到更大的發言空間及與國家機器合作的機會。然而這只是政商之間交換關係的強化，與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霸權”無關。

2. 威權體制下的臺灣政商關係

1949 年底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內戰失敗，撤退來台，開始其在臺灣的統治。而自 1949 年開始到 1987 年解除戒嚴為止，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統治基本上是一種威權統治的型態。即，一黨獨大而不允許其他政黨成立，以國家安全的理由進行對基本人權的壓制，政府體制的設立與運作不受社會監督等。在這樣的威權體制下，國民黨政府仍然維繫著代表全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堅持部分國會的代表不必改選的中央級機構等。雖然很多知識份子（例如，1950 年代自由中國雜誌和 70 年代的大學雜誌的作者）和臺灣地方性的反對人物曾經在不同的場合批評過這些現象，然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威權統治一直到 1980 年代才受到強烈的組織性對抗。

國民黨政府之所以具有如此的統治能力，一方面與美國在冷戰時期極力扶持國民黨政府（參考王振寰，1989：80-90），另一方面則與它積極的扶持私人資本發展經濟及與臺灣地方派系合作有密切的關係。一般而言，國民黨政府一方面積極與私人資本合作，強化他們的利益，

另一方面也由此與他們交換政治上的忠誠。但是這種交換關係在解嚴前並不是對等的，因為臺灣的資產階級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強迫國家機器作任何的妥協。

自 1949 年來台之後一直到政治解嚴的 1987 年為止，國民黨政府與私人資本之間呈現了三種不同類型的關係。第一，國家機器以其政策及資源極力扶持私人資本。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國民黨政府一直具有主導的權力，因此它一方面引導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扶植私人資本進行資本積累。第二種類型的關係是侍從主義 (clientalism)，由於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對政治和經濟具有全面壟斷的地位，因此有能力將經濟利益分配給對它忠誠的跟隨者。這包括了外省資本和台籍資本，以及地方派系的地方資本。第三種國家機器與資本的關係是國家統合主義 (state corporatism) 的政治機制，透過主動設立工商業總會等的利益代理組織，而控制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機構。

2.1 國家機器對私人資本的扶植

現今討論臺灣，甚至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文獻，都認為國家機器在其社會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著主導的角色 (Amsden, 1979, 1985; Gold, 1981, 1986; Deyo, 1987; 蕭全政, 1989; 朱雲漢, 1989; 王振寰, 1988)。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上扮演主導的角色有其歷史背景。首先，國民黨政府具有強大的物質基礎，而遠遠的超越社會階級的影響力。在日據時代，資本主要在日資手裡，臺灣人的資本並未真正形成。而且在日據時代末期，日本殖民政府將臺灣私人企業納入日人資本手裡。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將這些資產接收而形成了公營資本。因此相對於當時的臺灣社會，國家機器具有強大的物質基礎，社會中並沒有具有實力的社會階級足以影響其決策。

其次，與拉丁美洲國家不同，外資進入當地社會是在經濟生產部門，但是開始進入臺灣的外資是以美援的方式，直接援助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強化其統治能力，另一方面透過國民黨政府來分配經濟援助。因

此，美援亦強化了國民黨政府對社會的自主性 (Evans, 1987)。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國民黨政府在 1950 年代開始進行進口取代工業化政策。在這個時期，由日人接收來的大批獨佔生產事業轉變的公營事業，成爲生產的主要部門。這包括了金融、石油、交通運輸、礦業、農林業、郵電、煙酒公賣局等重要產業。這些產業，加上少數跟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灣的公營企業，如中國石油，招商局等，成爲當時經濟活動的主力。這樣的發展，正如陳師孟等人指出的，“使整個經濟體系充滿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色彩，而且也建構了現在公營事業體系的骨幹” (1991: 29)。

這個時期，國民黨政府除了發展公營事業外，也以政府的力量扶植私人資本的興起。這個時期主要扶植的資本主要是紡織、食品加工、水泥、塑膠工業等。而由於當時政府對經濟生產的管制巨細靡遺，從物價管制、原料進口配額、到外匯率管制等，因此國民黨政府可以利用這些管制作政治性的分配，而嘉惠那些對它忠誠的企業，或給予那些它想要聯合的對象 (朱雲漢, 1989: 146)。在這個時期崛起的有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紡織資本，如上海幫與山東幫、以及臺灣籍的台南幫、臺灣水泥的辜振甫、和台塑王永慶等。這些進口取代時期崛起的企業，後來在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裡，大部分都擴大成爲集團企業，成爲壟斷國內經濟市場的主要勢力 (Gold, 1988:188)。

1960 年，國民黨政府公布十九點財經措施與獎勵投資條例，開始了出口導向工業化的階段。這個政策的直接結果就是將臺灣開放給國際市場，而將臺灣經濟與世界市場緊密的結合起來。相對於前個時期，國民黨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已較爲放鬆，然而絕對不是自由放任，而是以各種財政、貨幣、貿易政策、創設加工出口區、改善交通設施等來引導與促成經濟發展。正如蕭全政指出的，這個時期的政策“事實上隱含政府與企業間緊密的結合…而強調以出口順差帶動經濟發展並累積金銀 (即外匯) 的重商主義色調” (1989: 74-5)。

由於出口導向工業化，臺灣興起了大量與世界市場有密切關係的

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在臺灣工業結構中佔了相當重要的份量，形成爲臺灣創造大量外匯的基礎（周添城，1989）。當然這個時期也有一些企業，利用原來日據時代與日人的關係，而成爲後來大企業集團，例如臺灣松下電子。一般而言，臺灣資本的發展到了 1970 年代初期，已經出現了企業集團。根據統計，前一百大企業的生產總值在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大約都佔全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NP）的 30% 左右（中華徵信所）。而這些巨型的企業集團除了少數的例子外，其產品幾乎都是以國內市場爲主，而中小企業的產品則大部分是以國外市場爲主（周添城，1989）。

雖然從 1950 年代的進口取代時期開始，到 1960 年代以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私人資本的比例愈來愈大，而公營企業所佔的比例相對減少，例如在 1952 年，私人資本在製造業的產值佔該產業的 43.8% 而公營爲 56.2%；可是到了 1960 年則相反，私營爲 56.2% 而公營則變成爲 43.8%。此後，公營企業的比例節節下降，到了 1980 年代則只有 19% 左右。然而雖然公營企業的產值比例是在下降，但是它的重要性却未有絲毫的減少。在 1982 年的生產統計裡，所有 304 種重要工業產品中，有 36 種產品係由獨佔的公營事業所壟斷生產，而公營事業在其他至少 7 種重要工業產品的價格上具有壟斷性的地位（林忠正，1989：167）。由於國民黨政府幾乎控制了所有工業的上游，以及工商業上游的金融業，因此這些龐大的事業對整個經濟有相當的管制能力。而國民黨政府也以“節制私人資本”爲理由，抑制私人進入這些上游的壟斷性企業。由於這些企業的壟斷性和控制性的地位，使得國民黨政府可以透過這些壟斷性的產業，以及其龐大的黨營事業系統而有它自己的資源（陳師孟等，1991），並且透過這些壟斷事業來控制臺灣的工商業界。因此，正如高棣民說的，這些壟斷性的企業“使得國民黨政府得以鞏固它在這個島上的權力”（1981：267）。

2.2 侍從主義的政商關係

侍從主義是指一種特殊的關係，這種關係並不及於一般人身上，而只及於與國家機器有密切關係的人。基本上，它是特殊利益與政治支持之間的交換，而與國家機器的分配和控制資源的角色有關 (Jessop, 1990:163)。因此，這種關係並不是國家機器與資本一般 (capitalin general) 而是與特定資本之間的關係。正如上述，由於國民黨政府幾乎全面控制來臺初期的所有資源，因此使得它得以利用這些資源做為酬備對其忠誠的部屬，或賦與本地精英這些壟斷的利益來交換其政治上忠誠的工具。

在進口取代工業化初期，國民黨政府以各種政策扶植跟隨它來台的外省資本與對其忠誠的台籍資本，特別是紡織工業。而為了安置退休的高級官員和將領，以及退役榮民，創造了龐大的黨營事業體系。到了 1970 年代以後，國民黨資本更進入高度寡佔的策略性工業，如石化工業中游、資訊、金融投資等事業。而這些投資，國民黨政府通常融合公營資本、黨營資本、以及與其關係密切的私人資本共同合作。在這種搭配下，這些事業既可免於公營事業的監督，又可以享受各種優惠，同時又有力的結合了本土的資產階級。

侍從主義的關係也表現在國民黨政府與地方派系之間，而使得地方派系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財團。由於國民黨為了獲得臺灣地方精英在選舉時的支持，而以地方性的經濟寡佔來籠絡地方派系 (Wu, 1987; 林佳龍, 1989)。國民黨主要是以經濟特權來籠絡地方派系，即，政府特許地方派系擁有地區性的獨佔事業，如信用合作社，農漁會的信用部門，及汽車客運業等。根據一項調查，臺灣省各縣市 89 個派系中，有 81 個派系至少參與地區性寡佔事業一種以上 (陳明通, 1989)。另外，地方派系在擁有政治勢力之後，例如民意代表之後，亦可以透過政治力量獲得省營行庫的特權貸款，省及地方政府公共部門的採購，公共工程的包攬等 (朱雲漢, 1989: 151)。在經過了臺灣 40 年的經濟發展，地方派系已經成為地方財團 (參見陳明通, 1989)，各自擁有自己的企業王國，以政治的勢力輔助企業的發展，然後再以

企業的財力為後盾培養更大的政治勢力。

這樣的侍從主義的政商關係，有基本的模式。即，如朱雲漢說的，“將全國性的寡佔經濟分配給黨營及榮民事業系統，區域性寡佔經濟分配給地方派系，至於用來酬備少數親貴或本省籍世家，則無一定的原則可循”（1989：149）。在這種侍從主義的關係下，國民黨與這些資本之間一直擁有良好的，但却是由上而下的政商關係。

2.3 國家統合主義

統合主義是指一種利益代理的模式，由此國家機器透過功能性的利益代理組織與社會中的主要團體發生政治性的關係。國家統合主義的利益代理模式，通常出現在威權主義政體。國家機器主動的設立各種非競爭性的，少數的和壟斷性的利益代理組織，並賦與它們正式的利益代理權，而由此與之交換領袖的選擇權和政治的支持（Schmitter, 1974: 93-4）。在臺灣，國民黨則主要透過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及工商協進會與資本家之間發生統合性的政治關係。

就像對其他組織體系的控制方式一樣，國民黨對於工商總會的政控制，也分成中央，省，地方，以及各大產業機構分層主管。在全國性的組織上，是由中央的社會工作會主管。在省及市的工商商業總會，則由省黨部掌管。而在縣市的公會，則由地方黨部負責。另外，國民黨的特種黨部——生產事業黨部，則掌管大的公營事業黨部及部分大的私人企業內的黨部。在這些人民團體內，絕大部分設有國民黨的黨團，而由黨籍的理事長擔任書記或常務理事。雖然我們不能確定到底國民黨的各黨團是否能有力的執行中央的政策，但是由全國工業商業總會理事長從 1950 年代以來都是國民黨黨員，且工業總會理事長，從林挺生、辜振甫、和許勝發相繼成為國民黨的中常委的事實來看，國民黨對於本地資本的攏絡是非常明顯的。而當然這些重要的資本代理人，亦可以透過參與權力核心而強化本身的利益，或為資本一般說話。

除了全國性的工業商業總會外，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亦是一個將

資本與國家機器密切結合的團體。這個協會成立於 1950 年代，主要任務便是將本省籍企業和外省業者整合起來共同支持國民黨政府。長久以來工商協進會每月定期邀請大企業經營者的理監事，與政財經重要官員共進早餐，溝通看法和作法（徐瑞希，1991）。另一方面，工商協進會亦扮演民間經濟外交的功能，特別是在國民黨政府在 1970 年退出聯合國官方外交遇到困境的情況下，這種企業外交就顯得特別重要。外交部甚至以經費補助其外交業務的推動。

總之，從 195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由於擁有極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因此它可以利用這些資源作為強化其統治的政治工具。一方面，它擁有龐大的資本而扮演資本家的角色，另一方面它也以其方式推展資本主義結合本地資本。在這樣的發展方式下，國民黨與資本的關係是“家父長式的”（張家銘，1991）。即，國家機器像父親一般有無上的崇高地位，也以各種方式“保護”和希望其私人資本的子女有成就和擴大利益。然而在這樣的權威下，本地資本的地位就像子女一般，它可以透過與國家機器的聯結，或卡多索（Cardoso）（1979：44）所說的“官僚組織的環節”（bureaucratic rings），來要求利益，然而它也與子女一樣，很難挑戰父親的權力權威。這個關係如伊凡斯（Evans）描述的，“資產階級可以透過與官員的關係而擴大其特殊利益，但是這並不表示全階級性的要求可以由此來明說（articulate），或迫使國家機器採行”（1982：217-8）。不過，這樣的權威結構在解嚴之後面臨轉型。

3. “迷惑的”政治轉型與社會運動

1987 年 7 月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令，使得臺灣政治結構開始自由化。而原來對社會嚴厲控制的威權結構也逐漸鬆動。這個鬆動包括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地位，逐漸恢復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人權，逐漸區分黨與國的不同而使國民黨逐漸不再全面宰制國家機器的運作，以及代表中國的民意代表逐漸退出中央民意機關等。由於政治控制的鬆

動，原來已經動員的社會運動和反對運動，在解嚴之後更大量的動員。正如以下所要討論的，國民黨政府從 1987 年到 1990 年這段期間，基本上可以稱之為“迷惑的國家”⁶它並沒有清楚的對待社會運動和反對運動的政策和方式。而普遍動員的社會運動使得資本家開始抱怨投資環境的惡化，並以投資罷工的方式威脅國民黨政府。

造成國民黨政府在 1987 年逐漸自由化的原因，基本上有三個：反對運動的動員，社會運動的大量興起，與國家機器本身的危機（王振寰，1989）。政治反對運動的興起開始於 1970 年代中期，而大量動員則是在 1983 年之後。雖然國民黨政府曾經在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中，逮捕了當時反對運動的主要人物，但是反對運動在 1980 年代之後並沒有消逝，反而因此造成選舉上更大的勝利和吸引更多人士的加入。這對國民黨而言是一個壓力。另一方面過去在臺灣從未出現的社會運動在 1980 年代逐漸動員，而其抗爭的對象經常是國家機器；最後，國民黨政府在 80 年代曾經在政策上致力的吸引資本家投資，在政治上致力於公權力的整頓，但是都無法成效。有些學者因此稱這現象為“公權力的危機”。這些現象正如歐當納和施密特（1986）指出的，是市民社會的甦醒（resurgence of civil society），以及國家機器統治的危機。

雖然以上這三個因素共同造成了國民黨政府在 1987 年的政治轉型，然而假如我們將之與 1970 年代國民黨進行的政治“本土化”改革作一比較，就可發現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動員是造成國民黨進行政治自由化的主要因素（詳見王振寰，1989）。因為在 1970 年的改革，國民黨政府主要的危機來自國際政治而非社會動員，即美國不再支持國民黨政府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代表中國，而使得國民黨政府必須透過政治的改革，強化社會對它的支持。因此國民黨的改革針對社會精英，而非社會大眾，其政治體制的改變因而祇是吸納更多的臺籍精英進入體制，而未大幅度的進行政治體制的改變。相對於此，國民黨在 1980

6.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吳乃德先生首先在報紙專欄中提到這個名詞，不敢略美於前。

年代面對的危機是來自社會政治運動，因此其改革必須面對政治社會運動的要求，而這使得國民黨不再享有 1970 年代政治本土化時的完全的主動權。

到底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成員來自那裡？根據現有對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成員的調查顯示，反對運動的支持者當中，佔最大多數的是工人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即自營作業者），與知識份子（參見林佳龍，1989；張茂桂，1989；王振寰，1991）。而這三者間有隱約的分工，即“知識份子為反對運動的領導者與提供策略者，都市小資產階級為其資源的貢獻者，至於工人階級則為主要的選民”（王振寰，1989：96）。而在社會運動部分，現有的研究亦指出大部分 80 年代出現的運動為弱勢團體的運動（參考張茂桂，1989）。但是不論是反對運動的支持者或是社會運動的主要成員，所有的研究都指出，這些運動的基本成員是來自中下階級的臺灣人。換言之，從 70 年代以來的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基本上是具有“民族——群眾運動”（national-populist movement）的特色。換言之，國民黨在 1980 年代的自由化，臺灣人中下層的大眾之社會動員扮演著推動者的角色。而在這些動員裡面，我們並未發現有臺灣的大資本家對政治有過公開的意見。臺灣的大資本家在 80 年代初期舉辦的“經濟改革會議”中曾經要求過經濟政策和制度的改革，不過他們對經濟制度的不滿並沒有轉化為對政治改革的要求。在國家機器本身的危機，社會和反對運動動員壓迫改革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於 1987 年中開始進行政治體制的轉型。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任何的轉型所牽涉到的乃是政治利益的鬥爭，而這個鬥爭使得政治轉型初期呈現了不穩定和“迷惑的”狀態。

3.1 迷惑的國民黨政府

國民黨政府的改革，在蔣經國生前的 1986 年 3 月之十三中全會之後，已經出現了大致的改革綱要。1986 年 6 月，國民黨正式提出六點改革的建議，而這些建議成為其政治改革的綱領。這六點包括：一，

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關；二，地方自治法治化；三，制定國家安全法；四，民間團體組織許可制度；五，強化社會治安；及，六，黨務革新等問題。這些綱領實際上包括了解除戒嚴，允許反對黨的成立，國會全面改選等問題。而這些改革涉及原來整個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的重新定位，改變國家機器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等。然而，這些改革的步調，國民黨是要在自己控制的方式和預定的時間表下進行。因此，它企圖透過制定國安法，人團法，集會遊行法等而使得政治的自由化，仍然能在對它最有利的情況下進行。

但是國民黨的設計並未能立即的如願以償。政治反對運動在當年的9月28日搶先成立了民進黨，而使得國民黨不得不承認其存在。而在1988年初，蔣經國總統逝世，從此國民黨失去可以統合所有派系力量的強人來執行其計劃。因此，由此時開始一直到1990年的5月新任總統李登輝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為止，國民黨的重建計劃面臨了各種不同的衝擊。一方面黨內各勢力企圖在這個過程中取得黨內主導權。但更重要的是，整個國民黨政府也面臨前所未有的來自民間社會的挑戰。

國民黨的迷惑來自黨內的對立力量——改革派和拒絕改變的保守派——對政治運作主導權的鬥爭。由於國民黨對政治權力的長期壟斷以及“大中國”的意識型態，加上長期的戒嚴體制，它乃能透過政治的運作，而“合法化”(legalize)了從不改選和代表全中國的國會，以及由此衍生的很多中央或軍事機構，例如救國團和國家安全局等。這些機構和人員在戒嚴時期享有的權力，在解嚴之後逐漸成為政治改革所要改變的對象。例如，社會政治運動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軍隊必須國家化，以及國民黨成為政黨之一而非黨國不分等。然而正因為這些機構和工作人員的利益緊密的與戒嚴體制相關聯，因此這些人構成了反對改革的保守力量的基礎。不過由於他們仍然享有政治和軍事的力量，因此在政治轉型中，他們對政治的轉變仍然具有絕對的影響力。他們可以使得政治轉型倒轉。

而國民黨的改革派基本上認為老舊的戒嚴體制必須修正，但是改革却必須在嚴格控制下以及不違反國民黨本身太大利益下的方式進行。這些人大部分來自民間選舉或與臺灣社會關係密切的黨工，因此他們較能體察臺灣社會的變動。這些人在政治改革上，與政治反對運動有一些類似之處。只不過他們的利益與國民黨是一致的，因此他們不會同意政治反對運動的那種打擊國民黨的作法。這個力量在中央政府集結在李登輝總統的陣營，而在立法院則在集思會。由於李登輝和集思會成員大部分為臺灣人，其改革因此被抗拒改革的保守的大中國主義者視為“獨台”的作法。

在蔣經國逝世之後的政治轉型過程裡，國民黨以李登輝為首的改革派一直具有主導的力量，然而這個力量也經常的與既有的保守勢力妥協，因此其改革十分的緩慢。例如，國民黨承認了既有國會體制的不合理，然而為了安撫保守勢力，除了以勸退和各種優惠的方式對待老代表之外，更保證以比例代表的方式保存代表中國的外省人勢力於新的國會中，因此國會改革一直到 1991 年底國會問題才得以解決。國民黨的改革派一方面必須與黨內保守派妥協，另一方面亦必須面對來自社會和反對運動對民主改革的要求。然而，正因為其黨內的鬥爭，使得改革顯得十分的遲緩或不一致，而無法滿足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的要求。

3.2 社會政治運動的動員

正如很多政治社會學家指出的，雖然舊政權中的改革派企圖透過攏絡一些它認為可以整合的勢力進入體制，以維持政治體制的穩定，然而當威權政體一開始開放，則新的社會運動和獨立的團體將如雨後春筍一般的相繼成立。而由於既有的政治社會制度對這些新團體的要求無法處理，因此其要求只能在街頭出現和解決，於是乃形成大眾抗爭 (mass struggle) 的局面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Przeworski, 1986; 1991)。這正是臺灣解嚴之後的社會政治面貌。

從 1970 年代中期以來，政治反對運動就要求政治改革，開放不同政黨的成立，國會全面改選，以及歸還憲法賦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等。雖然政治反對運動在 1986 年成立了民進黨，而正式的進入了既有的政治體制，然而國民黨緩慢和不一致的政治改革，並不能滿足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對民主政治的期望和需求。因此這些權利並未跟隨著政治的解嚴而立即得到。而由於解嚴之後，政治控制的瓦解以及人民不再那麼害怕國家機器的權威，使得反對運動內的各種新的勢力，包括激進台獨的勢力，也在反對運動內出現，並成為社會運動的主導勢力之一。這使得民進黨以及新興社會運動團體不斷的以街頭的抗爭形式，壓迫國民黨加速改革的步調。

另一方面，社會運動也在解嚴之後成為“風潮”（張茂桂，1990）。社會運動的出現，與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只注重發展而以戒嚴體制壓制人民的要求，忽視人民的基本權益，有很大的關係。街頭遊行抗議事件在解嚴前就已經逐漸出現，不過在解嚴之後，由於政治壓制的消除，使得社會運動的街頭抗議成為臺灣政治轉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據一項統計，從 1983 到 1988 年，街頭抗議活動的次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從 173, 204, 274, 337, 734, 到 1172 次（吳介民，1990：45）。根據蕭新煌（1989）的分類，這些社會運動大致可以分成四類：一是導因於不滿政府無力處理新興的社會問題，如消費者運動；二是對政府特定政策的抗議，例如反核，原住民運動等；三是有意對長期以來國家（黨國體制）對社會控制的挑戰，例如學生運動，勞工運動等；以及最後，有意對某些政治禁忌的突破的動員，例如臺灣人返鄉運動。這些運動和動員有一個特色是：它們抗議的對象主要是針對國家機器，要求政策改變或要求平反其權益。在此情況下，社會運動與政治反對運動在壓迫國民黨政治改革的作用上是相同的。

由於國民黨改革的緩慢和步調的不一致，使得民進黨能夠充分利用國民黨的這個弱點和威權統治的先天弱點，而能在解嚴之後的初期，在選舉上得到逐漸增加的選票。例如，在 1989 年的縣市長及立法

委員選舉上，民進黨得到空前的勝利。它拿到了 7 個縣市長的席次，以及 21 席的立法委員。其中還包括多位台獨色彩明顯的“新國家聯線”的候選人。民進黨在這次選舉的總得票率達到 29.7%。相對的國民黨只有 58.3%。這個選舉結果給國民黨很大的壓力，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發表聲明指出“願意負起所有責任，執政黨決徹底檢討改進”。而選舉後國民黨第一次中常會的 12 月 6 日，國民黨決定成立黨務革新推動小組，李登輝並表示“選舉挫敗這一個由全體選民所做的決定，不能委諸意外，也絕不是偶然”。

雖然國民黨在選舉上失利，而社會政治運動又大量的動員，然而國民黨在整個政治運作上，仍然具有主導性。這可由國民黨雖然不斷的受到社會的挑戰，但是它仍然可以控制過半數的選票，以及它仍然主控國會的運作之事實可以看得出來。另一方面，社會政治運動雖然大量的動員，但是它們並沒有威脅到國民黨對政權的主導能力。而這同樣可以由幾個事實得到應証：民進黨作為最大的反對力量的集結，仍然參與到政治體制之內，透過選舉來與國民黨競爭，而民進黨內曾經反對選舉的派系——新潮流系——也進入選舉體制之內。而社會運動中，並沒有任何革命性的團體存在，更不用說得到支持。在此情況下，雖然社會政治運動是大量的動員，但是相對於國民黨而言，他們並不具有強大的威脅能力。

總之，雖然國民黨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並沒有失去對社會的統治權力，然而整體而言，國民黨在面對民間社會的民主要求時是缺乏整體的計劃和作法。國民黨的改革派雖然主導黨政的運作，但是它一方面必須與保守勢力妥協，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社會政治運動，這使得整個政治轉型初期顯得改革緩慢而且不確定。這種不確定，一方面可能與國民黨改革派無法全面主導改革，另一方面亦可能是由於國民黨在自由化初期並沒有清楚的聯合對象有關，因此它仍繼承著戒嚴時期“全民政黨”的意識型態，而企圖吸引所有階級的支持。但是在戒嚴時期，“全民”的沒有爭取權利，看起來像完全服從國民黨的統治，是

一種“不得不服從的共識”，或歐當納（1979：296）所說的“隱而不顯的共識”（tacit consensus），即去政治化，冷漠，或退入完全私人領域而不管任何公共事物的態度。而在解嚴之後這種“全民的共識”已經失去外在的壓力而全部瓦解。但是國民黨在解嚴初期並沒有這種認識，結果是它想要成為全民皆支持的政黨和以它控制的國家機器來取悅所有人，而結果是所有人皆不滿國民黨。

然而，這種“迷惑的國家”在1990年新就任的李登輝總統提名軍事強人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之後，就逐漸的穩定下來，國民黨自此也清楚的與資本家結盟。從此之後，它對民進黨和社會運動的態度也由容忍而轉變為強硬。這樣的發展與國民黨的新計劃，及資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密切的關係。

3.3 資本家的不滿

長期以來，臺灣的國家機器透過戒嚴體制，扮演著維持良好投資環境的角色。而80年代以來社會政治運動的動員，以及國民黨內部的轉型，使得它作為經濟秩序的守衛者的角色受到挑戰。特別是社會運動中的勞工運動與環保運動，直接的就衝擊著資本家。資本家的反應是，一方面開始產業外移或中止投資，另一方面則開始向國家機器抱怨。

在1989和1990年的許多調查報告顯示：多數企業家認為投資環境已經惡化，要轉投資到海外。大眾媒體亦不斷的警告，臺灣產業空洞化的現象已經出現。而事實上，多數的研究調查都指出，資本家對現有的投資環境十分不滿⁷。在此同時，台灣勞力密集產業開始大量外

7. 這類的調查報告很多。以下以“中國生產力中心”和天下雜誌的調查為例說明。“中國生產力中心”的調查報告指出：近72%的企業不滿意臺灣的投資環境；對當前整體投資環境最不滿意的前兩項，是社會治安（30.7%），與勞工問題（29.7%）。資本家並歸咎國家機器（《戰略生產力》雜誌，1990年4月）。而在《天下雜誌》的調查報告中也顯示：資本家普遍認為臺灣投資環境惡化（90.8%）。同時大部分受調查者認為國民黨應該為這樣的發展負責（49.5%），其次是全民（25.8%），再其次才是民進黨（8.9%）。而同樣的資本家認為當前最嚴重的問題不是經濟政策，而是社會治安這個非經濟因素（《天下雜誌》，1990年3月）。

移，或者停止對內投資，經濟景氣在 1988 年下半年開始出現停滯的現象，國內的投資率亦大幅衰退。

雖然很多外移的產業是由於臺灣的工資上揚，土地價格和各種生產成本上升，而不得不外移到東南亞或中國大陸，然而社會政治運動的確成為他們外移的藉口和理由。在 1989 年 1 月 4 日，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帶領許勝發、高清愿、陳由豪和施振榮等臺灣著名的八大資本家在“經濟日報”的一篇題為〈資本家之怒〉的文字中，將他們對臺灣投資環境惡化的不滿集中在環保，勞工運動，以及公權力的低落上⁸。他們並宣稱，在當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誰能為我們創造公平合理的生存發展環境，我們就在今年的選舉中全力支持他們”。同年二月，台灣企業的龍頭台塑公司的總經理王永在宣布暫停所有的國內投資並凍結人事，來抗議勞工運動和環保運動。次年，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同時也宣布不再興建六輕，而將投資於大陸福建海滄。

台塑的停止國內投資以及出走，在臺灣造成極大的震撼，然而他的作法却得到很多企業家的同情。在 1990 年 3 月《天下雜誌》的一個調查中，近 70% 的企業家認為王永慶赴大陸投資是情有可原。在同一時期，代表臺灣資本家的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辜振甫亦對政局發表了看法。在接受《財訊》雜誌的一個訪問中，辜振甫對於政局的混亂的看法是“工商界要停止呼吸了”，“大家都希望政局穩定”（《財訊》，1990，5）。

資本家的不滿加上不斷流出的資本，使得主導轉型的國民黨改革派面臨抉擇。即正如史瓦斯基指出的，自由化一旦開啓之後就不再如改革派所預期的那樣能以自己控制的方式進行。大量的社會動員使得改革派失去保守派的信任。而在此情況下，“自由化不是倒退，回到

8. 這些資本家在經濟日報作了一個座談，而這些文字是這個座談會的記錄。這些記錄指出了代表臺灣大資本對臺灣政治社會局勢的看法。例如，他們指出：

“目前臺灣已近乎到了無政府狀態，不但人民的生命財產不能獲得保障，企業界的生存也受到威脅……而政府也失去了功能，任憑社會混亂下去，面對這種情形，業者憂心忡忡。”

幽暗的勉強說是正常化的時期，或繼續到民主化” (Przeworski, 1991: 60)。換言之，國民黨改革派要在繼續開放而可能引起保守勢力的反撲及繼續讓資本家不滿，以滿足社會運動和反對黨的要求；或保持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以維持臺灣經濟的發展而又不會太違反保守勢力的利益中作一個抉擇。國民黨的改革派選擇了與保守勢力妥協，以壓制社會政治運動，討好資產階級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為始，然後以自己的方式繼續進行政治的自由化。即史瓦斯基所說的自由化的“倒退”。這個作法使得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轉型呈現不斷與保守勢力妥協的風貌，並開啓了臺灣新威權政治的時期。

4. 國民黨的新威權主義

1990年5月新任總統李登輝提名軍事強人郝柏村組織內閣，這個作法一方面化解了國民黨黨內派系的衝突，維持了改革派與保守勢力共治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同時回應了資本家的要求，以強勢的行政作為恢復政治社會秩序。因此在這個提名之後，各方反應強烈，認為李登輝的作法將臺灣政治的轉型往回拉。特別在反對黨和社會運動界，長期以來已經對軍人的角色十分懷疑，如今以軍事強人為行政院長顯然是民主化的倒退，於是“軍人干政”的抗議活動和聲音不斷出現。然而在這些抗議聲音裡，唯獨缺乏企業界的聲音。

郝柏村內閣上台之後，被稱之為“治安內閣”，它一方面恢復國民黨的重建計劃，而以強硬的態度執行和主導政治轉型；另一方面也以積極的作法聯合資產階級，為資本創造優良的投資環境。在此時，國民黨已經不再是“迷惑的國家”或企圖成為“全民的政黨”，它積極的與資產階級聯盟。郝柏村內閣的特色有：

第一，以強硬的手段對待社會運動，以重振公權力及創造新的社會秩序。因此國家機器對社會運動不再像以前那般容忍，這包括對溫和的無殼蝸牛運動。相同的，郝柏村於1990年的9月指示行政單位，以《檢肅流氓條例》加強對“社會運動流氓”的檢肅，以回應資本家

對社會治安惡化的不滿。

第二，以政治性的宣示或非正式的方式，表示國民黨政府對吸引資本家投資的決心。郝柏村上台之後明白表示五輕，六輕及核四廠一定要建，一些受到環保運動組織所阻止的大型公共工程，例如彰濱工業區，也相繼開工。而李登輝總統和郝柏村更是經常性的與資本家會餐和打高爾夫球，交換意見並作了“政府的責任是為資本家賺錢”的政治性宣示。

第三，科技官僚受到空前的重視，並由此將政治的問題以技術的方式解決，將政治問題去政治化和技術化。例如，郝柏村內閣指出，六輕與核四是否動工要以科學研究的原則作為批准的基礎。一般人不學科學，因此六輕和核四是專家的事情，要民眾相信專家。郝柏村內閣認為，反六輕和反核人士如此的反對其興建，是為反對而反對，是不理性的，是沒有科學基礎的。因此，政府的政策，“不能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了全民的利益。”

第四，郝柏村內閣宣布了“六年國家建設計劃”，企圖透過大約八兆新台幣的預算，整頓臺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礎建設，以及透過國家的力量，提昇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層次和動力。國民黨政府企圖透過這樣龐大的國家預算，一方面希望以大量公共投資的方式刺激經濟的復甦，另一方面亦希望透過這樣的投資，吸引外國資本，本地資本，與國民黨政府共同的合作，強化聯盟的關係。

至此，一個以“軍事強人——科技官僚——資產階級”聯盟的新威權體制於焉形成⁹，而其目標在深化經濟發展，強化既有的生產結構。郝柏村的執政得到資本家的喝采。李登輝和郝柏村在歷次的民意測驗中，都得到相當高的支持。這個聯盟形式看起來像歐當納（1979）所描述的拉丁美洲 1960 年代以來興起的軍事威權政體。不過，國民黨的

9. 徐正光先生曾經在報紙上提出相同的看法。只不過他認為郝柏村的上台類似拉丁美洲軍事威權政體。而本文進一步指出這個類似性是表面的，因為拉丁美洲的軍事威權政體是民主政體無法持續所造成的，而臺灣的新威權主義則是自由化遇到瓶頸所形成的。

這個新聯盟與拉丁美洲最大的不同是，它並不是一個急速倒退的民主政體，反而是從威權政體往自由化的過渡。祇是這個過渡在經過了大眾的大量動員之後，形成了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妥協，使得改革的步調緩慢下來，而以新保守聯盟的形式出現。它仍然進行改革，但改革的步調祇是作某些非原則性的讓步 (concession)，而威權政體的形式並沒有大幅度的改變。

這個新的政治型態，國家機器的結構與以前威權政體時期至少有以下不同：反對黨民進黨已經進入國家機器，不只在立法部門具有部分的影響力，而且在某些地方政府具有執政的地位；憲法賦與公民的基本人權愈來愈受到重視且在法律上予以保障等。因此在形式上，新的統治型態具有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外殼。而在實質內容上，國民黨以其控制的國會在政治自由化的過程中制定有利於它自己的決策和法令，例如選舉區域的劃分，民意代表選舉為一票而非兩票制；對於意識型態具有絕對影響力的電視媒體全面壟斷；以及強化黨營事業的推展，甚至國民黨自己就擁有自己的銀行等。

另一方面，雖然財團和地方派系在國民黨黨內的影響力逐漸的增加，但是國民黨的列寧式政黨運作模式並沒有瓦解。重大的決策仍然是由黨中央的中常會決定，有民意基礎的國會代表對重大議題並沒有決定的權力。而在遇到黨內民意代表有利益爭議時，最後的仲裁權力也是在黨中央的決定下完成。

因此，形式上國家機器和國民黨都較為開放，但是在實質上國民黨和國家機器並沒有內容上的改變。這類的作法使得政黨政治徒具外殼而無實質內涵。正如政治學家溫凱勒 (Winckler) (1989) 所說的，國民黨政府的轉型祇是從“硬性的威權主義”過渡到“軟性的威權主義”，即國民黨政府仍然緩慢的在進行著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而且它對整個政治的運作仍然擁有相當程度的主導和自主權，但是臺灣的政治體制至今為止，並不是西方意義下的政黨公平競爭的民主政治。

5. 新政商聯盟中的資產階級

雖然國民黨與資本家之間積極的聯盟，但是國民黨在這個聯盟的過程中一直是主動和主導的，臺灣的資本家的影響力仍然不足以左右國民黨。國民黨除了積極的扮演“資本家中的資本家”的資產階級之國家機器的角色外，這個聯盟其實具有更強烈的政治社會意涵。即，它一方面依靠資本的投資使得人民能夠就業，以維持其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依賴資產階級以使得它在逐漸開放的政治競爭上能立於不敗的地位。由此角度，國民黨與資產階級的關係不再是一個由上而下的父子關係，而是一個伙伴的關係。祇是這個伙伴關係是不平等的。國民黨具有主要的政治經濟資源，而資產階級祇是配角。因此，資本家與國民黨的關係，祇是從以前類似“兒子”的地位變成今日的“小伙伴”(junior partner)。這種權力不均衡的(asymmetric)的關係表現在下列的幾個關係上。

第一，國家官僚在整個經濟政策的決定上，並沒有因為財團的興起和龐大，而失去主導能力。國家官僚比以前更願意聽企業的聲音，(例如以正式的全國經濟會議，或非正式的交誼，例如餐會或打高爾夫球)，但是政策的決定權，大體上仍然在官方或國民黨的中央手裡。資產階級至今為止並沒有能力在立法部門自己形成法案，所有的法案制定和通過，都還在國民黨的黨中央的控制下。這個現象也許與國民黨政府擁有龐大的上游工商業有關，因為這些公營企業掌握了整個工商業的命脈。同時這可能也與臺灣的大資本長期依賴國家機器的保護，以及依賴國家從事新科技的發展和開發新的產品，而缺乏自己的開發能力和投資有關。

第二，在侍從關係上，轉型之後的國民黨與個別資本家的關係也許有改變，但與整個資產階級的關係並未改變，反而更密切。正如陳師孟等人指出的，臺灣地區有很多假民營企業，是由政府機關和國民黨控制的黨營企業。而自1988年7月以來，國民黨極力的將黨營事業

與民間財團結合。“這項作為的積極目的乃在收編民間鉅子的經濟力量，使原本的黨政大家族進一步擴充成‘黨、政、資本家’的結合體。”（陳師孟等，1991：72）。而民間企業當然不會放棄這種機會。這個作法一方面使得國民黨與大財團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另一方面也使得黨營事業不斷擴張，使得國民黨本身成爲一個大的財團。

第三，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也並未改變，反而更密切。這是因爲自解嚴之後，原來的反對運動已經成爲反對黨，可以在選舉中正式與國民黨競爭。而地方派系的社會網絡和經濟實力是國民黨必須依靠的社會基礎，因此要贏得選舉，就必須與地方派系合作。解嚴後的第一次立法委員和省議員選舉，國民黨所提名和核備的候選人名單中，就有超過半數（54.2%）的候選人，及超過六成的當選人是地方派系的人選（黃德福，1990：92-3）。這顯示國民黨仍然與地方派系關係密切。然而雖然國民黨依賴地方派系來贏得選舉，但是這並不表示它受到地方派系的操控。因爲解嚴後的選舉，國民黨雖然開始辦理黨內初選，但是初選的名單並不是最後的結果，黨內正式的提名名單仍然由黨中央決定。

最後，國家統合主義的政商關係在解嚴之後也並沒有瓦解。雖然在1990年全國商業總會的理事長選舉中，出現了不是黨中央社會工作會提名的人選，但是最後仍然得到順利的解決，而由社會工作會提名的人當選。進一步的，由於國內第二代企業家和青年企業家逐漸開始展露頭角，因此國民黨乃成立了“革踐院青年工商負責人研討會”，透過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等組織的推薦，前後共徵招了七期大約四百餘人上陽明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新新聞，127期）。

因此，雖然表面上臺灣資本家的角色與政治轉型前相比有所改變，而展現出新的政商關係型態，但是這個改變並沒有使得它與國家機器之間有本質的不同。它仍然依賴國家機器，仍然受到國家機器的約制，仍然是國家統合主義下的組織成員。國民黨在這些機制中並沒有失去主導性，但是資本不再是受控制的對象，而是合作和聯盟的對

象。在這個聯盟中，資本家是國民黨新威權主義聯盟中的小伙伴。而由於從高高在上的家父長轉變為聯盟的伙伴，因此國家機器原來具有的相對自主性逐漸消解，而愈來愈受社會的影響。

6. 假定沒有反對黨和社會運動…

到底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對新政商關係的出現以及對政治轉型有甚麼樣的影響？它到底有多重要？是否缺乏了這個因素，則臺灣將不會有政治的自由化，或自由化將會往不同的方向前進？在某種意義下，這個歷史問題是永遠不可能回答的，因為歷史是確實已經發生過的事件。然而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我們卻可以透過方法論的設計而凸顯重要的歷史因素。而這個作法就是建構“反事實”（counterfact）（參見 Zeitlin, 1984:18-20）。即，正因為我們認為某些因素是造成一些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反過來問，假如某些先前的原因沒有發生的話，則歷史將可能有怎樣不同發展？或如韋伯（Weber）說的，“為了深入真正的因果關聯，我們建構假的（unreal）關聯”（摘自 Zeitlin, 1984:19）。

事實上，在王振寰（1989）的論文中，已經透過了將國民黨在 1970 年代的本土化和 1987 年的政治自由化作了比較，而指出，在 1970 年代正因為缺乏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因此其政治的轉型可以在國民黨的意志和計劃下，攏絡臺籍精英進入政治體系，而政治社會結構並沒有任何的轉變。而 1987 年的政治轉型，因為有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動員，而使得政治轉型不再以國民黨的意志來控制。這個政治的自由化，包含了政治社會結構在某些程度上的轉變，包括國會結構的合理化，反對黨的成立，和社會政治基本人權的保障等。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比較而認為，1980 年代中期，假如沒有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動員，國民黨假如有任何的轉型的話，也可能如 1970 年代一樣，依照它的意志來改變，仍然吸收臺籍的政治社會精英進入體制，但是政治社會結構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這個方式正類似新加坡模式，由政府部門主導所有的一切，而沒有民間部門的任何壓力。換言之，在 1980 年代中期，假如沒有社會和反對運動的動員，則國民黨因為國會的老化和國際承認的問題，仍然可能作某種政治的轉型，但是在缺乏社會的壓力下，它的轉型將會如新加坡模式，仍然一黨獨大，培植資本家，但是壓制社會不同的聲音。這個現象是可能的，因為從李登輝，郝柏村到主要的政府官員，都十分推崇新加坡模式，可以看到一些跡象¹⁰。然而正因為反對黨和社會運動才使得國民黨所推崇新加坡模式不可能在臺灣出現。

假如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是使得國民黨政府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主要原因，則又如何解釋國民黨的新威權體制的形成，因為它的出現是在 1987 到 1990 年的社會動員之後？正如前面討論威權政治轉型裡所提到的，政治轉型有很多的可能結果，民主化祇是其中之一。不同階級和群體的聯盟和鬥爭，使得威權政治轉型出現新的組合結果。臺灣在解嚴後的社會動員使得社會政治結構有了自由化，但是它並不足以讓國民黨的統治瓦解。國民黨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找到聯盟的對象，而以新的面風貌出現。在這過程裡，反對黨和社會運動並沒有足夠的能力以其意志強加在國民黨身上。這正符合特波恩的觀察，改革的主動權“時間和形式的重要問題——什麼時候及以何方式”，從來不是由鬥爭的階級提出。

然而即使如此，我們透過與 1970 年代國民黨改革的比較，仍然可以認為，在缺乏了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因素之後，國民黨假如有政治轉型，則它的方向將不是如今天的自由化，即使它非常的緩慢，而是國民黨所喜愛的新加坡模式。而在這個模式下，資本家則將可能仍是個國家機器的“兒子”，還沒有資格成為“小伙伴”。

7. 結 論

10. 李登輝和郝柏村曾經先後訪問新加坡，郝柏村在 1990 年 12 月訪問回臺灣之後，並發表了“新加坡能我們為甚麼不能”的言論。

以上本文指出了國家機器，資產階級，以及下層人民的動員三個因素來解釋臺灣的政治自由化。而本文指出，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大眾的動員和對威權體制的抗拒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在這個轉型裡國民黨並沒有失去主導的力量。雖然國民黨在自由化的過程裡，由於派系內鬥以及由於社會運動的大量興起，而引起資本的信心危機和發生了投資罷工，但是國民黨在 1990 年 5 月之後，又重新組合起來，形成了新威權政治體制，並與臺灣的資產階級產生新的聯盟。

這個新的聯盟一方面壓制社會運動，另一方面與資本緊密結合；一方面制度上壓制反對黨，另一方面透過與地方派系財團合作企圖贏得選舉；一方面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面將公營事業黨營化並與大資本合作，取得政權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在這個新的聯盟中，資本家的角色逐漸在政治上愈來愈重要，而成爲國民黨的政治伙伴。祇是臺灣的資本家關心的主要問題是投資環境和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民主與否並不是重要問題。

新威權統治和新的政商關係是一體的兩面。它們是臺灣在 1980 年代政治自由化之後權力鬥爭的結果。而這個結果也意味著臺灣政治自由化的“正常化”，而未必是政治的“民主化”。因爲雖然形式上國家機器愈來愈具有民主政治的外表，但是實質上却在制度上逐漸建立不利於社會運動和反對黨的規則。即，資產階級的聲音愈來愈能夠進入國家機器，但是其他階級則逐漸被排斥；國民黨對國家機器的掌握使得逐漸建立的制度愈來愈不利反對黨。國民黨的黨營事業如此龐大，使得政黨政治無法真正實現；它與大資本的無顧忌的往來，使得非內圈人士無法以公平的方式取得公共的資源，而有利於非正式的侍從關係；更重要的，這個與大資本關係的強化，使得後者有了政治後盾，而更能操作市場和民意政治，使得民主政治成爲金權政治，以及使得國民所得差距加大。但不論如何，臺灣政治轉型的產物看起來是國民黨的重建，而其聯盟的對象爲資產階級。反對運動及社會運動似乎都太虛弱而無法有力的挑戰這樣的聯盟。

1992年國民黨完成了以其意志修改完成的憲法，並成功的改造了原來的國會結構，而使得臺灣的國會議員基本上來自臺灣社會，在這個條件下，國民黨在臺灣建立了以“人民主權”為基礎的政府結構。然而也隨著中共政權的經濟開放，國民黨同時也採取了較為彈性的大陸政策，這使得從不來往的台海兩岸開始了交流。在這過程中，不少的臺灣商人到大陸投資，而使得台海兩岸的經濟逐漸整合。這些新的發展對既有的國民黨新威權結構將會產生什麼影響，臺灣的政商關係將會有什麼新的變遷？在既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臺灣可能有下列三種不同而互斥的發展方向。

第一個可能性是國民黨形成類似日本的自民黨模式，財團的影響力愈來愈大而改變了整個政黨的運作方式。由於人民主權在臺灣的建立，因此未來國會和民意代表的選舉，地方派系和財團的勢力將更舉足輕重。而國民黨為了選舉的勝利，將更依賴財團和地方派系的勢力。這將使得財團和地方派系的勢力直接進入黨中央，而使得國民黨不再是由黨工控制國會，而是由民意代表控制黨的運作。換言之，這可能使得國民黨由現今的“外造政黨”變成“內造政黨”。在此情況下，國民黨將形成類似日本的自民黨，一黨獨大，而由黨內派系瓜分全國的政治資源。

第二個可能性是國民黨仍然依照現有的模式運作，仍然是由黨工控制的黨中央控制國會和政府機構，而它與資本之間的關係則仍是一個大小伙伴之間的關係。這個可能性是由於國民黨在政治轉型過程裡，積極的與大財團結合，以及極力的擴張其黨營企業，包括以其擁有的投資公司收購國營企業股票，承建六年國建工程，而使得國民黨自身已經成為大財團。因此國民黨不像其他民主國家的政黨需要民間的捐款，相反的，國民黨本身就具有了大財團的性質。在此情況下，國民黨並不十分的依靠地方勢力或財團，它仍然對政治的運作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相對的，大財團需要國民黨政府對其壟斷的國內市場的保護，以及依賴國民黨政府的大陸政策使其能夠繼續的往大陸市

場擴張。在這些情況的考慮下，國民黨在短期之內並不會失去自主性。它對資本仍然具有大哥的角色。

第三個可能性是民進黨有效的制衡國民黨，而社會運動也能對既有的政商聯盟形式予以抗衡。在今日臺灣，民進黨已經成為最大而且可能是唯一能夠在選舉上制衡國民黨的反對黨。然而從 1980 年代以來，它並沒有能夠突破 30% 的選票，而且在 1991 年的選舉中，民進黨的得票率反而下降。這顯示民進黨除非有相當程度的改變，否則不易透過選舉制衡國民黨。另一方面，社會運動的動員，對既有的社會政治結果經常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和方向。因此對於新的政商關係的出現和新威權主義的興起，社會運動可能可以透過對社會正義的要求，而制衡既有的政商關係。而這需要社會運動對既有社會政治結構提出診斷，並指出一些替代的可能性。

以上這三種可能性都可能在未來的臺灣發生。然而以既有的資料來看，第二種可能性，即國民黨維持主導的勢力而資本祇是聯盟的對象，是最可能的一個。因為國民黨具有的資源使得其他政黨甚至財團都無法和它競爭，而因此不會出現日本自民黨的模式。而臺灣的社會運動和民進黨在今日都普遍面臨動員的困境。因此，也在短期之內無法制衡國民黨和資產階級之間赤裸裸的聯盟關係。從此角度，國民黨在短期的未來似乎是一個政治上的“東方不敗”，它將維持一個新的威權統治形式。長期而言會有什麼變化，則沒有人能夠知道。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天下雜誌，1989年3月；1990年3月。

中國時報，1990年4月10日。

中華徵信所，〈臺灣前五百大企業集團〉，歷年資料。

王振寰（1988），〈國家角度，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1991），〈出現中的市民社會及其限制〉，《二十一世紀》，第五期，六月。香港中文大學。

朱雲漢（1989），〈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臺灣研究基金會。

周添城（1989），〈權力邊陲的中小企業〉，《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臺灣研究基金會。

林佳龍（1989），〈威權侍從主義下的臺灣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林忠正（1989），〈威權主義下弱勢團體的相互剝削的循環〉，《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臺灣研究基金會。

吳乃德（1989），〈尋找民主化的動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吳介民（1990），《政治轉型期的社會抗議：臺灣1980年代》，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財訊雜誌，1990年5月。

徐正光（1990），〈如何面對一個全新的政治生態〉，《中國時報》，5月9日。

徐瑞希（1991），〈臺灣企業政商關係史〉，《商業周刊》，9/10月。

陳師孟等 (1991),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 澄社報告, 台北: 允晨出版社。

陳明通 (1989), 〈區域性聯合獨佔經濟, 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 未出版研究計劃報告。

張家銘 (1990), 〈戰後臺灣地區企業與政府的關係〉, 《中山社會科學季刊》, 6 卷 1 期。

張茂桂 (1990), 《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 二版, 台北: 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黃德福 (1990), 〈選舉, 地方派系與政治轉型〉, 《中山社會科學季刊》, 5 卷 1 期。

經濟日報, 1989 年 1 月 4 日。

新新聞, 1989 年 2 月, 第 100/101 期。

——1989 年 8 月, 第 127 期。

——1990 年 12 月, 第 195 期。

戰略生產力雜誌, 1990 年 5 月。

蕭全政 (1989), 《臺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 台北: 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蕭新煌 (1989), 〈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剖析〉, 《壟斷與剝削: 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 臺灣研究基金會。

英文部份

Amsden, Alice (1979),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Vol. 5, No. 3, pp.341-80.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u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ck, Fred (1977)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Socialist Revolution*, No.33, pp.6-27.

- Cardoso, F. H. (1979)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6) "Entrepreneurs and the Transition Process: the Brazilian Case," in G. O'Donnell, et al.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eyo, Frederic, ed.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omhoff, G. W. (1990) *The Power Elite and the State*, NY: Aldine de Gruyter.
- Dupul, Arthur and Barry Thuchil, (1979)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Vol.8, No.1.
- Evans, Peter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2) "Reinventing the Bourgeoisie: St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Class Formation in Dependent Development," M. Bur-oway and T. Skocpol. eds. *The Marxist Inquiry*. AJS Supplementary.
- (1987) "Class, State, and Dependence in East Asia: Lessons for Latin America,"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old, Thomas (1981)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aiwan*,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1985)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Y: M.E.

Sharpe

- (1988) “Entrepreneurs, Multinationals, and the State,” E. Winckler and S. Greenhalgh. eds. *The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NY:Sharpe.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Jessop, Bo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London: Polity.
- Lenin, V. I. (1971) *States and Revolution*. NY:Internationals.
- Lipset, S. M.(1965) *Political Man*. NY:Doubledays.
- Marshall, T. H. (1966)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emnt*, Westport, Con: Greenwood Press.
- Moore, Barn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 O'Donnell, G. (1979) “Tensions in the B-A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 Schmitter and C. Phillip (1986) *Trans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vier-sity Press.
- Offe, C. and Ronge V.(1975) “Thesis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New German Ciritique*, No.6.
- Perez Sainz, Juan (1980)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State Capitalism in the Periphery,”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s*, 9:4.
- Poulantzas, Nicos (1978)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LB.

- Przeworski, Adam (1986)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 O'Donnell. et al.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eschmeyer, Dietrich, et al.(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London: Polity.
- Schmitter, Philippe (1974)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Vol.36, pp.85-131.
- Therborn, Goran (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No.105.
- Tilly, Charles (1986) "Warmaking and State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nckler, Edwin (1989) "Taiwan Politics in the 1990s: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OC.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 9-11. 1989. Taipei.
- Wu, Nai-teh(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 Zeitlin, Maurice (1984) *The Civil Wars in Chi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eitlin, Maurice. et, al.(1976) "Class segments: Agrarian property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capitalist class of Chi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1, pp.1006-29.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四期 1993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4, March, 1993.

城市、文學與歷史：
評《看不見的城市》

王志弘

Citie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 Review of *Invisible Cities*

by
Chih-hung Wang

關鍵詞：城市、都市史、都市文學、論述

Keywords: city, urban history, urban literature, discourse.

收稿日期：1993年2月19日；通過日期：1993年2月24日

Received: February 19, 1993; in revised form: February 24, 1993

摘 要

本文是對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小說《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1974) 的評論。本文將這本小說放在都市史研究的脈絡裡，指出文學作品和學術研究同為論述建構的事業。城市裡多重論述與多重現實的交錯，點明了史學和文學密切相繫的命運，而兩者聯盟的基礎，正是在於論述戰鬥的政治行動。透過文學的啓示，辨明學術研究亦為論述建構的事實，可以開啓都市史研究的新視野。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Italo Calvino's novel *Invisible Cities* (1974). Situated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history research, this novel illustrated that both literary and academic works involv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s. The intimate connectness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was illuminat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discourse and multi-reality of citie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coalition resides in political actions through discursive battles. Through the reading of *Invisible Cities*, we may find out a new vision of urban history research.

1. 前言

伊塔羅·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1923-1985) 是義大利著名的小說家，“城市”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是個重要的主題，《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1974) 更是全書以一個個城市的故事貫串，娓娓道來城市的迷魅。但是，一本在書架上歸類為文學作品的小說 (fiction)，以其虛構 (fiction)，和都市史的研究有什麼關連，甚至對都市史有所啓發呢？這是個根本的問題，也是本文評論的一個線索。城市與歷史虛實真假的判準在哪裡？都市史寫作的價值與效用何在？被評為“魔幻寫實派”的卡爾維諾，在他的城市“文學”裡，會有不尋常的看法嗎？

2. 全書結構與內容概要

這部“小說”的正文，可以輕易地區分為兩個部份，以不同的字體做形式上的標明。第一個部份是每一章各有標題的短文，第二個部份，則是每章前後，馬可波羅與忽必烈汗的對話情景。

如果說這本書有一個明顯的“情節”，那就是馬可波羅向忽必烈汗報告他曾經出使遊歷的各個城市的奇聞，以及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互動。不過，仔細閱讀這些城市的故事，可以發覺敘述的內容，偶而會超出了我們所熟知的馬可波羅遊記的時空背景，例如摩天大樓、機場，以及一些後來才會出現的城市名稱（如洛杉磯）。因此，我們可以輕易地構想另一種情節，就是卡爾維諾透過兩個“戲偶”，將古往今來的城市故事搬演給讀者觀眾（“作者”現身說法，以突顯小說之為虛構，正是後現代小說所指認的特徵之一；或者，這可以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史詩劇場”的“疏離效果”來比擬？）。或者，我們可以解脫對馬可波羅遊歷的時空背景預設，逕自認定書中的馬可波羅和忽必烈，有特殊的時空穿梭本領，《看不見的城市》因此不過是一部剛好有馬可波羅和忽必烈兩個角色的小說。

不過，《看不見的城市》引用一個混雜了史實（忽必烈）和小說（《馬可波羅遊記》）的典故，其實正好點明了卡爾維諾跨越虛實分界，允許讀者多重解讀、多所思辨的“用意”（作者的用意何在，一直都是個留給觀者玩味的題目）。

扣除了第二個部份的各章前後之對話，第一部份總計有五十五個城市故事，歸屬於十一個主題，這意味著每個主題有五篇故事。（這些故事的出現順序，依其標示法和出現章序，有一種結構性的關係，除了第一章和第九章各有十個故事外，各章有五個不同主題的故事，並依序每章出現一個新的主題，依標題排起來，正好是五四三二一的順序。這種有秩序的安排似乎是卡爾維諾的偏好，或許反映了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的形式趣味，但是本文不擬繼續深究。）

以下依序概述這十一個主題所舍括的意涵：

2.1 “城市與記憶”

“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但是，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欄，在階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杆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頁 10-1）

第一個主題述說城市的記憶，張開了空間、時間與事件所交織的記憶之網。不同的故事言及記憶的不同面向與內容：影像的記憶、氛圍的記憶、心情的記憶、感覺的記憶。複雜的記憶牽繞人心，與現實糾纏。不過，如果為了方便記憶（這裡出現了博聞強記的理性企圖），而強使城市不動，則城市枯萎，沈陷記憶之中，則人生枯萎。而且，經過時間的改造，城市的血脈終致斷裂，記憶中的老城市，真的只存在於記憶和影像之中，只是想像所串連起來的連續性，依然發揮了解釋、評價與影響現實的作用。

2.2 “城市與欲望”

“如果你一天工作八小時，切割瑪瑙、條紋瑪瑙和綠石髓，你的勞動是在賦予欲望形式，可是勞動本身卻由欲望那裡獲得形式，而且當你相信自己在安那塔西亞樂在其中時，你只不過是它的奴隸。”（頁 12）

有創建一座城市的欲望，有一座城市所創建的各種欲望，欲望是對應著缺憾與幻想中的滿足而升起。但是，欲望的形式與形成不全然是主觀的臆想，做為人類之活動沈積的城市，正以其固化的形式賦予欲望形式，或者說是將欲望投射在空間化的形式之中，並同時以其空間佈局，捕捉飄忽的欲望。可是，為了囊括所有新起的欲望，城市也，不得不隨欲賦形，與時俱變。

2.3 “城市與符號”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座僅由差異構成的城市，一座沒有形貌、沒有樣式的城市，而個別的一座座城市，則填滿這個心中之城。”（頁 34）

這一組故事描述城市所披的抽象符號外衣，闡釋名與實、符徵與符旨、語言與事物之間的分離和不一致，進一步點出城市的表面與內裡、燦爛與灰暗的兩分。更重要的是關於城市的論述、描述城市的那些字眼，經常取得了自存的生命，而取代了地面上的城市。弔詭的是，如果我們沒有了字詞，甚至無法想像和記憶城市，符號的外衣原來不是可以穿脫的定製衣飾，而是隨著城市一起成長變化的表皮，緊緊黏著城市的筋肉。

2.4 “輕盈的城市”

“將城市區分為（快樂和不快樂）兩種，沒什麼意思，反而要分為另外兩種：一種是歷經許多歲月，它們的變化還繼續賦予欲望形式的城市，而在另一種城市裡，不是欲望抹消了城市，就

是欲望被城市抹消了。”（頁 35）

這些故事說的是城市組構的“原型”：千井之城地底湖的構造、欲望與城市形式配搭而造起的城市、只由水流的管線構成的水神之城、工作和玩樂兩個半邊拼合而成的城市、吊掛在山谷上的繩索之城。這些故事以不同的切面，講述構成一座城市的骨架、結構或原理。這些或許不為居民所識的原理，並不因此減損其左右城市命運的能力，並且經常在據之而構築起來的傳說、神話和宗教上，顯露其若隱若現的身影。

2.5 “貿易的城市”

“因此，這座城市重覆著它的生命，完全相同，在它的空曠棋盤上，上下移動。居民重覆著相同的場景，只是演員換了；他們以不同組合的音調，重覆著相同的言詞；他們張開輪流更替的嘴，打著完全相同的呵欠。”（頁 64）

在貿易的城市裡，交換的不僅僅是金錢與貨物，同時進行的還有記憶、欲望與眼光的交換，身份、角色與生活的交換，乃至於整座城市的交換。在交換的時刻裡，交換的各方也建立了關係，而這些關係經常是固定模式的重覆，交換常常只是元素的互換，而非結構的轉換。不過，在交換的過程裡，在關係的網絡裡，移動通行的路徑是如此繁複多樣，即使關係的結構不變，往來互動的方式却無窮盡。

2.6 “城市與眼睛”

“數百萬雙眼睛向上望著窗戶、橋樑、續隨子，可是他們所看見的也許只是一張白紙。有許多城市像凡利斯一樣，閃躲了一切凝視，只逃不過那以驚奇觀賞的眼睛。”（頁 90）

這一組故事說的是觀看，是觀看所預設的一段距離與位置，是觀者與被觀者的對應。一座城市的形貌隨著觀看的心情、立場、角度與生活方式而定。每一雙眼睛裡映照著一座城市，千百萬雙眼睛裡映照

出來的城市所構成的混合體，是否正好是地面上的那一座城市呢？

2.7 “城市與名字”

“對於那些經過卻沒有進入的人而言，這座城市是一個樣子；對那些深陷其中，不再離開的人，則是另一個樣子。你第一次到達時，有一個城市；你離開而且永不歸來時，又有一個城市。每個城市都值得一個不同的名字。”（頁 124）

城市的名字將關於城市的論述和字詞都凝縮起來，成爲一句咒語。城市的名字與實質，城市的論述與現實，論述與記憶之間，總是有差距，但正是有這些差距所展開的空間與時間，人與城市才得以存活，而不致窒息。城市的名字歸予城市的所在地，還是歸予造就城市的活動和人？或者根本就是歸予名字所喚起的記憶和景象。城市名字的更替與維繫不僅是歲月與地理的轉移，同一個名字底下，有著城市的錯亂系譜，以及古老城市之名的榮光所促動的建構系譜的欲望。

2.8 “城市與死亡”

“對話的參與者一個接一個死去，將來會接替他們的位置的人也同時一一誕生，有人採取這個角色，有人採取那個角色。當某人改換角色，或是永遠離開了那個廣場，或是第一次進入廣場，就會引發一連串變化，直到所有的角色都重新安排過。”（頁 80）

死亡不僅是時間的斷續，也是空間的隔離。這一組故事講述城市裡人的世代承遞，以及結構的長期變化。死去的不是已經消失而不再存在，死亡是一個現存的範疇與領域，散佈在城市、言語和實際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過去的”對於活著的，進行中的事物，仍有其模塑的力量。如果誕生使得存在有希望，那麼死亡使得存在更爲真實。

2.9 “城市與天空”

“關於安德里亞居民的性格，有兩項優點值得一提：自信和

審慎。他們相信城市裡的每樣創新，都會影響天空的樣子，所以，在做任何決定之前，他們都會計算他們自己、這座城市，以及全世界的利害。”（頁 150）

這一組城市與天象的故事，視天空為城市（人世）的理想、欲望與真理之所在，天體的運行法則，經常被視為城市組構的原則。天空也代表一個全盤的視野，由此可以偵知和觀測我們置身城市的織理之中，所看不到、察覺不到的事物或道理。但是，天象與天體不正是人類世界的投影嗎？那麼到底哪個是原理或根本的所在呢？

2.10 “連續的城市”

“現在啃噬著你的心靈的問題，更令人痛苦：在潘塞西利亞之外，是否真有一個外面存在？或者，無論你從這個城市出發走了多遠，你只是從一個地獄邊緣走向另一個邊緣，永遠無法離開。”（頁 156）

都市的蔓延與自然世界的被侵吞，是卡爾維諾在這組故事裡為之歎息的現象。現代城市的廣袤，是城市向外擴張的結果，而且城市是一個消費與製造垃圾的核心，將殘餘堆擠到邊緣；而都市景象的重覆，使得不同都市的名字失去了實質的差異。最終，都市成了沒有外在，沒有自然，沒有一個可供逃離、脫身和反省觀照的對立面的龐然怪物。

2.11 “隱匿的城市”

“在悲傷之城瑞薩，也有一條看不見的線，將一個人同另一個人綁在一起一會兒，然後解開，然後又再次在移動的各點之間伸展，畫出了新穎又迅速的樣式，因此，在每個時刻裡，這座不快樂的城市，都包含了一座沒有察覺到本身存在的快樂城市。”（頁 149）

潛隱的、看不見的城市，不是目光之所不能及，而是心神不在之

處，是被忽視的地方。隱匿的城市是想像、欲望、記憶、死亡、記號的包被之處，看不見的絲線穿透綁縛了意想不到的人事物的組合。這些隱匿的東西也許一直存在，但看來像是只在一瞬之間，或許只有在日常生活剎那的裂縫裡，才能見到與察覺。只有以不同的眼光，懷抱好奇，於不疑處有疑，才可以照亮這些角落。

其實，十一個主題穿插出現在每一個城市故事之中，只是或隱或顯，而不拘限於標題。此外，藉由忽不烈和馬可波羅的對談（聽故事者與說故事者的關係），卡爾維諾傳達了另外幾個重要的訊息，都是有關敘事與論述的建構，以及真實和虛構之難分：

(1)習得忽不烈的語言之前，馬可波羅以物品的搬弄，配合了手勢來表達，雖然在意義上不像語言那樣精確，却因此有多重解讀的可能，聽者與讀者可以自在地想像，也可以索性略去不理，有參與其中一起操演的空間，不必像聽熟悉的語言一樣，必須逐句逐字依循規範，而被綁縛在僵硬精密的正文之中。據此，《看不見的城市》就是一則則的寓言，是有言外之意，而讀者必須自行思索的寓言。

(2)論述沒有窮盡之時，總是有可以繼續說的東西，這不是因為無法造就一種論述的原則或規律，來掌握一切可能被提及、被描述，因而可能存在的事物（以論述來捕捉現實，已是好幾代人的意圖），而是因為論述背後總是有浮動漂移的欲望，使論述一直編織下去，甚且論述談論的就是論述本身，而真實則只做為論述（欲望）的對象而存在，不再有一個論述之外獨立獨存的真實可以辨視出來。

(3)但是，在論述停歇之處，我們也總是摸得到、看得著的城市，是否就是真實之所在了呢？真實是在石塊灰泥之中，是在人的活動往來之中，還是在心情與感覺之中，是在於飢餓和死亡？當我們反思之際，論述又潛身而入（因為思想總是透過論述進行）。但是無論真實是什麼，以及真實是否能被探知，若無一設定的“真實”做為基礎，論述也無從著根生長，因為論述總是有一個對象（即使那個對象是論述自身，此時，論述即真實本身）。

(4)無論如何，論述要不抽象乾枯，便要經常有欲望、記憶、驚奇、幻想、感覺、身體的活水灌注。

全書最後的陳述，可以使得被離奇的故事迷惑的讀者，脫離虛無和相對主義的猜想，而見到卡爾維諾所執著的信念和出路：

“生靈的地獄，不是一個即將來臨的地方；如果真有一個地獄，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地獄，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離，不再受苦痛折磨。對大多數人而言，第一種方法比較容易：接受地獄，成爲它的一部份，直到你再也看不到它。第二種方法比較危險，而且需要時時戒慎憂慮：在地獄裡頭，尋找並且學習辨認，什麼人以及什麼東西不是地獄，然後，讓它們繼續存活，給它們空間。”

3. 主題評論

3.1 論述中的城市與城市中的論述：再現與現實

《看不見的城市》是關於城市的論述，也是閱讀了城市之後的記錄，因爲誠如賀龍·巴赫德 (Roland Barthes, 1986: 92) 所述：“城市是個論述……我們僅僅藉由住在城市裡，在其中漫步、觀覽，就是在談論自己的城市，談論我們處身的城市。”據此，城市本身是有意義而可讀的正文，而且城市正文的寫作者，正是生活其中的人，透過人的實踐 (居住、漫步，及其他種種活動)，不斷書寫城市。當然，城市不像語言一樣有一定的字彙和語法，但也有其慣用語和發言立場。當然，視城市爲論述的同時，已經引發了論述的材料，以及發言者和接收者是誰的問題，這也連帶了“城市是什麼？這個字所指爲何？”的問題和“再現 (representation) 與被再現之現實的區分”的問題。

論述的材料不僅是語言，也是任何能形成有意義之連繫的事物，亦即具有表意作用 (signification) 的事物；論述的發言者不僅是人，也是具有發散、溝通意義能力的事物與活動；論述的接收者不僅是有

理解意義能力的人，也是受論述所影響的事物和活動。其實，在這麼界定的時候，以語言或象徵體系為再現，以物質為被再現之現實的傳統觀點，已經動搖了，因為此時語言本身可以是再現的對象，而物質與實踐也可以是再現之憑藉。

這裡所蘊藏的再現／真實，已經是一個多重視點／多面體（多重現實）的講法。由於論述之憑藉是多樣的（不僅僅是話語），發言者、接受者也不定於一尊，再現就是多重視點的再現，而做為論述之對象方能被我們知覺到的現實，遂成為一多重現實（是否有一個真實不虛的現實在論述之外存在，在此是一個置入括弧的問題）。詳言之，現實是多重的，論述也是多重的：以論述來談論城市，但城市本身也是論述；可以話語、以石頭灰泥、以身體姿勢、以行動來發言，也可以話語、石頭灰泥、身體姿態、行動做為論述的對象。據此，城市也是多重的了，因為城市便存在於關於城市的多重論述（discourses of cities）和做為論述之多重現實的城市（cities as discourses）之間。

《看不見的城市》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已經暗藏了現實的多重性與論述的多重性。卡爾維諾在〈文學裡現實的諸層次〉（1978）一文中，提及文學作品有許多層次的現實，而文學正是立基於這種多層次的區別之上，如他所舉的例子：“我寫道荷馬說尤里西斯說：我曾經聽過女妖的歌唱。”我、荷馬、尤里西斯、女妖這幾個主體，都位居文學敘事的不同層面，所牽連的是不同層次的現實。真實與虛假的問題在此就不是根本的了，因為真假成了在不同層次隨論述之運作（別忘了，這是一種權力關係的牽扯）而變動的性質，是鬥爭的標的，而非先驗的存在。

這裡關於論述、再現與現實的講法，會讓人聯想到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83）的擬像（simulation）與過度真實（hyper-reality）的提法：到了擬像的年代，已經沒有再現與被再現的對象之間是否符應的問題，因為擬像取代了現實，擬像之外沒有現實，只有比真實還真的“過度真實”。但是多重論述和多重現實交纏的提法，却

不取消現實的存在，而是指出現實及其論述的不可割離，以及論述與現實的多源多樣。而且雖然現實的各個層次區別，是（透過論述）建構出來的，但是這些建構並非純屬心靈產物，而有其物質性的經驗和實踐為基礎，也就是說，論述有其物質性。也就是說，透過多重多樣論述的區劃分類與再現中介而得以被感知、理解和“觸摸”的多重多樣的現實，正是這些論述所以會存在的基礎。而以論述本身為論述對象的論述，只是說明了論述與現實、再現與被再現者之間的模糊界線。這種界線在哪裡，其實也是論述鬥爭的目標之一。

3.2 都市經驗與記憶：複雜多樣與世界縮影

《看不見的城市》以城市做為鋪陳作者對人類狀況的觀察與意見的場景，這並非偶然，因為城市正是人類世界之縮影，是“複雜多樣”的體現之處。

賀龍·巴赫德在《艾菲爾鐵塔》(1979)一文中，寫道：“鐵塔最終同一切重要的人類場所具有的基本功能—自給自足—重新連結起來；鐵塔可以獨立自存：你可以在那兒夢想、吃喝、觀賞、理解、驚嘆、購物；正像在一艘郵輪（這是令孩童夢想的另一個神奇對象）上一樣，可以感覺自己與世隔絕，但仍然是世界的主人。”(1979: 17)。城市其實正是最為整全的鐵塔和郵輪，它包容了驚奇和差異，是奇想的實現之地，是一個自足的世界。此外，巴赫德也提到：“城市是我們和他人相遇的地方…城市中心被認為是社會活動交換的地方，而且…這是一種情欲的活動。城市中心總是被認為是顛覆性力量、決裂的力量，以及遊戲的力量作用與會遇的空間。”(1986: 96)。城市中心正是城市的複雜多樣最為明顯而誘人的所在。

人類為了求生存，總是要對周遭環境的利害之處有所了解，因此，對於身處環境之全貌的探知，一直是人類潛在的欲望。一方面城市以其複雜多樣，激發了更強烈的探求全貌的欲望，另一方面，城市也正以其無所不包，而成為構想整個人類世界的模型，成為全貌之縮影。

在艾菲爾鐵塔上遠眺的快感，正是對於複雜多樣的都市織理，有了全盤掌握的快感，有了掌握城市所體現的世界的快感，是一種知悉和擷獲全局的滿足感。

都市的經驗與記憶，在每個時代一向是以其多樣性為根源。但是在工業化進行之際，都市的急遽擴張，為這種複雜多樣帶來了新的尺度，新的強度和節奏。快速繁複的變化，使得感官所接受到的景象和訊息，成為片斷化、流轉不居的拼貼。此時，全局全貌就顯得更難猜想掌握了。

所以，都市經驗一方面是身陷一種結構性的總體的感受，一方面又是支離破碎，難以分類的紛雜，《看不見的城市》在其故事裡，同時展現了這兩個層面（例如城市與天空系列隱含結構性的整體，城市與符號系列則指涉城市之紛雜多面）。

3.3 城市史的建構與解構：文學、歷史與政治

回到本文前言所提的問題，一本“文學”著作對都市史的研究有何意義？文學與歷史研究有何關係？都市史研究的價值與效用何在？這些問題牽涉的乃是文學、歷史（或一般人文社會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關連。

卡爾維諾在〈哲學與文學〉（1986: 39-40）一文中提到

“哲學和文學是互鬥的對手。哲學家的眼睛穿透世界的幽昧昏暗，剔除它的血肉，將紛雜多樣的存事物，簡化為一般性觀念之間蛛網一般的關係，並且制定了法則，棋盤上一定數目的卒子，便根據這個法則移動，而窮盡可能是無窮的組合方式。作家走過來，用國王和王后、騎士和城堡代替了抽象的棋子，它們各有稱號、特殊形狀，以及一系列皇家的、似馬的，或教士的屬性；作家不要棋盤，他們鋪展了一大片塵土漫散的戰場，或是狂風暴雨的大海。所以，遊戲規則至此已經被顛轉了，揭顯了一個和哲學家截然不同的事物之秩序。或者，這時候發現這些新遊戲規則的

人又是哲學家，他們匆匆跑回來，證明作家的所作所爲，可以被簡化爲哲學家自己的各種操作之一的項目，而個別的城堡和主教，只不過是一般性的觀念披上了外衣。因此，爭辯持續進行，兩方都相信在征服真理（至少是一個真理）的路途上，又向前邁了一步，但同時也十分清楚他們用以建構的材料，跟對方一樣，都是字詞。但是字詞有如水晶，具有許多不同性質的切面和旋轉軸，隨著這些字詞水晶擺放的位置，以及這些偏光的表面如何切割和層疊錯落，光線就有了不同的折射。哲學和文學之間的衝突，不需要解決。相反地，我們只有認爲這種衝突是恆久的且時時更新，它才能保證字詞的硬化症不會像一層冰一樣封住我們。在這個爭戰中，兩位競逐者不能將目光從對方的身上移開，但是也不能逼近而置身同一個角落。”

哲學（乃至於一般社會人文科學）與文學都是從事論述的編纂，只是它們自認是在不同的層面掌握真實，並且因此在不同的戰線從事論述的戰鬥。戰場上，真與假的問題就沒有標準答案了（真假已經成爲操弄的標的），重要的是能夠獲得勝利（當然，戰鬥有其目標，而非盲目爭鬥）。因此，文學和“學術研究”兩者，至少在扣連上政治（權力關係的拉扯）時，哪一個最接近真理的問題可以先擱下，而要考量彼此如何在論述戰鬥上相互支援。據此，都市史（不論是文學中的都市還是歷史研究中的都市）的效用與價值，除了“鑑往知來”之外，主要就是扣連在政治行動上了（若從知識、權力與論述的糾結來看，寫作初始就脫離不了政治）。

卡爾維諾在〈文學的政治正用與誤用〉（1976）一文中，提到文學的政治用途的兩種誤用：(1)文學的作用在於說出已經由政治所擁有的真理，(2)文學是永恆的人類情感之所歸，是政治經常會忽視的人類語言之真理所在。以及三種正確用法：(1)替沒有聲音的說話，賦予沒有名字的一個名字，特別是那些被政治語言所排除或試圖排除的，(2)安置一種語言、視野、想像、心靈努力、事實之關連的模式，創造一個

對於一切行動計劃，尤其是政治行動，都很重要的既屬美學又是倫理學的價值模型，(3)透過認識到文學是一種建構，其中所包含的訊息，作者本身也不全知道，文學除了作者的部份之外，總是有一個集體與匿名的部份，而推知政治也必須如此自我認識與自我質疑。

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如是，“學術研究”與政治的關係也離此不遠。都市史（文學與歷史研究）作為論述之戰鬥，正是要站在某些特殊立場發言、賦予名稱，以及從事解釋，是要建構一個可以展開行動的歷史計劃，却又清楚理解到這個計劃乃是建構，而非永恆之真理，神聖而不可侵犯。《看不見的城市》正是卡爾維諾針對一個古老的論題：城市是什麼？以及後面一個更廣泛的問題：人的社會是什麼？而編纂的參與論述戰鬥的利器。

4. 結語

選擇馬可波羅的故事做為講述城市的佈景，有什麼意蘊呢？除了義大利威尼斯這個永恆的隱喻之城外，馬可波羅這個角色做為一個溝通東西方的旅行家，做為一個說故事者，他是一個漂移的論述編造者：他不僅僅是在時空旅行，也在他的心靈中旅行，漂移的位置，正對應了漂移多變的論述。

但是，觀覽《看不見的城市》，令我們感動的不是馬可波羅的博聞或奇異經歷，而是他在拜訪和講述不同的城市時，一慣不變的仔細用心和人文關懷。人道主義或許會讓我們無法冷酷地分析社會的現實，找出戰鬥的最佳位置，而沈陷在浪漫的幻想或情緒之中，但是這種幻想和感情，正是支持我們繼續前行的動力。

參考書目

Barthes, Roland(1979) "The Eiffel Tower", *The Eiffel Tower and Other Mythologies*,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New

- York: The Noonday Press, pp.3-17.
- (1986)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M.Gottdiener & Alexandros Ph. Lagopoulos(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87-98.
- Baudrillard, Jean(1983) *Simulations*, trans. by Paul Foss etc..New York: Semiotext(e).
- Calvino, Italo(1967)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No 28, also in *The Uses of Literature*, pp.39-49.
- (1974) *Invisible Cities*, translated by William Weaver, New York: Harvest/HBJ.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Italy as *Le città invisibili*. 1972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 (1976) “Right and Wrong Political Uses of Literature,” Paper read at a symposium on European politics arranged by the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at Amherst College, February 25, 1976, also in *The Uses of Literature*,pp.89-100.
- (1978) “Levels of Reality in Literature”, Paper rea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vels of Reality,” Florence, September 1978, also in *The Uses of Literature*, pp.101-21.
- (1986) *The Uses of Literature*, trans. by Patrick Creagh,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四期 1993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4, March, 1993.

經濟學者的養成過程*

大衛·克蘭大

亞羅·克拉馬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st

by

David Colander

Arjo Klamer

身為經濟學者，我們對於培養學生成為專業經濟學者的過程不僅存一份關切，並且也都有個別的經驗。然而，除掉一些軼聞趣事性質的材料，真正的數據十分缺乏。本文旨在略盡棉薄，以期對該過程逐漸產生認識和了解。

關於研究所的經濟學教育，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其中絕大多數，局限在私底下表達。然而，仍有一些意見會在枱面上出現，通常是那些批評性最強的。例如羅勃·庫納（Robert Kuttner）（1985）總結衛

* 本文譯自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Fall 1987): 95—111. 感謝作者及美國經濟學學會同意授權本刊翻譯及轉載本文。本文由潘克宇先生中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錢永祥先生協助校訂。

收稿日期：1992年8月9日

Received: August 9, 1992

斯理·李昂鐵夫 (Wassily Leontief) 和約翰·肯尼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之類站在批判立場上的經濟學家之意見時，曾經如此寫道：“各個經濟學系製造出來了一代‘白癡專家’，對於深奧的數學十分精通，對於現實的經濟生活却一無所知。”本文關於研究所的教學所做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數據，有助於評估這一類的觀點。

有關經濟學者之培養過程的資訊，除了其一般性的意義之外，對於經濟學的方法論也很重要 (Coats, 1985; Klamer, 1983; McCloskey, 1986; Whitley, 1984)。研究所的經驗對經濟學論述的成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認證經濟學者的專業人身份，它設定了經濟學者進行論證的方式，並且告訴他們什麼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什麼不是。要了解經濟學的論述世界，必須先對經濟學者在研究所時期的專業化過程有充份的認識。

我們在六個頂尖的經濟學研究所——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對研究生進行問卷調查，取得了我們的資料。我們探問今天的研究生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他們對於經濟學、經濟以及研究所的看法。212 位應答者相當平均地按照就讀研究所的年數分佈 (參看附錄：問卷及方法論的討論)。在調查之後，我們還做了一系列的訪談。

我們將問卷調查所得的結果分別在下面四節呈現，其中我們自己的意見將盡量減少。這調查所觸及的議題是無法在這樣一篇文章中作詳盡討論的。不過，在最後一節中我們是提供了一些我們自己對結果的解釋。

1. 學生背景概述

在這些選定的學府中的典型經濟學研究生，乃是為 26 歲、中產階級、無宗教信仰而有長期伴侶的男性白人 (在我們的樣本中，女性占 18.9%；拉美裔只有一位，全無黑人)。他們大部份出身自高度競爭性的大學，家庭也屬相對而言富裕。他們的父親過半數 (54%) 擁有研

究所以上學歷，母親中則有 23% 擁有研究所以上學歷，平均家庭收入約在 5 萬美元。87% 的人在大學時代主修或輔修經濟學，28% 的人修數學，24% 的人修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 15%，自然科學 9%（學生可以同時擁有一門主修及一門輔修）。大部份的學生（63%）申請入學時，視經濟學研究所為前程唯一選擇。而那些考慮過其他學科的人，所考慮的均是與政策有關的學門或者是法學院。他們的焦點如此清晰，部份原因在於有 50% 的學生在開始經濟學研究所的學業前，曾經在另一個學士後領域中有工作、涉獵或學習的經驗。

喬治·史提格勒 (George Stigler) (1982, 1975 年首次發表) 指出經濟學易於使人保守。然而，就我們的應答者來說，至少在他們此階段的生涯中並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就他們政治的觀點而言，47% 的人自認為是自由派，22% 自認為溫和派的，15% 自認為是保守派，12% 自認為激進派（4% 回答其他）。這樣看來，至少就頂尖大學的學生而言，大多數的學生自認為主要傾向於自由派。

2. 學生的興趣

當一個開放式的問題問到，他們對於研究所最喜歡及最討厭的是什麼時，36% 的人認為最喜歡的是學術的環境，20% 認為最喜歡課程和研究。至於他們最不喜歡的，多數的不滿，焦點都在數學和理論的份量太重，以及所學的題材缺乏現實意義。但無論他們有什麼不滿，只有 6% 的人說他們絕對不願重來一遍，21% 的人則不確定¹。

關於未來的工作，53% 的人計畫尋求學院生涯，33% 的人欲從事與政策有關的工作，17% 想進入企業界，8% 要進入研究機構，2% 想進入新聞界²。這項結果，與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所做的一項未發表的調查大致吻合（其報告見 The Commit-

1. 此研究不包括輟學學生，然而，這些學校大部份輟學率都相對的低。這表示在發給入學許可的過程中，已成功淘汰了無法接受訓練過程的學生。

2. 百分比的總和可能超過 100%，因為有些學生選擇了不止一個的目標。

tee on the States of Women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1987年3月份之通訊第4頁)。這項調查發現,新科經濟學博士中,有60%的人計畫進入學院。我們研究結果的百分比之所以較低,可以歸因於抽樣母體的差異:我們的對象是研究所的學生,上述調查的對象則是新科博士。這中間的差異顯示,那些不打算覓大學教職的學生,比較可能中途放棄學業。

學生們希望想得到的學院工作,主要是進入研究性的大學。41%的人希望15年之後能進入主要的大學,32%的人想進入以政策研究為導向的研究機構,16%的人想到好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 college)去,11%希望待在重要的研究機構,9%希望到私人企業部門。在隨後的訪談中,學生證實了這些偏好。就像有一位學生說的:“...有一件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走進(一位著名教授的)辦公室,宣稱你想要(在一個重要的文理學院中)教書。”

想進入學院的53%的人,並非均在入學之初就已打定這個主意。在我們的對話當中,有一些學生指出,同儕的壓力和教授的意見,均是他們抉擇的重要因素。當我們與研四學生談到在重要的學術機構之外的職業選擇時,這些學生特別強調了上述問題。一位學生指出,“當很多朋友,將別是教授們,以你獲得的工作好壞來評斷你這個人,這(擔任公共政策方面的職位)實在不好受。如果你希望他們瞧得起你,你得在重要的大學中得到一份工作。要不在乎這一切,成為這四年來對於自己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人們眼中的失敗者,是很不愉快的事。”

如果研究所淨在製造對政策不感興趣的白痴專家,那並非因為學生進入研究所時就已經不感興趣。多數學生(53%)認為,參與政策形成的願望,是他們決定進入研究所的一個極重要原因;只有17%的人視此願望不重要。另一個攻讀研究所的重要理由,是他們喜歡大學時代主修的經濟學(53%),認為此點不重要的人只占13%。在研究所期間,71%的人當過助教或研究助理,11%做過顧問,另外還有11%的人做過政治工作(有些學生不只做過一種工作)。此外,還有34%的

人已經在撰寫學術著作以備發表。

在調查以及訪談當中，經濟學的現實意義是最重要的主題。當問及選擇論文主題的主要因素為何，或可能為何時，答案歸趨於想要做具有現實意義的研究。當問及何種因素影響論文題材的選擇，多數（67%）說他們想要了解某個經濟現象。17%的人認為使論文順利完成是重要的理由，只有4%的人提到某個特定的數學或計量經濟學的技术正好可以應用。

傑克伯·維納（Jacob Viner）曾經說過：“人在智識方面的興趣並非天生狹窄；要讓智識興趣偏狹需要特殊而且嚴格的訓練。”根據我們的調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研究所的經濟學教育達到了窄化學生興趣的目的。大多數的應答者都有廣泛的興趣，但課業讓他們沒有餘暇去發展這些興趣。我們詢問他們，在身為經濟學家的養成過程裡，各個領域中的研讀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他們的回答如表 2-1。雖然大部份的研究生認為，閱讀其他學科——例如居首的歷史學與政治學，或是居次的社會學與哲學——的作品是重要的，但我們從訪談中發現，大多數人沒有從事這類研讀，因為他們缺乏時間。

這種窄化過程的另一項指標，是學生覺得研究所很少給他們機會去做學科之間的討論。即使 60%的人說他們同其他學科的朋友和學者們有經常的來往，只有 13%的人認為這類互動與智識有關。

應答者的興趣如表 2-2（依學生最感興趣的百分比高低排列）。就經濟學內部各個領域感興趣的程度而言，應答者的答案反映出班哲明·華德（Benjamin Ward）（1972）所提出的一個序階確實存在，雖然也有些顯著的例外³。我們的調查在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方面，與華德為經濟學所畫的序階相吻合。計量經濟學在順序上較低，但有很多人具有中度興趣。經濟發展與產業組織排名高於華德的排名。學

3. Ward 所做出來的序階如下(1)個體、總體理論，和計量經濟學；(2)國際貿易、公共財政、貨幣與銀行；(3)勞工、產業經濟以及經濟史；(4)經濟思想史，經濟發展及比較經濟體系。

表 2-1 其他領域之閱讀的重要性

單位：%

	極重要	重 要	輕度重要	不重要
數 學	41	32	21	6
歷 史	34	34	24	8
政治學	24	30	33	13
社會學	16	29	35	21
哲 學	15	27	27	15
心理學	9	20	44	27
電 腦	8	26	35	30
物理學	2	6	27	64

表 2-2 學生對各個次領域的興趣

單位：%

次領域	非常感興趣	中度感興趣	不感興趣
總體經濟學	42.6	43.5	13.9
政治經濟學	36.1	38.0	25.5
個體經濟學	35.7	48.3	15.9
國際經濟學	30.5	43.8	25.7
產業經濟學	30.1	45.1	24.8
貨幣銀行	28.0	41.1	30.9
經濟發展	26.0	42.3	31.7
勞工	24.6	40.1	35.3
計量經濟學	22.4	55.7	21.3
公共財政	18.9	47.6	30.5
思想史	18.7	50.2	30.6
法律與經濟學	10.6	40.1	47.3
比較經濟學	9.3	42.4	48.6
都市經濟學	5.4	27.0	67.6

生也對政治經濟學（不包含於華德的分類當中）很有興趣。（政治經濟學可包括新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如公共選擇，以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這項調查的目標之一，是希望能更了解學生在研究所中獲得的論述在他們心目中具有何種面貌。因此我們問他們，哪些能力比較可能讓學生成功。這個問題提供了本調查一些最具戲劇性的結果⁴。我們提供學生一些可能具備的能力，在表 2-3 中按他們答案的名次列出。

根據這些研究生的看法，對於美國經濟的認識以及對經濟文獻的知識，無法使一位經濟學者成功。43%的人相信對經濟學文獻的知識

表 2-3 對成功的看法

單位：%

	非常重要	適度重要	不重要	不知道
精於解決問題	65	32	3	1
數學能力很好	57	41	2	0
對於某個特定領域 有深入認識	37	42	19	2
有能力與著名之教授 建立關係	26	50	16	9
對經驗研究有專長 並感興趣	16	60	23	1
對經濟學之文獻有 廣泛的認識	10	41	43	5
對於經濟制度有徹 底的了解	3	22	68	7

4. 問題是以下面的方式陳述的：“什麼特質最能夠使學生易於成功？圈選一項”。在訪談時，我們問學生他們對“易於成功”如何解釋，並發現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認為“易於成功”是指在學術專業上的成功。

並不重要，只有 10% 的人認為非常重要。68% 的人相信對美國經濟的徹底認識並不重要，只有 3.4% 的人認為十分重要。在我們的訪談中，更證實了學生不認為對美國經濟的認識有其重要性。下面這個典型的說法，是當學生被問到他們對課業所採的看法時所作的回答。

在你們的調查中有一項問題問道：“是什麼條件使得學生較容易成功？”如果我記得沒錯，有一個選項是“對美國經濟的一般知識。”其實，你可以走進課堂上課，即使不知道什麼是財星 500 大 (Fortune 500)，卻門門拿滿分。你也可能走進課堂，雖然知道次位信用債券 (subordinated debentures) 和垃圾債券 (junk bonds) 之間有何不同，成績依然滿江紅。

顯然，這些結果對於研究所的本質、課業的內容，以及實際的社會化過程，均提出了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很複雜，可是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經濟學界必須處理這些問題。

在問卷裡，我們並沒有問到學生是否喜歡他們心目中研究所的面貌，何況研究生也不必然是應該被詢問這些問題的人。如羅伯·梭羅 (Robert Solow) 在評論本文時所說的：“說研究所教育出了問題，等於是說經濟學這個學門出了問題。”

可是在訪談方面，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們看到了明確的緊張、挫敗感和犬儒的態度，其程度在我們看來已非常態的研究生苦悶所能同日而語。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存在，認為經濟學是一場遊戲，倘若花功夫設計與現實掛鉤的模型，即使足以顯示對制度有深入的了解，但是其報酬却低於去設計一個在分析上精簡有力的模型；受重視的是知識的外表裝潢，而不是認識的深度。這種犬儒態度並不只適用於他們對研究所經驗的了解，也是他們對這門學術的尖端研究的看法。一位研四的學生說道：

我們來到這個貨幣學研討會，你可以這樣想像，教授們爲了教育我們，從全國各地請來照理是最優秀的年輕人，來談一些他們現在正在進行的總體方面的研究。我們每個人每週都去參與這

研討會，一週又一週，但回來後都在背後嘲笑他們名氣很大，其實通常只是因為他們的模型非常令人難以相信，非常地複雜。

3. 經濟學研究生與經濟學界的差異

布魯諾·弗萊等人 (Bruno Frey, et al.) (1984) 最近對美國經濟學者的看法做過一次調查。我們的問卷包含了一些與他們的問卷類似的問題，讓我們可以拿他們的結果與我們對研究生所做的作一比較。表 3-1 比較了二組答案。由百分比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研究生的看法比美國經濟學者來得保留得多許多，特別在關於配額與關稅的角色及財政政策的效果方面。

4. 不同研究所課程的特色

喬治·史提格勒與克來爾·傅德藍 (Claire Friedland) 在一份深具洞見的關於經濟學界的研究中，曾經提出一個問題：“美國研究所教育的‘重點大學’經濟所，是否足以稱之為‘學派’——意思是說能夠在它們訓練出來的博士身上留下獨特的影響？”(Stigler, 1982) 他們檢視了 1950 至 1955 年間獲得博士學位的經濟學者，在 1950 至 1968 年間引用文獻的狀況。史提格勒和傅德藍發現，“各大學出身的人對不同的經濟學者的重視與尊敬，確實有其不同之處。”但他們認為這中間的差別太小，不足以證明有不同經濟思想學派 (schools) 存在。

我們的調查沒有像史提格勒和傅德藍那樣去追問研究所畢業之後的研究興趣，但有助於了解研究生的意見。表 4-1 顯示的結果，說明各研究所，尤其是史提格勒自己的學校——芝加哥大學，的確擁有自己的特色。舉個例子來說，在表 4-1 有關“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這個問題的答案上，這種差異便清楚地表現出來。

觀察表 4-1 中“總和”欄，學生們明顯懷疑經濟學的科學地位。多數人否認經濟學具備任何客觀科學所應具備的二項關鍵要素：實是的與規範的經濟學間有其區別，以及在基本的議題上存在一致的看

表 3-1 研究生的經濟學觀點與 Frey 對美國經濟學者所做研究
之比較

單位：%

	研究生				美國經濟學者		
	同意	有條件同意	不同意	不確定	同意	有條件同意	不同意
財政政策可以作為穩定政策的有效工具 ²	35	49	11	5	65	27	8
聯邦準備銀行 (FRB) 應該維持穩定的貨幣成長	9	34	45	12	14	25	61
最低工資造成年輕人與非技術工人失業增加	34	39	18	9	68	22	10
關稅和進口配額降低了一般的經濟福利	36	49	9	6	81	16	3
通貨膨脹基本上是一種貨幣現象	27	33	29	11	27	30	43
工資與價格管制應該被用來控制通貨膨脹	1	17	73	9	6	22	72
工人民主會增加勞工生產力	13	40	22	24	—	—	—
市場體系傾向於歧視婦女	24	27	39	10	—	—	—
資本主義體系天生固有趨向危機之傾向	8	23	59	13	—	—	—
所得分配在已開發國家應該更為平等	47	32	14	7	40	31	29

註：1. Frey 的調查中，未提供“不確定”項之選擇。

2. 在 Frey 的調查中這問題是如此表示的：是否財政政策對於一個未充分就業之經濟體具有刺激性？

表 4-1 對於經濟學之科學性的看法：跨校間之比較 單位：%

	芝大	麻省理工	哈佛	史丹佛	哥大	耶魯	總計
新古典經濟學對於今日之經濟問題具有現實意義							
非常同意	69	31	20	34	24	33	34
略微同意	28	56	56	60	68	60	54
不同意	3	11	22	6	8	8	11
看法不明確	0	2	2	0	0	0	1
經濟學者在基本議題上有一致看法							
非常同意	3	4	2	2	4	13	4
略微同意	47	31	27	51	48	33	40
不同意	44	60	68	43	44	47	52
看法不明確	6	4	2	4	4	7	4
實是的與規範的經濟學有一道明顯的界線							
非常同意	22	7	9	9	0	7	9
略微同意	38	16	4	30	32	33	23
不同意	34	73	84	55	52	60	62
看法不明確	6	4	2	6	16	0	6
經濟學是最具科學性的社會科學							
非常同意	47	27	9	27	36	13	28
略微同意	28	36	43	31	24	47	39
不同意	9	24	30	23	28	40	19
看法不明確	16	13	18	19	12	0	14

法。然而這種看法在各校間的分佈並不平。例如，若去掉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則認為經濟學家會在基本的議題上有一致看法的人便略佔多數。

答案顯示芝加哥的學生對於新古典學派經濟學的現實意義最具有信心，而哈佛的學生則最不抱信心。若去掉芝加哥的學生，多數學生懷疑實是的與規範的經濟學是可以區分的。事實上，四分之三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和六分之五的哈佛學生否認實是與規範的經濟學之間有區別存在。芝加哥的學生接受了這項區別；而在其他學校反對這項區別的僅僅略微佔優勢。

當我們比較不同學校學生的經濟觀點（表 4-2），以及關於經濟學假定的重要程度的看法（表 4-3），則各校間的差異就變得更為明顯。這二個表強烈支持一項假設，即芝加哥構成了一個與其他學校不同的“學派”（school）。在芝大，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貨幣現象這個命題，似乎被視為信條，100%的人都同意它。在哈佛，不同意的人却占百分之 46%。同樣地，財政政策可以是調節景氣的有效工具這命題，在麻省理工學院似乎被奉為信條，沒有一個學生不同意它。可是在芝大却有 44% 的人不贊成。

在個體經濟學的問題方面，這種差異也很明顯。芝大學生對於市場的信心，比起其他學校的學生明顯高出許多。哈佛學生的答案最為紛歧，對市場表示懷疑的人也相當多。

在表 4-3 中，“總和”欄顯示大部份的研究生認為理性預設是重要的。但對於理性預期的假說，態度就比較審慎。僅 17% 的人認為這項假說十分重要。25% 的人認為不重要。不完全競爭預設與行為根據傳統預設，排名都高於理性預期預設。

分項觀察各校間的差異，我們發現芝加哥大學的學生，相對於其他學校，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認同最高，對理性預期預設的支持也相當強，對價格僵固性、不完全競爭和成本利潤定價等預設則興趣較淡（我們可以說，其他學校對芝大的觀念並不支持。如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研

表 4-2 經濟觀點：校際間之比較

單位：%

	芝大	麻省理工	哈佛	史丹佛	哥大	耶魯
財政政策可以作為穩定政策的 有效工具						
十分同意	6	48	30	30	54	60
有保留地同意	34	51	65	52	38	33
不同意	44	0	2	9	8	7
意見不明確	16	2	2	9	0	0
聯邦準備銀行應該維持一個 穩定的貨幣供給成長						
十分同意	41	0	7	2	4	0
有保留地同意	44	27	24	39	50	21
不同意	9	60	57	44	33	64
意見不明確	6	13	11	15	13	14
最低工資造成年輕人與非 技術工人失業增加						
十分同意	70	24	15	36	38	33
有保留地同意	28	53	41	40	25	27
不同意	3	11	35	19	21	13
意見不明確	0	11	9	4	9	27
關稅和進口配額降低了一 般的經濟福利						
十分同意	66	38	20	32	38	33
有保留地同意	34	42	56	51	54	60
不同意	0	13	11	9	8	7
意見不明確	0	4	13	9	0	0
通貨膨脹基本上是一種貨 幣現象						
十分同意	84	7	15	23	29	13
有保留地同意	16	44	26	45	25	40
不同意	0	36	46	23	33	33
意見不明確	0	11	11	10	13	13
市場體系傾向於歧視婦女						
十分同意	6	24	44	11	38	27
有保留地同意	19	22	20	38	21	53
不同意	69	40	26	43	33	13
意見不明確	3	13	11	9	8	7
所得分配在已開發國家應 該更為平等						
十分同意	16	52	54	52	46	60
有保留地同意	50	30	33	24	37	20
不同意	19	9	13	17	9	20
意見不明確	15	9	0	7	9	7

表 4-3 經濟學預設的重要性

單位：%

	芝大	哈佛	麻省理工	史丹佛	總計
理性預設					
非常重要	78	35	44	58	51
有些情況下重要	22	51	44	36	41
不重要	0	14	9	6	7
沒意見	0	0	0	0	1
理性預期					
非常重要	59	14	0	9	17
有些情況下重要	38	45	71	53	53
不重要	0	38	18	32	25
沒意見	3	2	7	6	5
價格僵固性					
非常重要	6	37	38	26	27
有些情況下重要	56	54	56	65	60
不重要	38	7	4	4	10
沒意見	0	2	0	4	3
不完全競爭					
非常重要	16	47	51	38	40
有些情況下重要	72	47	44	60	55
不重要	9	7	0	2	4
沒意見	3	0	2	0	2
成本利潤定價					
非常重要	0	7	9	11	9
有些情況下重要	16	48	62	41	46
不重要	50	26	18	33	26
沒意見	34	19	9	15	18
行為根據傳統					
非常重要	0	16	18	4	4
有些情況下重要	31	55	69	64	25
不重要	31	9	2	4	57
沒意見	38	20	11	28	15

三學生所指出的：“(在麻省理工學院)沒有盧卡斯(Lucas)型的人。”尤其令人驚訝的是，沒有任何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認為理性預期預設非常重要。

在其他方面，芝大也很獨特。例如，僅有19%的人覺得他們的課業與興趣間存在重大的緊張關係。對照之下，其他學校平均有42%的人感覺如此。在芝加哥，60%的人沒有感覺壓力，其他學校的平均則為28%。

芝大經濟學明確地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學派；其他大學經濟所成“派”的跡象雖然較小，但也不能說沒有。假若我們一定要做一般之論，那麼我們會說哈佛學生最具懷疑心態，而史丹佛學生的看法分佈在芝大與麻省理工學院之間。

芝大經濟所構成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學派，並不表示該所用自己的特色塑造了學生。這種現象也有可能是學生自己原先的選擇而造成的。我們從二個方面來測試這個可能性。第一，我們要求學生比較他們現在和唸研究所之前對某些特定議題的信念，例如新古典學派的現實意義、實是與規範經濟學間可否劃出一道明顯的界線、經濟學是否為最具科學性的社會科學等問題。藉由這些問題，我們並不能得到明確的結論。約有50%的學生認為，進入研究所之後，他們並沒有改變看法。就所有學校的總樣本來看，也並未發現那些改變了看法的學生，趨近或背離他們自己學校所抱持信念的情況構成了明顯的趨勢。

然而，如果我們就個別的學校來看這些資料，仍然可以發現一個不是十分明顯的模式存在，尤其是芝加哥大學。例如，44%的芝加哥學生在進入研究所之後，對新古典學派的現實性的看法沒有產生變化。56%的人改變了，這些人可以分為：3%的人現在比起過去認為該學派較不具現實性，而53%現在認為其較具現實性。此點與其他學校形成直接的對比。例如，62%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生認為他們未曾改變看法。而改變了看法的人分為：22%的人現在較覺得該學派具現實性，持反向變動的有16%。

學生關於經濟學之科學性的信念為何，提供了另一個例證。47%的芝加哥學生進入研究所後看法沒有改變：34%的人變得比較相信經濟學是科學的，19%的人變得比較不相信。在麻省理工學院，71%的人對此問題看法不改，7%現在較認為經濟學是科學的，22%較不認為如此。這些資料說明，學派會增強學生原先就抱持的立場。

雖然我們並未問學生在研究所之前關於經濟政策的信念。但是我們可以依年級將答案分開，藉此找出學生在入學第一年以後觀點上有何變化。這是我們提供的第二方面的測試，由於本調查是在春季做的，研一學生有可能在那個時候已經受到所方的影響了，這使得這項測試的結果無法有明確的結論。雖然如此，這項測試之結果仍舊顯示出學生自我的選擇是重要的因素，不過研究所階段確實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觀點調整與增強。例如，在麻省理工學院，66%的一、二年級學生同意通貨膨脹為一貨幣現象，而四、五年級學生却只有42%的人同意（在芝加哥所有年級的學生都全數同意）。但這些比較中，也有些例外的情況。例如，哈佛的一、二年級生有26%覺得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而相信此點的四、五年級生占53%。

另外二個問題的答案，可以作為很好的例子，說明在研究所階段發生的觀點增強效果：58%的芝大研一、研二學生相信，財政政策可以是有效的，但祇有36%的研四、研三學生相信它有效。在哈佛與麻省理工學院，除了一位學生之外，其餘所有年級的人全部都同意財政政策有效。回答有關最低工資問題時，芝大包括所有年級的全部學生都相信它會造成失業增加；而哈佛的一、二年級學生有45%，四、五年級生祇有24%不同意。

我們從這二個不完整的檢定所獲得的結論是，在研究所期間雖然確實發生了朝所方觀點作調整的現象，但是除非實際上這種變化發生在第一年，否則自我的選擇才是決定研究生信念的主要要素。學校多多少少會修正他們的信念，但是通常是增強他們先前已先存在的觀點。

5. 關於調查結果的思考

報導數據是一回事，詮釋它們是另一回事。經濟學者的製程中出現的一連串的緊張，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和驚訝。研究生對政策有興趣；大部分的人會投身經濟學，也是因為期待經濟學有助於政策問題。頭幾年當他們學習方法與基本的技巧時，對政策的應用有限，因此引起了學生某個程度的挫折感，從下面的談話可以略窺一般：

學生 1：我覺得花了六週的時間上總體經濟學課程，做了很多代數以及導微分，但我們從未討論過這些模型可以適用到什麼程度，這些預設的合理性如何。

學生 2：我一點都不覺得我們在課程中接觸到任何政策。沒錯，是有一門商業政策理論，但課上其實也沒有什麼政策。我們學到的是“何為最適關稅？”

有些學生主張在技術方面的專精是有益的，有些則不同意，我們可以從以下的討論中看出來：

學生 3：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在頭一年我們充實我認為一定要把該學的都循序學到，這很要緊。可是另外還有一種感覺。我曾經讀到別人引梭羅的說法：政策是給笨蛋去研究的。只要你懂得理論，導出政策不成問題。那對於一個真正厲害的理論家而言，政策涵意不是什麼具有挑戰性的東西。我認為這是為什麼系裡不花很多時間在應用上的另一個原因⁵。

學生 4：不見得，我認為政策的現實比這批人想的困難得多。例如，像我們所裡的（提到某位講師的名字）就十分關心政策的落實，但我感覺他幾乎是個奚落的對象，因為他關心應用理論結果時所碰到的實際問題。我幾乎沒有看到哪個教授在研究中把這類問題列入考慮。

5. 認知通常與實際有距離。羅勃·梭羅告訴我們，他從未做過這樣的陳述。這個陳述的可能來源，是商業週刊一篇文章裡引述狄爾·傑格森 (Dale Jorgenson) 的談話。

其他的學生也都同意。

為了完成研究所前二年的學業，學生們必須把重心放在技術上。因此研究生在解決問題方面得到很好的訓練，但是這種解決問題是在技術層面的，與處理形式模型的技術關係較大，與真實世界的問題反而關係較小。處理這些問題不需要對制度有真實世界的認識。相反，在許多情況中，這方面的知識反而會成爲障礙，因爲它讓你無法接受旨在簡化的預設。

學生進入研究所，希望經濟學有其現實意義，他們修習理論和技術，目的在於處理問題的複雜性。但是他們很快見風轉舵；他們看出了這套體制裡的報酬原則。他們終於知道建立形式模型有助於成功，可是他們並不相信形式模型針對相應的經濟制度給我們提供了深入的認識、或者反映了製作模型者對制度有真正的理解。在這樣的想法之下，他們希望在整個行業所重視的東西上得到訓練。我們見到，那些自認沒有學習到最複雜的理論的學生，會覺得有所損失而憂悶不快，因爲他們擔心自己的競爭能力。

從與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訪談中，可以看出學生對學到技術的重視程度。當被問到，他們自己和教授們對於聘請更高一個層次的純理論經濟學家會如何反應時，他們說道：

學生 1：假如你問我的話，到我們進入工作市場，那（缺少高層次的理論經濟學家）是哥倫比亞的缺點之一。我們沒有高層次的理論家。

學生 2：你指的是什麼？像純粹貨幣理論嗎？

學生 1：是指個體方面。個體方面的理論家，拓撲學——在這裡我們沒有人是這方面的，我們從未接觸過這個。

發問者：這困擾到你嗎？

學生 3：是的，我感到十分擔心。因爲我對個體理論感興趣，那是我想要研究的。

學生 1：對基礎不了解是很不利的。

學生 2：我有點覺得，為數學而數學也蠻好的，就只是學習數學，學它是一種好的思考方式，同時數學的某些部份可能與經濟學的想法有關聯。

學生們轉變為技術取向，可能是因為他們大部份期望找到學院的工作。他們曉得，要享有終身職，靠得是在好的期刊上發表文章。他們邏輯地選擇最易於使他們達成這項中介目標的對象來做研究。懂得一個可以應用於十個領域的技術，能夠為他們產生出十篇論文；懂得一個特定的領域，可能只能產生一、二篇論文。因此，沒有什麼誘因讓學生去熟知某個領域的文獻、或對某特殊領域有制度方面的知識。這種偏重，並不反映學生對政策缺乏關懷，而是說明了這套體制中公認的誘因何在。關係緊要的不是在數量龐大的資料中辛勤工作，也不是在文獻方面成為專家，而是在研究方法上翻新。

6. 結論

我們並不是在評判經濟學研究所的教育是好或是壞。我們只在陳述學生對於各種誘因的看法，並為這些誘因何以存在提供可能的說明。如果我們的說明是正確的，這些誘因是從經濟學專業的其他方面——我們在本文中並未討論——帶來的必然結果。它們與學生的興趣沒有關係，因此，似乎有一些十分真實的社會化過程確實在發生作用。在談話中，學生經常自行提出這個話題，用的往往就是社會化這個概念：

學生 1（一位研四學生）：我進入經濟學的時候，並沒有多少經濟學與數學方面的知識，我強烈地感受到正在被社會化，通過線性代數的嚴格考驗。過了頭二年以後，課業真是精彩，論文的寫作過程更是愉快。

學生 2（一位研一學生）：頭一年似乎塑造了我們的整個經濟學生涯。這著實令人不安。我們正變成某個樣子，但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除了知道正被五年前獲得博士學位的人進行這種思考

方式的社會化，你好像正在被洗腦。你的睡眠被剝奪了，承受著很大的壓力，被相互矛盾的概念所轟炸，最後你一切照單全收。

學生3（另一位研四學生）：我覺得我被社會化成為這個專業的一份子，進入這種思考方式。當我來這裡的時候，曾經立誓要直接進入政策工作。當時我相當質疑這些學院期刊中裝腔作勢的文章，在這裡頭所要做的事就是要獲得學院中的職位，為期刊寫論文，大家都認為無法從事經濟學的人才從事政策工作。（“或在文理學院教書”另一位學生補充道）。現在我認為研究面是更有價值的，或者是說我認為我應該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其他人也都同意有同樣的經驗。

我們在本文中的意圖，乃在於提供一些經驗性的資料，以期我們能夠更了解經濟學者被形塑的過程。有些結果似乎是明確的，值得重複指出。具體而言，在這些經濟學的研究生之間，以及在我們所調查的經研所之間，意見有相當的紛歧，而且似乎明確地存在一個經濟學裡的芝加哥學派，在強調技術訓練、與希望從事政策導向工作的兩個方向之間，也有緊張性存在。學生們認為在研究所中獲致成功的條件，無疑是技術；成功與對經濟體制的認識沒有關聯，與經濟文獻也沒有太大的關係。我們希望，這項發現，能導致經濟學界中的討論，以判斷這樣的焦點是好是壞。

附錄：關於問卷之方法論

在 1985 年，經濟系總共產生了 812 名博士。從不算完整的數據判斷，本調查所選取的六所學校約產生了 110 位；也就是說我們的樣本代表了博士總數的 14%。

問卷發出時間為 1985 年春天。應答者總數為 212 人。而我們推估的母體為 600 至 800 人，應答率約有 25 至 30 個百分比，就此類研究而言屬於正常的比率。問題有 31 個，作答時間從 15 分鐘到超過一小時不等。應答者年級之分配約略是均等的——研一：24.5%；研二：20.8%；研三：21.7%；研四：14.2%；研五或以上：18.9%。調查之後，我們還做了一系列訪談。

問卷在這六個學校以兩種方式發出。在那些狀況允許的地方（除了耶魯與哥倫比亞大學外的其他學校），問卷被置入個別的學生的信箱內。在耶魯和哥大，問卷交由一些挑選出來的學生負責分發。這可以說明為什麼這二個學校的應答比率較低，以及應答者樣本可能有所偏差。考慮到這一點，在某些跨校的比較中，我們將這二個學校剔除。要想決定學生母體總數有其困難，因為學校把未完成論文的學生一律列為在校學生，即使他們可能已經離校。然而，在哈佛，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和史丹佛的應答率均約在 40%。在耶魯與哥倫比亞的應答率較低，但是既然這兩校調查所得的結果並沒有全然偏離其他學校所做出來的結果，那麼似乎我們下結論說從這二所學校所得之結果是有效的也應屬合理。

不過，這些調查中仍有潛在的可能誤差。愈是技術取向的學生，愈可能未回答我們的問卷。例如，我們的調查中亞洲裔的學生相對地很少，而他們被認為比起典型的美國學生來得更注重技術取向。因此，這些結果像所有的經驗研究一樣，必須很小心地被詮釋。

我們要感謝卡洛林·卡文 (Caroline Craven)，李·庫布 (Lee Cuba)，馬里恩·傑斯特 (Marion Just)，克麗斯特·沙波 (Chrystal

Sharp) , 史蒂芬·史密斯 (Stephen Smith) , 以及填寫問卷的各校經濟系學生和參與訪談的學生們。包伯·寇特斯 (Bob Coats) , 弗德·德克斯 (Fred Dirks) , 雷地克斯·費爾 (Rendigs Fels) , 大衛·林得爾 (David Lindauer) 和羅教·梭羅對本文早先數稿提供了有益的評論, 我們也致謝意。

參考書目

- Becker, Howard, et al.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0) *Sociological Work: Method and Substanc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 Coats, Bob (1985)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ts Application to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Mimeo.
- Davis, Paul, and Gustav Papanek (1984) "Faculty Ratings of Major Economics Departments by Cit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4, pp.225-30.
- Frey, Bruno, et al. (1984) "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 An Empirical Inqui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4, No.1, pp.986-94.
- Gourman, Jack (1983) *A Rating of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Programs in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 Graves, Philip, et al. (1982) "Economics Departmental Rankings: Research Incentives, Constraints and Effici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2, pp.1131-41.
- Grubel, Herbert, and Lawrence Boland (1986) "On the Efficient Use of Mathematics in Economics: Some Theory, Facts and Results of an Opinion Survey," *Kyklos*, Fasc. 3, pp.419-42.
- Klamer, Arjo (1983)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Totowa, NJ: Allanheld and Rowman.
- Kuttner, Robert (1985) "The Poverty of Economics," *The Atlantic Monthly*, pp.74-84.
- McCloskey, Donald (1983)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21, pp,481-517.

— (1986)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2) *An Assessment of Research-Doctorate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wen, Wyn, and Larry Cross (1984) *Guide to Graduate Study in Economic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octoral Degree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oulder, Colorado: Economic Institute.

Spellman, William, and Bruce Gabriel (1978) "Graduate Students in Economics: 1940-7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8, pp.182-7.

Stigler, George (1982) *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rd, Benjamin (1972) *What's Wrong with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Whitley, Richard (1984)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cienc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